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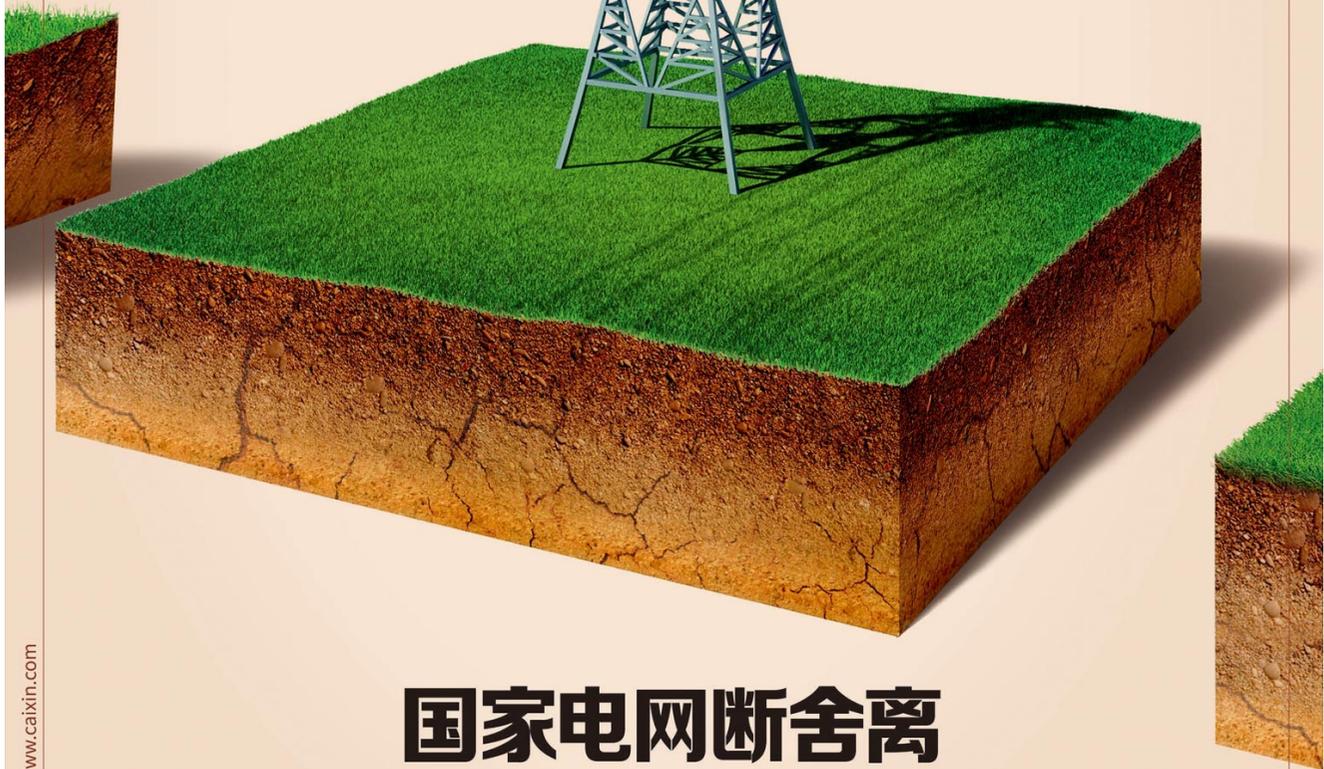
前瞻2021政策正常化之路 26
SPAC魔盒狂欢 34

IPO撤单隐忧 42
武汉弘芯烂尾始末 64

谁来监管货拉拉 72
重估大宗商品 78

财新周刊

Caixin Weekly



国家电网断舍离

垄断型央企终于重启主辅分离, 千亿级
电力设备制造企业呼之欲出

P.48

定价: 人民币30元 港币60元 www.caixin.com



2021年 第9期 3月8日出版
总第945期
邮发代号: 32-235

ISSN 2096-12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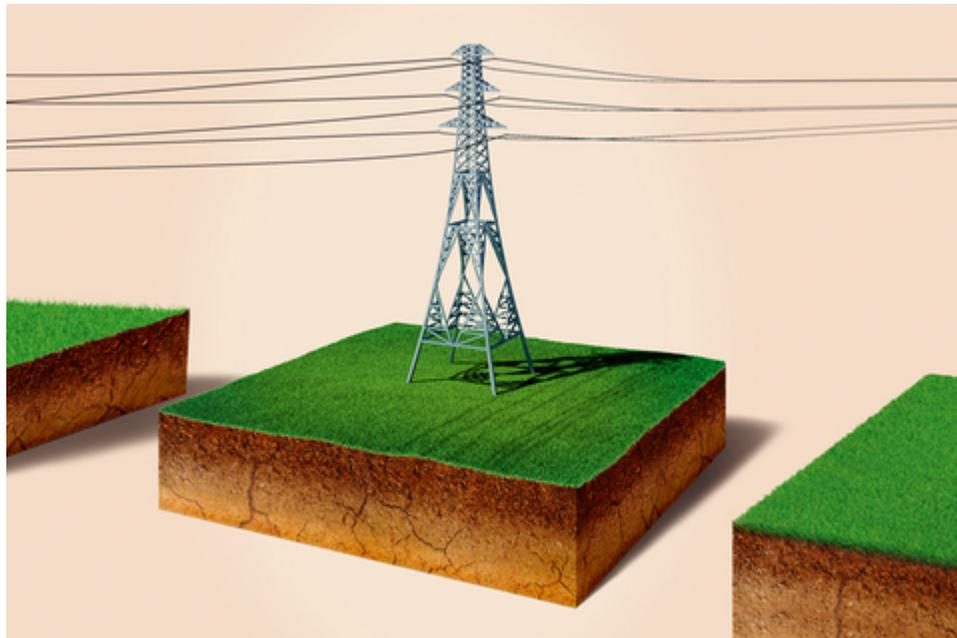


9 772096 125219

封面报道之一 | 国家电网扩张变瘦身主辅分离如何推动电改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垄断型央企终于重启主辅分离，千亿级电力设备制造企业呼之欲出



[《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陈雪婉 赵焯 范若虹

时年59岁的浙江衢州人[毛伟明](#)，是央企中罕见的“空降”董事长，其来去[国家电网集团](#)，任职仅10个月零3天。

毛伟明近20多年均在江苏、江西两省政府部门任职，其间在工信部两年，“空降”国网前官至副部级。这样一位从未在电力行业履职的“一把手”，来意为何？

细心的业内人士发现，尽管毛伟明的任期如此之短，却是国家电网“一把手”中惟一在离任时晋升正部级的，调任湖南省省长这被业内解读为“高层对其在国网业绩的认可”。回顾其10个多月的任期，除利用政府人脉对外广泛合作，加速投资落地，加大对新能源支持力度等经营举措外，更可看到这位“空降”高管没有历史包袱，在贯彻高层改革决策上更为果决。

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莫过于毛伟明开始动刀国网最敏感的“硬骨头”——主辅分离改革，回归“主责主业”。2002年2月[电力体制改革方案（“5号文”](#)）出炉，确定了“厂网分开、主辅分离、输配分开”的改革方向。在当年底电厂和电网分开，国家电网从国家电力总公司中独立之后，“主辅分离”本应接续改革。而国家电网其后以“电荒”、特高压以及国企“做大做强”等种种契机，逆势大举收购，非电网资产不仅没有剥离，反而金融、地产、酒店等杂业越收越多，产业链上下通吃，资产规模超过4万亿元。

主辅分离的最初动因是弄清电网运营真实成本，分离竞争性和垄断性业务，从而为“输配分开”等后续改革扫清障碍，激活产业活力，促进公平竞争，合理化社会电价体系。然而，一关卡住，18年过去，中国电力体制改革始终无法形成实质性突破。

2019年3月至6月，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对国家电网开展巡视，8月公布的巡视报告指出，国家电网“贯彻国家发展战略、坚守主责主业不够有力”。2020年1月，毛伟明接任。两个月后，国家电网公开表态：下决心退出传统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务。8月，国网退出了所属房地产板块龙头企业[山东鲁能集团](#)70%的股份。

针对国家电网剥离辅业的政策态度也越来越清晰。2020年9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支持电网企业加快剥离装备制造等竞争性业务；国家发改委体改司负责人则在11月的一个论坛

上，透露了剥离时间表并点名企业：在2021年底之前，中央计划把装备制造业务完全从国家电网剥离出去，其中包括[许继集团](#)、[平高集团](#)、[山东电工电气集团](#)和[南瑞集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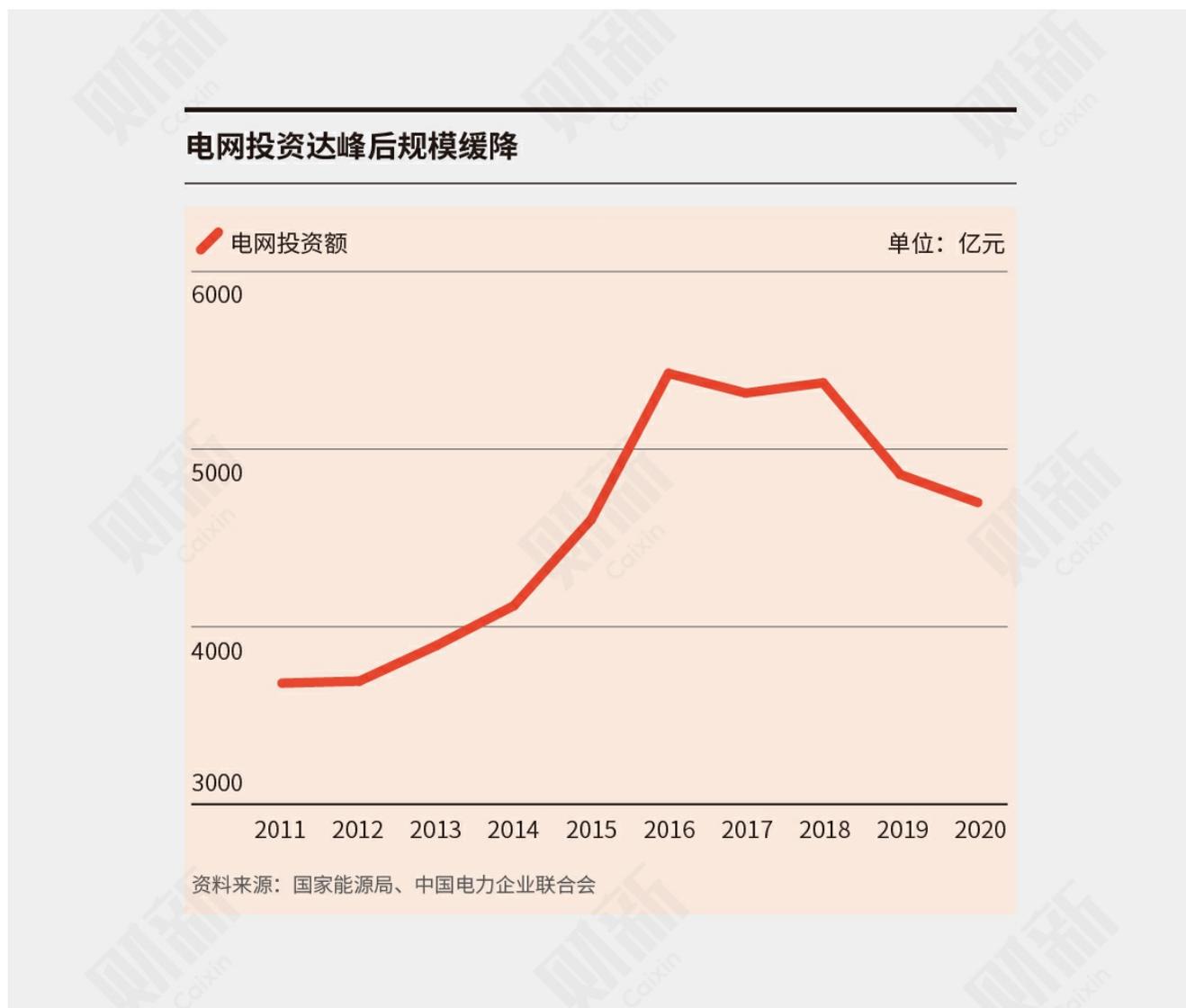
一句话重燃行业期待。许继集团、平高集团两家电力设备制造企业，可谓国网十年前最具争议的收购，机电行业协会和诸多电力业界或市场人士都曾站出来反对。电网公司一旦染指上游制造业，所谓招投标购买电网设备和服务，就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扰乱整个行业的成本收益秩序。

2020年12月23日，[A股](#)三家电气设备上市公司[许继电气](#)（000400.SZ）、[平高电气](#)（600312.SH）、[中国西电](#)（601179.SH）同时发布公告，宣布各自母公司正在筹划战略性重组。

据财新记者了解，重组方案包含许继集团、平高集团和山东电工电气集团，但对其中技术实力最强的南瑞集团，国网或仅同意拿出部分制造业务；这批资产将以中国西电集团（下称“[西电集团](#)”）为基本盘实施吸收式重组，目标是将西电集团的电力设备制造主业做大做强，收入规模扩大2倍以上，成为达到千亿营收级别、具备国际竞争力的行业龙头。

毛伟明终于将国网博弈多年的主辅分离，推入了改革轨道。事实上，这家一度极为强势的垄断型央企，已经走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

近年来，电网企业的外部环境发生巨变，能源结构变革、电力市场化不断推进，输配电价改革、增量配电网放开等，都在倒逼电网企业不断降低成本；同时重资产投资的内在动力趋弱，发展战略向轻资产的智能化、物联化转型。



[点击见大图](#)

这意味着，以特高压为代表的传统大电网投资的总盘子已近饱和。在关联关系中滋养了十年的电力设备制造企业，业已显示出机制不活、创新力不足，竞争力与市场地位不匹配等弊端。“传统输配电设备进入下行区间，需要通过整合砍掉、淘汰过剩产能，来保证行业平稳度

过冬眠期。”一名参与此轮国网剥离方案编制的人士对财新记者称。

“以后电网投资还会增加，但增加的方向跟我们这些传统企业原来做的不太一样了，如果创新、产品转型跟不上，就必然会被淘汰。”一名山东电工电气人士感慨道。

过去一年，全球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面对复杂的国际经贸关系挑战，以及科技、高端制造业产品或供应链等封锁，国内外竞争加剧。中国加紧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些无疑都倒逼国有企业乃至整体经济，须加快深化改革、提质增效。

2021年1月16日，《求是》杂志刊发国务院国资委主任郝鹏的署名文章，提出深化自然垄断行业改革，在电网、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重点行业和领域，放开竞争性业务，进一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当月，深化电网企业竞争性业务改革实施方案发布，提出到2021年底，国家电网及省级电网企业都要完成参股控股的装备制造企业剥离；此外，电网企业还要开放设计、施工业务市场，对电网全资和控股企业实施清单管理。

现阶段的国网主辅分离方案，还不是一个彻底的改革方案。上述几家外部收购的电力制造企业剥离后，国家电网仍留着自建制造企业南瑞集团，金融、电商、充电桩、文化等众多辅业资产仍在未定之中。这些辅业给国家电网每年带来的利润以千亿元计，涉及人员、利益错综复杂。

毛伟明的继任者，是在电力系统中经验丰富的辛保安。

辛保安在近期的2021年工作务虚会上强调，国家电网在接下来的“十四五”期间，要更加聚焦主责主业，同时还面临着“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倒逼下的机遇与挑战。

辛保安会如何继续国家电网痛苦而艰难的“断舍离”？人事风云变幻中，庞大的组织体系能否形成共识、坚持做下去？国网的“主辅分离”做到怎样的程度，才能确保中国电改大局的改革成效？

那场逆流并购

国家电网以无可阻挡之势，于2010年6月完成对许继集团、平高集团的收购。那场收购给延宕八年的电力体制改革按下了暂停键。

上述收购消息甫一披露就引来了巨大的反对声浪。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下称“中机联”）的反对最为坚决，他们向国家发改委、国务院递交报告，呼吁制止国网涉足设备制造业。

熟悉当时中机联情况的内部人士在2021年1月底向财新记者回顾称：首先这些收购背离了国家确定的“主辅分离”原则，是电改的倒退；其次，国网收购设备制造企业，将导致行业不公平竞争；再次，不利于机械制造行业创新能力提升和健康发展，行业面临重复建设和投资浪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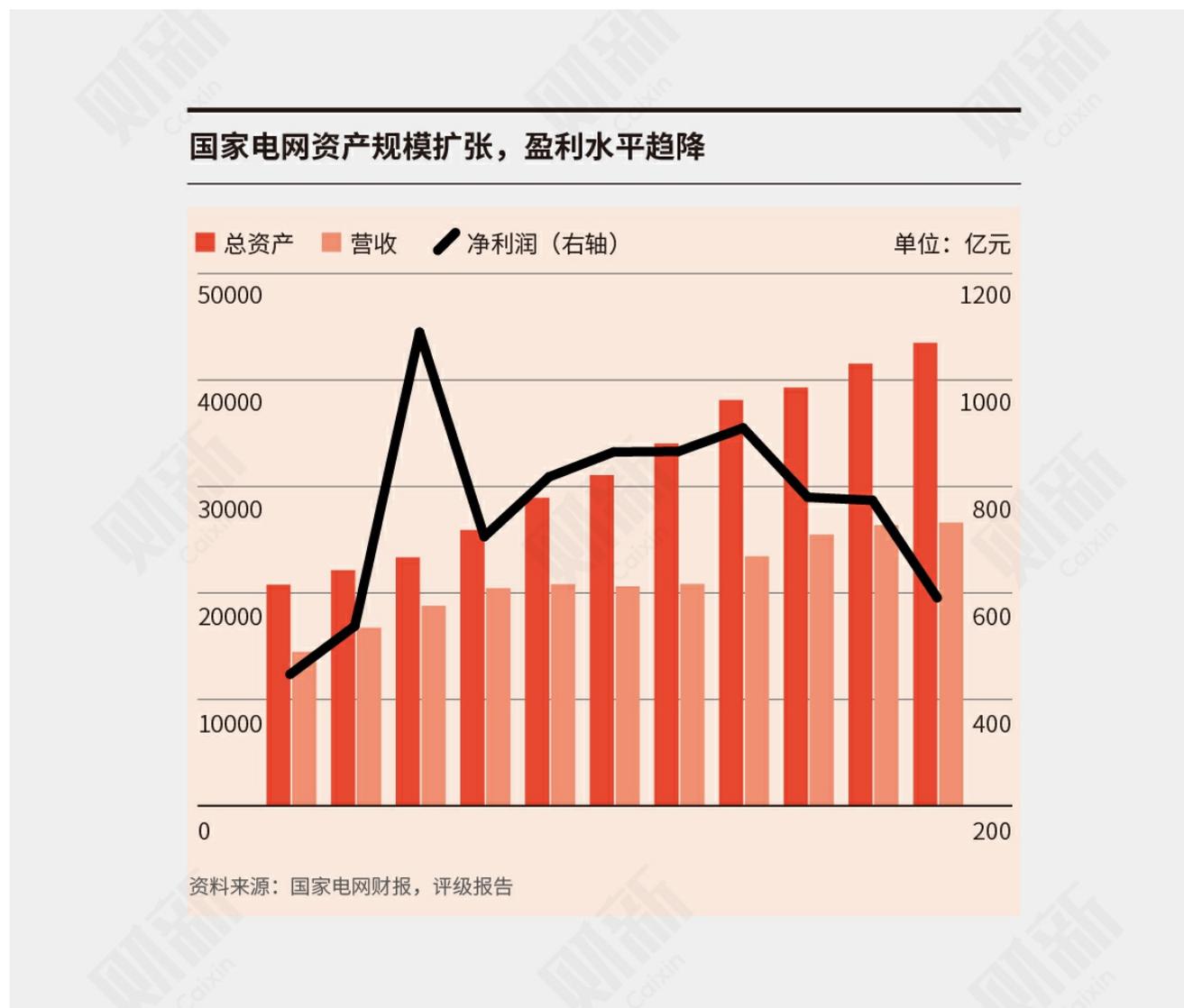
在中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改革中，2001年成立的中机联继承了原机械工业部的部分职能，代表机械制造行业利益，代管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工技术学会等行业组织。原机械工业部电工局局长周鹤良也对财新记者说，当时除行业协会激烈反对外，也引起了以国家发改委为代表的行业管理部门，和广大电力设备制造企业的反对。

“当时主要由国资委和国家发改委两个部门来决定国家电网此次收购。”周鹤良回忆称，国家电网属于国资委领导的央企，而当时国资委在“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监管思路下，对国网收购许继、平高持支持态度；但国家发改委作为电力体制改革的主要推动者，当然不赞成此事。

国务院国资委对国网收购许继、平高的同意批复于2010年2月发布，河南省也表态支持，“生米煮成熟饭”。最终国家发改委坚持附加意见“国家电网下不为例，其他正在收购的项目暂停”。

国家发改委同时要求，特高压必须以提高国产化率为目标。在早年的超高压直流输电项目中，国网因国内装备企业产品质量较差而排斥国产设备，曾引起机电行业的强烈不满。像2003

年—2004年的三峡至常州、三峡至广东±500千伏特超高压直流输电项目，工程国产化率仅为30%、50%。后随着国网自己入场设备制造，国产化率提升较快，第一条特高压线路国产化率就已接近90%。此外，西门子、ABB、三菱等国际领先的科技制造企业，在获得一定市场份额的基础上，也转让了部分高压输电技术给中国企业，以“技术换市场”带动了我国高压输电技术的跨越式发展。



[点击见大图](#)

国家电网力排众议进军上游，理由是突击特高压建设，打造“中国的西门子”；而提升设备采购话语权，做大资产规模，也是其渴求的目标。

一名业界专家对财新记者回忆称，当时国家电网急于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在央企行政管理和业绩考核指挥棒下，领导者往往对企业营收和利润规模有内生的扩张冲动。而对于垄断性企业，产业链越长，利润来源就会越多。

中投证券分析师熊琳在2009年7月的一份研报中如此描述：输变电设备500千伏特及以上电压等级，由于技术壁垒相当高，且存在国产化率的要求，每次招投标均是少数几家龙头厂商参加，使得国家电网在高端产品领域议价能力不强。由于电价的不断调降、直供电的推出等，长期来看，单纯依靠电力运营对国网利润压力较大；而另一方面，国内电网建设需求巨大，电力设备制造产业商机无限。

对野心勃勃的国家电网来说，许继、平高只是两步小棋。时任国家电网总经理刘振亚亲自四处考察，物色收购标的。“国家电网不仅是到河南，还到了江苏、浙江、安徽，想把优质企业都收走。”周鹤良说。

事实上，许继、平高两家企业及其地方政府，也积极投入国网的拥抱。一名南京电力专家表示，河南许昌市政府当年认为，如果把许继转让给国网，市场份额和税收都更有保障。“机械部撤销后，行业协会来管设备制造企业力度不够，工厂发展要靠大量资金投入，因此企业也

愿意投靠国家电网。”周鹤良说。

特高压杠杆有限

十年后看，进入国家电网体系的电气设备制造企业，确实获得了远超同行的发展机会；但垄断体系的荫庇终究难以“喂养”真正的“中国的西门子”，可持续性成了问题。

以许继集团、平高集团为例，2009年两家企业营业收入分别为55.2亿元和30.4亿元，利润总额为-2.6亿元和0.9亿元。到2016年，两家公司营收分别较2009年增长120%、240%，达到121亿元、102亿元；利润则分别为12.8亿元、10.3亿元，增长了6倍和10倍。但2017年受特高压建设放缓影响，两家企业经营状况立马恶化，2018年许继集团仅录得0.23亿元微利，平高集团则巨亏6.4亿元。



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30条特高压，其中26条由国家电网投建，包括14条交流、12条直流；南方电网则建设了4条特高压直流。

盛衰系于特高压。2006年中国开工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试验示范工程“晋东南-南阳-荆门±1000kV”特高压于2009年初投入商业化运行。自此，国网开始“整体、快速推进”特高压投资建设，2009年5月提出“到2020年，特高压总投资超过6000亿元”的目标。截至目前，中国已建成30条特高压，其中26条由国家电网投建，包括14条交流、12条直流；南方电网则建设了4条特高压直流。据中信建投测算，平均每条特高压投资约200亿元。若按此成本推算，国网尚未完成的特高压投资计划还有1000亿元左右。

在特高压投建的跃进期，国家电网大力扶持直属电力设备企业，内外有别。收购前，许继、平高两家市场占有率都仅有1个百分点左右，发展至今，许继集团在特高压直流换流阀和控制保护产品上拥有约三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南瑞集团在特高压二次设备控制保护领域与许继集团份额相当；平高电气为特高压GIS（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设备）主要生产商，目前市场份额在40%左右。

据评级机构报告披露的2018年数据，南瑞、许继与平高，三家关联方交易占营收比重分别高达55%、60%和68%。而关联交易主要是向国网系统销售商品和劳务。

订单、资源集中后，上述三家制造企业在特高压技术攻关中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中电联行业发展与环境资源部原副主任薛静分析，国网的电力科学等研究院不具备设备制造能力，而特高压从材料、科研到设备制造都需要攻关，这也是国网要求收购电力设备制造企业的理

由。在2009年9月一份增资许继集团涉反垄断问题的法律意见书中，国网称，这一收购有利于实现技术与产业的融合，通过技术创新开发新产品，降低生产成本，改善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

前述南京电力专家坦承，目前南瑞无论设备制造技术还是体量份额，都已占据市场最前列，“因为其他人没有机会。你再有本事，没有地方给你应用。很多优秀的企业都进不了国网的圈子”。但他同时也指出，国网旗下有些制造企业实际竞争力，与行业地位、市场份额并不匹配。

多名业内人士评价，国家电网集标准制定、设备制造、招标和采购等多重角色于一身，“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打乱了电力设备行业的竞争环境，抑制了系统外企业的发展。比如在二次设备控制保护领域，民营企业四方股份（601126.SH）本与南瑞、许继同为行业头部企业，但作为“圈外人”，四方股份在国网招投标竞争中总是处于劣势。一名四方股份人士抱怨称，四方和另两家的市场份额差距，已从2010年的几个百分点拉大到现在的十几个百分点。

前述中机联人士指出，国家电网作为采购方，在工程招标中可以调整技术评分、价格评分还有管理评分的比重，“有时技术分比重很高，有时价格分比重高，每批标评分比重不一样，没有统一标准，给出的解释也很随意，外人难以捉摸”。

而在这样的评分机制中，招标方有极大的空间。比如，对国网系统内企业，如果事先拟定的价格分系数高，国网就可以通过压低许继、平高的价格来提高其中标率，再通过科研经费名义给对方返回补贴，但其他设备制造企业只能拼低价，否则毫无机会。

上述南京电力专家则例举海南金盘科技（688676.SH）的例子，说明有的外部企业不得不另做打算。金盘科技从事干式变压器生产制造，产品竞争力较强，但该公司2020年7月公告称，其2019年对国家电网销售收入5663万元，较2017年的1.3亿元下降了56%，这是因为国家电网招投标相关项目毛利率较低，公司减小了参与竞标的力度。

主辅混业为国网系统中的腐败交易、利益输送也提供了便利空间。国家电网全资子公司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下称“中电装备”）成立于2010年3月，是国网电力设备制造板块的主要载体，装入了许继、平高两块收购资产。2019年，中电装备原总经理魏庆海因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获刑13年，并没收违法所得5000余万元。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显示，多次牵涉受贿交易的公司就有许继集团和平高集团，魏庆海利用职务之便帮助相关销售人员在国家电网系统开展业务。

在前述南京电力专家看来，在“分蛋糕式”的市场划分下，企业块头虽然越来越大，但经营机制不见得变好。比如，南瑞集团的核心技术其实主要来自外部民营企业南瑞继保，后者在充分竞争中成长为细分市场龙头，但被国网体系收购后出现了新的挑战。

以南瑞集团旗下信通公司为例，从事通信的高级人才在市场上的薪酬可能是国网管理下的3倍多，但内部只能按职称来评级。“一些人才只能辞职走人。这是一个竞争性行业，结果以一种垄断企业的方式管理，不能反映这个行业真正的市场价值。”他说。

国网旗下山东电工电气集团负责人坦承，已经有些能力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或科研人员跳出国网体系，寻求更灵活的职业发展规划。“对研发部门来说，一个产品主要面向系统内消化，这就容易产生惰性，反而不如体系外团队更具创新动力。”



[点击见大图](#)

减量整合大趋势

从2004年开启技术论证起,中国需不需要特高压、应该建多少条特高压、怎么算投入产出经济账等,类似争议一直声量不小。

“特高压应该发展。”尽管竭力反对国网垄断,但前述中机联人士仍对财新记者坚定地说。他认为,中国东西部资源不平衡,煤炭、水力资源集中在西北、西南,负荷中心则集中在东部沿海,远程电力输送是刚需;此外,中国掌握特高压技术并推进国产化,有利于降低工程造价。如今一台特高压变压器价格约3000万元,但在特高压大规模发展前,一台价格超7000万元。

“建设特高压的确对中国有利,但是建设得太多、太快,也产生了很多问题。”前述中机联人士进一步称。2020年10月,国家能源局在多份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新建特高压工程建设的答复中指出,中国多条已建成特高压通道利用率低、送电能力不及预期。

其中,2017年建成的山西晋北-江苏±800千伏特高压直流工程,2020年上半年输送电量83亿千瓦时,利用小时数约1040小时,同比下降20%,且最大输送电力约480万千瓦,仅为设计值的60%。2017年建成的甘肃酒泉-湖南±800千伏特高压直流,最大运行功率约450万千瓦,也仅为设计值的56%。

国家能源局还提到,2014年初投运的哈密南-郑州±800千伏特高压直流、2017年12月投运的扎鲁特-青州±800千伏特高压直流等工程,通道输送电力均不及预期,尚未充分发挥通道输

电能力。

前述中机联人士认为，特高压通道利用率偏低，一方面存在国家电网建设超前、夸大线路作用的因素；另一方面，电源电网不匹配，配套电源滞后，也制约了通道输电能力提升。以甘肃酒泉-湖南特高压工程为例，该项目的配套电源一期项目2020年11月才投产，较特高压通道建成时间滞后三年。

能源专家叶春分析称，2014年国家为防治大气污染推动了12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建设，目前已相继竣工；2018年9月，国家能源局再次发布12条特高压线路建设计划，虽然已有线路陆续核准并开工建设，但此轮建设进度明显放慢。

国内电力设备制造业的需求在2018年达峰后逐年下滑，2019年全国电网工程完成投资4856亿元，同比下降9.6%；2020年同比再降6.2%。

3月1日，国家电网发布《“碳达峰、碳中和”行动方案》，称将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最大限度开发利用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新能源，通过电网建设支持新能源优先就地就近并网消纳。此外，国网表态“十四五”期间持续推进特高压建设，规划建成7条特高压直流，新增输电能力5600万千瓦，投资规模低于“十三五”。

重资产投资放缓，能源互联网方向转型，逼得国家电网“主辅分离”改革终于走到了不得不做的节骨眼；输配电龙头西电集团则迎来了历史性机会。

前述中机联人士透露，实际上，在国家电网收购许继、平高之前，中机联就曾试图推动这两家设备企业和西电集团重组，由西电集团集合中国输变电设备优势力量，打造“中国的西门子”，但是许继、平高积极性不高。

西电集团是国内输配电设备行业惟一的中央企业，成立于1959年7月，2001年与数家资产管理公司实施债转股，整合改制了西安地区一批电力设备企业资产。

目前，西电集团全资或控股子公司60余家，其中包括中国西电（601179.SH）与[宝光股份](#)（600379.SH）两家上市公司，主营业务集中于输配电设备中的一次设备领域，如变压器、开关、电抗器、电容器、换流阀等。

电气设备分一次设备和二次设备。一次设备即直接参与电力生产、输、配的相关设备，例如发电机、断路器、开关、电力电缆等；二次设备即对一次设备进行监视、测量、控制和保护的辅助设备，例如继电保护装置、信号装置、测量装置等。

此次重组主要是将各集团公司股份，在两家央企——国家电网和西电集团之间无偿划转。目前计划并入西电集团的三家制造企业中，许继集团优势在于二次设备领域；平高集团强项是一次设备中的开关领域，尤其是高压开关；山东电工电气集团竞争力相对薄弱，业务涉及一次设备中的变压器等领域。

“这对西电来说是利好，既大幅提升规模、知名度，也通过整合完善产品、产业布局。”西电集团一名内部人士对财新记者说，整合后新西电集团产业集中度和规模实力将大大增强，粗略估算总资产体量由原来约400亿元或将超过1000亿元。

“许继加入可有效弥补西电集团二次设备薄弱的短板，进而形成一次、二次设备成套设备供货能力，完善产业布局。”一位参与重组方案编制的业内人士称。

但前述四方股份人士认为：“一次设备实际是生产类型，二次设备更偏技术、软件层面，这两个在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极大差异。”作为竞争对手，他们对西电整合许继冷眼旁观。

在国内高压开关设备细分市场中，长期以来，平高集团、西电集团、[新东北电气高压开关有限公司](#)三分天下。平高集团与西电集团在高压开关领域原是竞争对手，业务高度重合。

“收购平高，西电集团相当于干掉了一个竞争对手。”一名业内人士认为，平高与西电产品结构、水平不相上下，重组后新西电集团势必要做产能优化和减量。但这种整合减量，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2012年，国家电网重组[山东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和中电装备山东电工电气有限公司，组建成立山东电工电气集团，主攻变压器研发、制造，很快和此前国内变压器设备制造商特变电工沈变集团、[西电集团西安变压器公司](#)、[天威保变](#)（600550.SH）平分天下。因此，山东电工电气整合并入西电集团，也面临产品同质化问题。

这些正是前述中机联人士的担忧所在：“一年也就一两条特高压，蛋糕就那么大，重组后的新西电集团中了标，内部怎么分？如何吃饱？家家都有百亿级体量，涉及大量职工、技术，如何整合、淘汰产能？”

薛静认为，这场整合利于凝聚行业，打造一家综合性能源装备制造企业，提升中国输配电设备行业整体国际竞争力，提升海外市场占有率。许继集团原董事长王纪年也赞同，需要站在中国制造业的角度来权衡这场重组，“中国几十万家电气制造商，小散粗放，分散竞争，在科技创新、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应用等方面很难在国际上取得领先地位”。

目前，输配电行业的国际市场主要由瑞士ABB、德国西门子、美国通用电气等欧美公司主导，三家公司合计占有全球近50%的市场份额，中国的输配电设备制造企业的国际市场份额仍较小。2019年，中国西电海外业务收入30亿元，占自身主营业务收入的20%；平高电气海外收入占比则仅6%；南瑞集团旗下[国电南瑞](#)（600406.SH）海外收入占比不到3%。

上述参与重组方案编制的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河南当地政府曾有意借国网主辅分离，将许继、平高“拿回来”。但目前看，许继、平高进入西电集团大局已定。

前述南京电力专家认为，相较于“束缚”在国网体系内的“喂饭”方式，剥离出去，放到真正的市场环境中竞争、摔打，反而有利于这些设备制造企业成长。

南瑞仍在博弈中

国网此次决定剥离的多是十年前收购的设备企业，而对自有的南瑞集团，国网仍然极力博弈、不愿放手，使得这场剥离更像对那轮逆势收购的“纠错”，而非真正坚决地主辅分离。

“从企业竞争的角度，我们肯定是希望南瑞能被剥离，它留在国网系统里会变得更强大，会加剧二次设备领域的不公平竞争。”前述四方股份人士说。

南瑞集团资产总额超700亿元，核心业务为二次设备及电网调度、电力信息通信等，拥有特高压交直流输电、柔性交直流输电、大电网安全稳定控制、电网调度、继电保护等领域自主核心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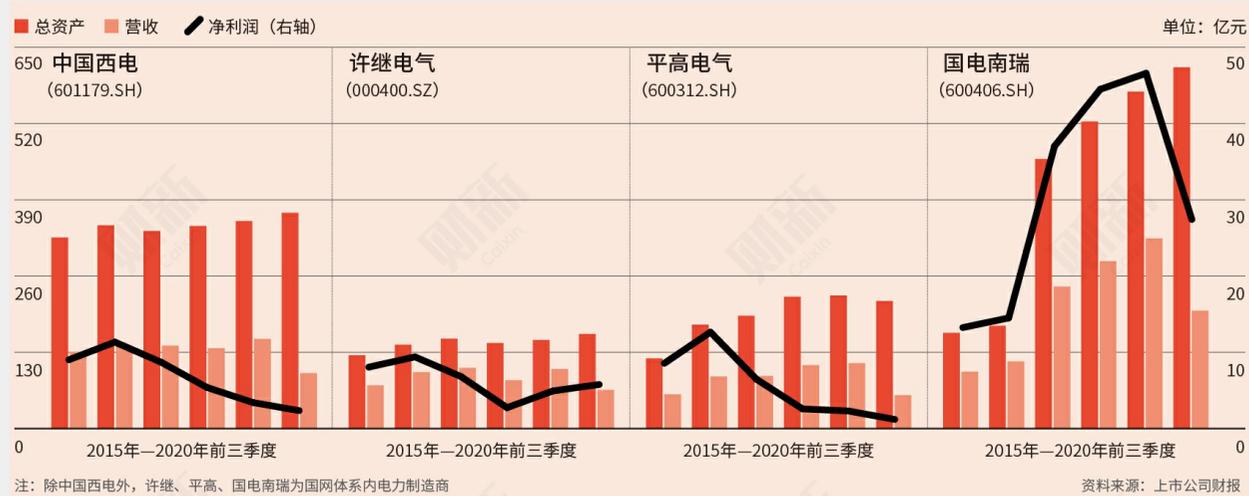
南瑞集团比许继、平高等企业的盈利能力更强，国家电网暂时还不愿剥离。

南瑞集团比许继、平高等企业的盈利能力更强，从2010年营收60亿元、利润总额13亿元，到2018年各增长近400%、200%，实现营收295亿元、利润总额37亿元。

“2018年—2019年装备制造业务剥离方案前期讨论之时，国家电网就力保南瑞不划转出去。”一名知情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

直到目前，南瑞集团是否剥离仍无定论。尽管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司司长徐善长在公开发言中点到，南瑞集团也是明确的剥离范围。但上述参与方案编制人士透露，国家电网仍然明确反对剥离南瑞，理由是：一方面南瑞集团拥有电力调度和运行技术，这部分牵涉电网运行安全；另一方面，与一次设备不同，二次设备介于制造与运行之间，不属于纯制造领域。

国网体系内设备商发展迅速



[点击见大图](#)

若严格按“5号文”要求，二次设备及低端制造业务也在主辅分离的范畴，仍可能给国家电网体系外设备商带来不公平竞争。薛静认为，“当前电网企业正处在互联网科技技术攻关的关键时间节点，需要依托这么一批力量，不过电网公司也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购买服务”。

而一名电力行业资深人士指出，南瑞涉及的电网调度业务更应剥离，这恰恰关系到电网运行数据的透明。

不想放手南瑞集团，除技术、电网安全因素外，国网也有经济因素的考量。上市公司国电南瑞对国网的利润贡献逐年提升，2019年在国家电网利润总额中的占比已达7%。为给实体企业减负，降电价政策成近年中央及各地政府的重要抓手，逐步挤压国网的利润空间。2020年，受电价下调政策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家电网净利420亿元，远远低于年初制定的579亿元目标，同比下降近三成。

除电网调度核心技术以及二次设备等核心业务外，南瑞集团还涉及电线电缆、开关柜等低端制造。一名国家电网内部人士认为，如果一定要剥离，国网则可能拿出南瑞这部分低端制造业务。

这部分业务主要装在南瑞集团旗下的[重庆博瑞变压器公司](#)、[江苏南瑞恒驰电气装备公司](#)、[江苏南瑞泰事达电气公司](#)、[江苏南瑞银龙电缆公司](#)、[江苏南瑞淮胜电缆公司](#)以及原上市公司[置信电气](#)（600517.SH）内。置信电气2019年收入达51亿元，其中电气及新材料设备收入占比近半，总资产87亿元。但国家电网在2020年8月将旗下信托、证券、期货相关资产注入置信电气，整合改名为国网英大。

主业亏损，辅业来补

2020年一季度因新冠疫情停工停产，社会用电量下降，以及降电价导致国家电网主业大幅亏损

利润总额

-112.8 亿元

主业

27家省公司

24.8

辅业

支撑服务单位

中国电财、英大传媒、新源公司等

39.09

辅业

市场化产业单位

许继、平高、山东电工电气、鲁能、国网国际、国网电商、综合能源服务等



[点击见大图](#)

业内人士认为，这一重组更像让原置信电气的制造板块和南瑞集团切割，并助国网英大打造成“金融+制造”双主业架构。但这些电气及新材料设备、电力运维业务、低碳节能与工程服务等，与注入的金融资产并没有业务协同性。而国网英大既有金融又有装备制造业务，与“主辅分离”亦相违背。

南瑞集团历史背景复杂，其前身为南京南瑞自动化总公司，1993年成立，隶属电力工业部电力自动化研究所，1997年更名为南京南瑞集团公司。而电力工业部电力自动化研究所是国网电力科学研究院的前身。国网通过电科院控制南瑞集团。

国电南瑞2003年上市，历经多次资产注入与整合，目前控股东南瑞集团仍持股51.78%。在2017年一笔高达243.6亿元的资产注入中，包括南瑞继保公司100%股权、作价189亿元。

南瑞继保实质是一家民营企业，创始人、董事长沈国荣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荣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带领20多名技术骨干从南瑞集团“下海”创业，彼时只为使用南瑞品牌，接受老东家南瑞集团持股15%。凭借在继电保护领域的自主核心技术，南瑞继保先后参与了三峡输变电、大亚湾核电站、“西电东送”等多项国家重点工程，2009年实现销售收入超过30亿元，在当时国内继电保护行业排名第一。在2017年国电南瑞这场资产重组时，沈国荣将所持南瑞继保股权从20.7%退至13%。

悬念重重

在许继、平高、山东电工电气之外，国家发改委还要求国家电网下属各省级电网退出控股参股的装备制造企业，同时开放电网设计、施工业务市场，并对电网全资和控股企业实施清单管理。

这些省网控股、参股的装备制造企业以及设计、施工等单位，多属于早年国家电网成立的三产、多经企业（第三产业和多种经营公司），人员庞大、股权复杂，与国家电网主业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国家电力系统曾允许企业员工持股，出现上千家员工持股的三产公司，电力三产企业经营范围遍布电源建设、电力物资、电力上下游产品各领域。2003年，有关部门要求各地暂停电力系统职工投资发电或电网业务，员工持股被封杀并清理。

国网系统中员工持股最出名的公司无疑是山东鲁能集团，其从一个三产公司发展为横跨地产、金融、矿业、体育等多个领域的庞大体系。

2020年8月，国家电网将其持有的鲁能集团100%股权无偿划转至[中国绿发集团](#)，后者实际

是专为国网剥离鲁能新设的公司，股东包括[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持股40%）、[中国国新控股公司](#)（30%），以及国家电网还保留30%股份。此举被外界视为国网启动退出房地产领域的重要动作。

当下，国网各级公司所属庞杂的辅业能否彻底剥离，如何剥离，能执行到什么程度，皆为悬念。

无论如何，“主辅分离”的闸门已经打开，这与2015年开启的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也休戚相关。2015年3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9号文”），强调深化电力体制改革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事关国家能源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全局，且提出“管住中间，放开两头”是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的基本路径。

“管住中间”即为严格监管电网企业输配电成本，并借此改变电网企业过往统购统销、“吃差价”的模式，转为只向用户收取政府核定的输配电价，获取固定收益。

政府监管机构按“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核定准许收入，其中准许成本包括电网企业的折旧费和运行维护费，准许收益则是与输配电业务相关的资产乘以准许收益率。

输配电价核算的关键是核定电网企业的准许收入，电网的准许收入越高，输配电价就越高。若电网公司庞大的辅业不剥离，被计为与输配业务相关的成本，又或输配成本核算不透明，均会影响真实的输配电价水平。输配电价的真实性不仅关系到市场环境的公平性，也关系到全社会的运行成本。

薛静认为，从电网公司角度看，与电网建设相关的研发和制造环节，应该由原来封闭化的攻关方式，逐步改为电网公司与其他市场化企业共同合作来实现。这样有利于电网企业理清自己的业务与成本，区分自然垄断与竞争性业务。例如，电网的输配电垄断环节应由政府加强监管，而与输电业务相关的竞争性业务如电力装备制造、售电、用户侧综合能源、供热等业务，则完全可以交给市场充分竞争。

“如果实在没办法、理不清，那就要电网公司拿出清单来。细化到哪家企业电网公司持股多少，这就是清单管理，这样才能抓细。”她说。

辛保安在1月份的国家电网2021年度工作会上也提出，要聚焦主责主业，统筹好监管与非监管业务。监管业务即电网主业，具公益性和商业性双重属性，受国家严格监管；各类市场化业务，则是公司经营发展的重要增长点，需要创新体制，推动电网监管与非监管业务有效隔离、规范关联交易。

目前，在新电改放开的售电侧和配电网等市场竞争环节，国家电网参股持股的设备制造商、服务商纷纷入场，成立配售电公司、综合能源服务公司等。多名受访人士都提到，这些公司不可避免地依托国网背景，占据市场竞争的有利位置，未来也应该列入退出或剥离范围。

2019年8月，国家电网曾发文要求下属集体企业坚决退出售电业务，但并未明确国家电网公司退出售电领域。目前，政府监管层面亦未明令禁止电网企业进入售电等市场化竞争性业务。

国网一名内部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国网下属集体企业通常由省级、地市级电力公司来管理，集体企业对电网主业存在一定依赖性，会参与到电网产业链的部分环节中，从而构成关联交易。集体企业与国家电网间的关联交易，常被其他市场主体诟病。

而关于电网设计施工业务，徐善长称，国家发改委已列出时间表，要求设计方面，330千伏以上的设计施工业务，在2022年底之前全部剥离；330千伏以下的设计施工业务（国网持股）份额控制在5%以内；施工业务也有退出节点，2020年之前，要在2019年基础上减少30%（持股），2023年以后完全放开送变电的施工业务。



庞大的国家电网还将商业触角延伸至金融保险、传媒出版、电子商城、旅游、宾馆、医疗、充电桩、综合能源服务等领域。

此外，庞大的国家电网还将商业触角延伸至金融保险、传媒出版、电子商城、旅游、宾馆、医疗、充电桩、综合能源服务等领域。

国网的“金融王国”整合为银行、保险、证券、资产管理四大板块，放在2010年底成立的[国网英大集团](#)。金融板块是国网的重要利润来源之一，管理资产规模超万亿元。2020年一季度，国家电网出现罕见的亏损，净利润同比大跌106%至-9.2亿元，但国网英大集团仍实现利润超60亿元。

国家电网还曾在媒体领域深度布局，以2008年成立的[英大传媒投资集团](#)为主体，拥有十余家报刊出版公司；此外还参股[人民网](#)（1.36%）、[上海一财](#)（4.24%）、[广东二十一世纪财智网络](#)（14.29%）等6家市场化媒体。国家审计署在2015年公布的一份审计结果中指出，国家电网在国内外投资中有多个项目未按程序报国资委审核即自行开展，其中包括英大传媒收购上海一财等3家媒体企业等。报告披露，2010年至2013年，英大传媒对上海一财等3家媒体企业股权投资总额达2.95亿元。

上述金融、传媒等辅业，未来如何处理与主业的关系，目前尚无明确方案。一名电力行业资深人士对财新记者评价称，如果这次再切割、剥离不彻底，国家电网的这些具有竞争属性的辅业“还可能再蔓延生长”。

相关报道：[封面报道之二|新电改进入深水区](#)

参阅英文：[Cover Story: Power Revamp Rebooted as State Grid Resumes Divestiture Plan](#)

注：本文刊发于《财新周刊》2021年第9期，原题为：封面报道|国家电网断舍离

版面编辑：刘潇

社论 | 准确理解“不急转弯”政策基调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当前偏宽松的宏观政策迟早要退出，同时需把握好力度、时机、节奏



2021年2月18日，辽宁沈阳，当地一公司生产线上，工人在赶订单。当前，中国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控制。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2.3%，成为惟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首破百万亿元。图/视觉中国

又到全国两会时。关于当前公众高度关注的宏观经济政策，李克强总理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宏观政策要继续为市场主体纾困，保持必要支持力度，不急转弯，根据形势变化适时调整完善，进一步巩固经济基本盘。”近来，货币、财政部门负责人也屡次表示，将确保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是，市场人士仍不无猜测和分歧。为此，宏观经济决策部门应准确判断经济形势，逐步实现宏观政策正常化。市场参与者也要避免误解政策意图或反应过度。双方有效交流互动，才能形成理性预期。

当前，市场对于为抗疫和稳增长、保民生而实施的支持性刺激性经济政策的退出高度敏感。银保监会负责人在全国两会前夕表示，因为今年整个市场利率在回升，估计贷款利率也会有回升。这一表态被一些市场人士解读为“口头加息”，当天股市反应强烈。一些研究机构则不认为这番表态意味着“加息周期”开启。

如此尖锐的意见分歧有着复杂的现实背景。当前，中国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控制。2020年，中国经济增长2.3%，成为惟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首破百万亿元。全球疫情也度过了至黑时刻，随着各国疫苗接种铺开，全球经济复苏已在市场预期之中。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更有人士已转而担忧通胀。自2020年下半年以来，随着国内经济逐步复苏，此前一些宽松政策已在陆续退出；相关负责人提前“吹风”，正是汲取了过往的经验教训，意在未雨绸缪，市场不必过度解读。

国内外经济形势，排除了中国宏观政策过急过快过度调整的可能。受疫情重创的全球经济尚未复苏，美国等一些主要经济体仍维持极度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甚至在继续加码。综合考虑外部因素，特别是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溢出效应，中国宏观政策不可能迅速收紧。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复苏势头也需夯实。为此，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准有效，不急转弯，把握好政策时度效。”其中，“不急转弯”一语正是对宏观政策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的形象表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这一提法，从而确认它将是2021年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基调，其内涵需要准确理解和表述。

“不急转弯”并不意味着“不转弯”，当前偏宽松的宏观政策迟早要退出，这本是宏观政策“可持续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转弯”不能太急，需要把握好力度、时机、节奏。货币政策必

定会边际收紧，保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而不是大大高于GDP增速。财政政策仍需保持适度支出强度，但是，当会在2020年非常时期的赤字率和债务规模基础上做减法，把有限的财政资金花出质量和效果。不少地方受到疫情严重冲击，有些省市财政收入大幅下滑，基层财政尤为困难。雪上加霜的是，地方债特别是隐性债务开始进入偿债高峰，需要警惕出现债务偿付风险。这也意味着财政货币政策须避免收得过紧。

归根结底，宏观政策是否调整、何时调整、如何调整，须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而定。政府工作报告将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目标设为6%以上。此前，不少机构对今年中国GDP增速做出预测，普遍在8%以上，一季度的增速更为可观，或达18%。须知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去年基数低所致。“数据好看，日子难过”的情形不仅体现在财政上，也将体现在宏观经济上。2020年，出口占中国GDP比重达到2000年以来新高，这显然不可持续。有关部门当会充分估计今年全球经济运行和各国宏观政策的变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留足政策调整余地。

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与政策部门与市场的有效沟通息息相关。只有切实减少信息不对称，市场主体才能形成理性预期。2020年的经济成就来之不易，值得自豪，“风景这边独好”的赞颂屡见官方媒体，自有其依据。然而，过度渲染也会干扰市场和民众对经济的准确评判和预期，可能陷于各类增长率造成的“数字幻觉”，这反过来又会干扰政策的制定，不可不防。

财新PMI最新数据显示，当前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复苏动能减弱，消费恢复落后于投资和出口。其中固然有新冠疫情冲击的因素，但是，这种情况还反映了中国经济久已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并非宏观政策调整所能解决，而需要深化体制改革，挖掘体制性结构性红利。

不同于去年因疫情而推迟，今年的全国两会如期召开，这彰显了国内疫情防控成效，也为中国经济持续复苏注入了信心。我们期待代表委员们建言献策、履职尽责；相关部门负责人通过这一通道，将宏观政策的依据和意图完整准确地向民众表述出来。今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理解好、执行好“不急转弯”，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关键。

（本文为即将于2021年3月8日出版的《财新周刊》第09期社评）

参阅英文：[Editorial: Understanding China's Policy of 'No Sharp Turn'](#)

版面编辑：吴秋晗

【编辑絮语·凌华薇】公信力不容破坏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从不说假话、不造假做起



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公信力一旦破坏，想要再修复就难上加难。图/视觉中国

本期值班主编 凌华薇

假作真时真亦假。近期，假保单纠纷再现江湖，吸睛之余也叫人感慨。很难想象，2021年的今天，还有很多金融消费者在持牌保险大机构持续买了好几年保险后会被告之，“这是假保单”。实际上，近年来各地的此类假保单案件此起彼伏，涉及的也不止一两家保险公司。这揭开了很多保险机构基层管理混乱、漏洞百出的现状，背后更是保险公司过去假假真真违规冲规模的乱象与后患。

究其因，除了一些金融机构欠缺合规意识，风控漏洞百出，给了有心人可乘之机的缘故，从金融机构到从业人员，历史上弄虚作假的风气没有纠正，欠缺讲真话、办实事的基本操守，或是内在原因。

有牌照、有外部监管的金融机构尚且如此，其他行业的此类问题就更严重。

2019年，昔日中医药行业龙头股[康美药业](#)爆出300亿元货币资金失踪的丑闻，此后陷入被调查的漩涡，公司业务停滞、实际控制人终被刑拘，连累长期合作的头部机构[广发证券](#)也被暂停投行资格。近期康美药业[债市](#)违约之后寻求债券展期的做法一再受阻，根本原因就在于当年失踪的货币资金之谜，已经转变为数百亿存货对不上的黑洞，始终不能给公众一个清晰合理符合逻辑的调查结果。这背后隐藏了多少当年行业性弄虚作假留下的后遗症？一味隐藏、回避的结果，就是无法做彻底的反思，无法杜绝这类肆意造假。

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公信力一旦破坏，想要再修复就难上加难。自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以来，中国不少人至今未能建立起对国产奶粉的信任。中国父母但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都只给新生儿喝进口奶粉的现象并未扭转。

现今不少机构的公共关系（PR）部门缺乏公信力，也是因为它们没有或没有被授权讲真话，无法做到“即使不能说出全部真话，也至少不说假话”的基本准则。如果PR部门的KPI不是以讲真话与外界做好沟通，而仅仅是完成上级的“铲事”目标，如何能得到媒体和公众的基本信任，有效维护公共关系？如果一家机构的PR部门关于本机构的事实都要以假话糊弄天下，社会信任又从何建立？而在造假充斥、不以造假为耻的社会氛围里，要到哪里去寻找重建社会信任的基点？

再看中国的互联网行业，它承载了新经济的希望，但近年来愈发沉迷于互相攀比的刷量行为，现实中应运而生的刷量生产链，活跃于各个平台、公众号、娱乐明星、电影票房、电视剧播放量??所谓的流量数据严重失真，令社会弄虚作假的风气只增不减，有损平台对参与社会治理的贡献。

仅仅用“行业陋习”来形容这些虚假、造假现象，只是文过饰非。以法治的眼光看，很多做法已涉嫌违法违规。纠正这一社会不正之风，有意建立公信力的机构和个人应从不说话、不造假做起。正如今年“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谋发展、惠民生。□



凌华薇

版面编辑：吴秋晗

财新周刊 | 创业变制毒五名化学青年涉案芬太尼始末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五名化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成为第三代毒品新的牺牲品



新精神活性物质又称“策划药”或“实验室毒品”，被认为是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芬太尼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王梦遥 实习记者 杨玉琪

四年多前的2016年12月24日，像往常一样出门上班的伍敏整夜没回家。这天是伍敏父亲的生日，父子俩本想一起吃个饭，伍敏却失联了。

第二天，伍敏的妻子和父亲赶到他公司所在的武汉市东湖区华中光电产业园找人，被门卫告知，伍敏的公司——武汉格润康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下称“[格润康捷](#)”）全员被警方带走了。12月26日，一家人到公安机关询问情况，“警察也没说什么，把伍敏的车钥匙给了我们”。

格润康捷总共五个人，分别是伍敏、程生祥、刘迪森、孔令曦和郭彬。几人中伍敏年龄最大，生于1986年9月，当年30岁；孔令曦刚年满28岁，另外三人是1989年底出生的同龄人。

前后赶到产业园区找人的还有程生祥的弟弟、刘迪森的父母以及郭彬的亲友。刘迪森的父亲刘少连12月24日从湖北小城石首赶到武汉。他说，自己和妻子在派出所门口看到警察押着刘迪森，“隔了三四米远，我们就问‘怎么回事’，他说‘没什么事，我们说得清楚的’，他还让我们回去。”

刘迪森认为“说得清楚的”事情，让这五名当时大学毕业没几年的年轻人身陷牢狱。

2019年12月5日，武汉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伍敏构成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程生祥、刘迪森构成贩卖、制造毒品罪，郭彬、孔令曦构成制造毒品罪，涉案毒品“芬太尼”21.7千克、 α -PVP4.16千克，其中伍敏被判死缓，程生祥和刘迪森被判无期，孔令曦和郭彬被判13年。与这五人同时受审的，还有两名买家王盈波、王道化和负责接发货物的季学拯，这三人的刑期分别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15年和13年。

大多数国人认识芬太尼的一个时间节点可能是在2018年12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同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共进晚餐并举行会晤。会晤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芬太尼。双方同意采取积极行动加强执法、禁毒等合作，包括对芬太尼类物质的管控，中方决定对芬太尼类物质进行整类列管，并启动有关法规的调整工作。

四个月后的2019年4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有关规定，公安部、国家卫健委、国

家药监局决定将芬太尼类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

让两个大国共同关心的芬太尼最早由比利时一位医生于1960年作为镇痛药发明出来，1968年在美国被批准用于医疗用途，其等效镇痛作用约为吗啡的100倍，并可以通过手部等处皮肤吸入体内，两毫克用量就可致人死亡。

同时，芬太尼是一种新精神活性物质。所谓新精神活性物质又称“策划药”或“实验室毒品”，是不法分子为逃避打击而对管制毒品进行化学结构修饰得到的毒品类似物，具有与管制毒品相似甚至更强的兴奋、致幻、麻醉等效果，被认为是继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后全球流行的第三代毒品，芬太尼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实际上，早在1996年1月公布的《麻醉药品品种目录》中，中国已将芬太尼及阿芬太尼等12种芬太尼类物质列入其中，对其实验研究、生产、经营、使用、存储、运输等活动进行严格的监督管理。但作为实验室毒品的代表，芬太尼等新精神活性物质的一大特征就是变化极快、衍生品众多，对其化学结构进行某些修改，就可以设计合成并筛选得到一系列活性更高的衍生物。管理机关将某种物质列入列管名单，很快就会有不少“新品”冒出来，因此给监管带来极大难度。

2015年9月，一则“澳洲丧子父亲来华卧底调查致幻剂”的消息已经引起部分中国公众关注。澳大利亚第九频道《60分钟》播出纪录片《卧底在中国》，讲述了一名澳大利亚少年因服用“新精神活性物质”跳楼身亡后，其悲痛欲绝的父亲假扮成富豪，卧底找到一家位于安徽合肥的合成致幻剂原料生产商的故事。2015年11月，公安部禁毒局官员在一次新闻通气会上透露，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相关国家通报以及中国有关部门的核查，目前全球“新精神活性物质”确实相当一部分在中国生产。

“大多数新精神活性物质是从欧美发达国家实验室中‘设计’出来的，其深加工环节和消费市场也主要集中在国外。”公安部禁毒局时任副局长魏晓军当时在通气会上说，“长三角”等地一些具有化工、医药知识的人员受境外贩毒团伙利益诱惑驱使，通过互联网、电话等方式联络，根据境外不法分子品种、数量等需求，采取订单式生产并经邮寄等渠道输出，并利用各国管制差异逃避打击。

2015年10月1日起，中国正式施行《[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及附设的《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增补目录》，目录中列管的116种非药用类麻醉药品覆盖当前全球八大类新精神活性物质，其中包括6种芬太尼类药品和 α -PVP。按照《列管办法》，被列管的非药用类麻醉药品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买卖、运输、使用、储存和进出口，对因科研、实验、药品及医疗器械生产、检测等过程中使用的管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此后中国不断加强对新精神活性物质的管制。以芬太尼为例，2017年及2018年，都增补列管了卡芬太尼、呋喃芬太尼等新发现的芬太尼衍生物，直至2019年宣布整类列管芬太尼类物质。

2019年11月7日，河北省邢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刘勇等七人涉毒案一审公开宣判，主犯获刑死缓。宣判结束后，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在邢台举行新闻发布会，称此案是中美两国联合成功破获的第一起芬太尼走私案件。

在如此这般对芬太尼的严厉打击下，伍敏等人于2019年12月5日等来了自己的一审判决结果。一审宣判后，八名被告人均提起上诉。时隔一年多，近日湖北省高院二审下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财新记者注意到，二审合议庭在审查过程中认为案件事实清楚，因此二审未开庭审理。

创业

格润康捷创办于2015年11月，起初只有伍敏和程生祥两人，刘迪森于2016年4月加入，之后又引进了孔令曦和郭彬。

伍敏的母亲刘文云告诉财新记者，2008年大学毕业后，伍敏本打算在芜湖与人合伙开一家日用品店，后因意见不合店没开起来。2010年左右伍敏到上海工作，“好像是一家药企，每个月工资才3000多元”。也是在上海，伍敏认识了后来的妻子，中间两人回到老家安徽桐城再次

创业，失败后，2015年过完春节两人决定到武汉发展，伍敏应聘到武汉赛狮药物化学有限公司（下称“[武汉赛狮](#)”）工作。

另一边，2011年从南昌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刘迪森和2012年从武汉理工大学毕业的程生祥也经历了一番兜兜转转，并先后入职武汉赛狮。在这里，三个人相遇了。工作几个月后，伍敏跟家里说，工资连武汉的房贷都还不上，还是打算自己干。程生祥也嫌每个月到手不到2000元的工资太低，动了创业的心思。2015年11月，伍敏和程生祥辞职创办了格润康捷。按照一审庭审中两人的说法，当初成立公司的目的是想出来做点事，业务主要是生产医药中间体和原料药、提供技术服务。

程生祥在庭审中说，之所以后来引进刘迪森，是因为当时伍敏接了一个订单，“但是我们不会做，刘迪森在赛狮做过，有这个技术，就找他过来了”。

刘迪森的妻子徐青（化名）告诉财新记者，刘迪森当时打算离职，因为在武汉赛狮工作时公司安排的事情太多，不单是做产品研发，有时还涉及人事和行政，“像打杂一样”。

几个年轻的创业者把公司办公地点选在了东湖区的华中光电产业园，每月租金两万元。按照分工，伍敏负责财务、联系客户、销售和采购，程生祥和刘迪森负责研发、生产，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化学专业的郭斌和曾就读于荆州理工职业学院的孔令曦负责生产、操作。武汉中院一审将伍敏、程生祥和刘迪森认定为格润康捷的三名股东。程生祥说，后加入的刘迪森是以技术入股加扣除一个月工资的方式入股的，当时并没有签订协议，但三人商量过。刘迪森则称自己并未出资入股，所谓的技术入股只是“当时口头开玩笑说过”。



2019年4月1日，北京，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公安部反恐专员刘跃进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负责人介绍芬太尼类物质管制进展及下步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一审庭审中的信息显示，在具体的生产上，程生祥称自己主要负责带着孔令曦生产U47700（一种医药中间体）之类的产品，刘迪森则带着郭彬生产芬太尼、 α -PVP，不过有时候也会互相帮忙。刘迪森说：“因为公司只有我们几个人，也不存在明显的分工，生产的时候我都有参与。”

程生祥的父亲程连喜曾到公司看过一次。据他回忆，厂房总面积大约有600多平方米，白墙、地面全部刷着深绿色的防静电地坪，里面大概划分为研发车间、原料库房、成品库房、办公室等四五个区域，其中研发和制造区比较空旷，只摆了三四张工作台，上面放着许多玻璃器皿，每个功能区域门口都贴着泡沫板制的介绍名牌，墙上还挂着操作规范。

正是由于公司所在的位置是正规园区，同一层还有其他公司，所以在徐青看来，丈夫刘迪森一直很敞亮地做事，她从未想到丈夫会跟毒品沾上边。

公司的工资由伍敏负责发放，孔令曦和郭彬的工资比较固定，每月5000元，没有分红。庭审中程生祥说，自己每个月的工资不太固定，有发一两万元的，也有发五万元的。对于刘迪森的收入情况，徐青说自己不是很清楚，“不是很固定，要看他们接的订单。这份工作和原来相比在经济上没有太大提升，他们是奔着创业去的，也想把公司越做越正规”。

刘迪森被抓时，徐青刚怀孕两三个月，如今孩子已经三岁半了，还没见过爸爸。接受财新采访时徐青边掉眼泪边自责，“他每个月具体挣多少钱我都很少过问，出事之后我也在反思是不是对他的关心太少了”。

程连喜告诉财新记者，因为儿子是学化学的，社会上诱惑又多，自己一直对毒品有所提防，总是对程生祥旁敲侧击加以提醒，程生祥则反复向其保证不会做违法犯罪的事。开公司后，程连喜常问儿子月收入如何，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几千元。

直到2016年11月底，家住武汉的程连喜和妻子到市里找孩子们一起吃饭，再次问起工资收入，程生祥告诉他上月分了十几万元。程连喜开心不起来，训斥儿子，“干什么能一个月十几万元？你小子不会在制毒吧？”

程连喜回忆，儿子程生祥也按捺不住情绪，“制毒制毒，你怎么老说我制毒？我都说了我不会去制毒！”父子二人吵得不可开交，程生祥被母亲拉到一边安抚，他告诉母亲，自己可能“踩了黄线”。不过他后来又向父亲解释道，是之前客户未付的货款到账了。饭局散后，程母跟程连喜说了“踩黄线”一事，但此时程连喜顾及儿子对他意见很大，自己又不懂，也就没找程生祥问个究竟。

几天后，程连喜跟朋友聊起对儿子“走歪路”的担心，朋友提到，“今年好像新出了一个毒品犯罪的司法解释”。程连喜当晚便告诉了程生祥，嘱咐他去看。

程连喜所说的司法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4月6日公布的《[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一条就涉及芬太尼：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芬太尼125克以上，应当认定为刑法第347条第二款第一项、第348条规定的“其他毒品数量大”。不过程连喜对财新记者称，自己后来并未问过程生祥有没有去看这个文件。

交易

格润康捷生产的芬太尼是一种白色粉末，按照伍敏的话说，略有一点说不出的化学味道。2016年七八月间，程生祥曾因呕吐、数天内暴瘦十几斤到医院就医过。他在一审庭审中称，可能是生产芬太尼或 α -PVP的过程中产生了气体粉尘，导致过敏。伍敏说自己也有过身体不舒服，在家躺了三天。

不过对于这些情况，他们的家属并不知道。伍敏的母亲刘文云、程生祥的父亲程连喜都表示是在庭审时才了解到。程连喜说，因为自己一直在外务工，他和程生祥见面时间不固定，有时一月见一回，有时几个月也见不上。

关于这家公司生产芬太尼、 α -PVP及交易的细节，武汉中院的一审判决书中做了记载。

据伍敏供述称，格润康捷是从2016年7月开始涉足这两种管制品的，共生产了三次芬太尼，第一次是8月份，生产了10公斤左右；第二次是11月份，生产了12公斤；第三次是12月份，生产了15公斤，芬太尼成品还在公司。 α -PVP则总共生产了四次，第一次生产了三公斤，后三次各生产了五公斤，共18公斤。

销售是通过网络。2016年8月生产的10公斤芬太尼卖给了河南的一名外贸商，当时伍敏和这名买家通过QQ认识；第二次生产的12公斤卖给了两个客户，也是通过QQ认识的，其中10公斤卖给了石家庄一客户，另外两公斤分两次卖给了南京的一个客户；第三次的15公斤还没有出售。伍敏说，公司刚创办时是生产和销售医药中间体，在与河南客户的交易过程中，“他向我提出能否生产芬太尼，我与两个合伙人商量后，让客户把芬太尼的分子式发给我们看一下，我们三人看了后认为做得出来，所以就开始了”。生产芬太尼的原材料都是伍敏从网上进的

货，通过[支付宝](#)付货款。

格润康捷对芬太尼的售价大概是每公斤1万多元。河南外贸商买了10公斤芬太尼，每公斤1.2万元；石家庄的客户是每公斤1万元；南京的买家则是同案被告人王道化。伍敏说，当时王道化在网上找到了他留下做推广用的QQ号，刚开始买的是U-47700，2016年11月，王道化提出要购买两公斤芬太尼，并要求分两次发货。

伍敏给王道化最后一次发芬太尼是在2016年12月21日，收货地址为江西南昌安义县某地，货名为食品添加剂，收件人季小辉。据王道化供述，他之所以找伍敏购买芬太尼，是因为一个QQ名为“小虎外贸”的人找他购买，“小虎外贸”是本案中的另一被告人王盈波，收货地址和收件人都是王盈波指定的。

2016年11月，王盈波还通过QQ聊天向赵融冰（另案处理）购买三公斤 α -PVP，赵融冰随即联系伍敏购买。12月23日中午，赵融冰在收到王盈波支付的货款1.97万元及收货地址后，向伍敏的银行卡打了1.45万元货款。伍敏收到货款后，将制造好的三公斤 α -PVP封装打包，正在准备寄出快递时，伍敏被公安人员抓获。

而在此交易过程中负责收货的“季小辉”，就是本案的另一被告人季学拯，收货地址也是季学拯的地址。

王盈波在供述中称，他之所以要找人购买两公斤芬太尼，是在某国外聊天软件上认识了一个人，2016年11月，对方问他有没有芬太尼和其他一些产品。

一审庭审中，伍敏称自己并不知道王道化买芬太尼是做什么用；程生祥、刘迪森也称，自己只负责生产，并不知道产品卖给谁、销往哪里；作为中间人的王道化则说不清楚芬太尼会流向哪里。在回答公诉人发问时，王盈波说自己所买的芬太尼准备销往国外，但具体国家记不清了，只记得有美国，他说自己没有告诉过季学拯包裹里是什么东西。

案发后，公安机关在格润康捷公司生产车间共查获芬太尼20712克， α -PVP4161.1克。公安机关还对格润康捷公司内、快递公司接收到的毒品疑似物进行了提取和取样，鉴定结果显示多份检材为芬太尼和 α -PVP；另有样品中检出卡芬太尼、呋喃芬太尼等当时尚未列管的新精神活性物质成分。一审判决书显示，经鉴定，查获的芬太尼含量均在57%以上，查获的 α -PVP含量均在73%以上。

财新记者注意到，伍敏等人涉毒案的一审判决书中提及，2012年最高检、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中提到，本规定中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它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体品种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卫生部发布的《麻醉药品品种目录》《精神药品品种目录》为依据。

而刘迪森的二审辩护律师认为，因为麻精药品具有双重属性，无论通过合法渠道销售还是非法渠道销售，只要被患者正常使用发挥疗效作用的，就属于药品；只有脱离管制被吸毒人员滥用的，才属于毒品。因此被列管的麻精药品并不等同于毒品，也并非所有非法贩卖麻精药品的行为都应当被认定为贩卖毒品罪，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一审中有部分被告人和辩护人提出，涉案芬太尼和 α -PVP未流入毒品市场或者吸食毒品的人员，因此不构成贩卖、制造、运输毒品罪。但一审法院对此辩护意见并未采纳。判决书提及，王盈波和季学拯在公安机关曾多次供述涉案毒品是通过他人代发往美国等地，收取国外的汇款。另案处理的两名从伍敏处购买芬太尼和 α -PVP的被告人在广州被起诉，起诉书显示，两人将购买的芬太尼、 α -PVP走私、贩卖给美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巴西、法国、德国、尼泊尔、荷兰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武汉中院认为这些供述之间能够相互印证，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实涉案毒品提供了医疗机构使用，综合本案证据，涉案被告人的行为均应认定为毒品犯罪。

刘迪森的二审辩护律师认为，关于芬太尼和 α -PVP的流向问题，目前只有广州市检察院的起诉书以及被告人供述等证据，而广州检察院的起诉书还需经过被告人质证和法院审查才能确定，因此不能完全根据起诉书记载的内容来认定本案事实；而即便有这些证据，目前仍没有确

定的直接证据证明本案中的毒品真的流向了国外的吸毒者，因此本案有关芬太尼和 α -PVP的流向问题并未查清，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此外，按照伍敏等人的供述，芬太尼的价格为每公斤10000元—15000元， α -PVP每公斤4500元，目前没有证据证明伍敏等人售卖的价格远远高于正常药品的价格。

从二审判决书来看，湖北省高院并未采纳被告人及辩护律师提出的案涉毒品未流入社会等上诉理由和意见。

法院认为，现有证据证实伍敏等人多次制造毒品，并以网上洽谈接受毒资邮寄毒品的方式进行交易，在公安机关实施抓捕前，已有部分毒品流向社会，且本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案涉毒品被作为医药用途，供医疗机构使用。

是否知情？

2019年1月17日和9月25日，该案八名被告人先后两次站在武汉中院的法庭上接受审判。从中国庭审公开网公布的庭审画面来看，格润康捷的五名年轻人和普通的大学毕业生并无什么区别，步入社会几年，还稚气未脱。伍敏白白净净，在法庭上或是有些紧张，被发问时那双戴着手铐的手不停握拳，然后松开；程生祥长得高瘦，双手搭放在身前，回答法庭提问时要弯腰低头对准话筒，说完总要抿一抿嘴。



2019年9月25日，伍敏、程生祥等八名被告人在武汉中院的法庭上接受审判。图/中国庭审公开网

一审庭审中，面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八名被告人都提出了同样的异议，即自己并不知道芬太尼是毒品，也不知道 α -PVP为列管物质。

不过对芬太尼的认识，中间有一次转折点。2016年11月左右，程生祥在网上看到一起湖北黄冈的毒品案涉及氯卡西酮，其中也提到了芬太尼，称芬太尼有类似的作用。伍敏说，之前大家都不知道芬太尼是管制物品，是11月份下载了芬太尼的资料才一起知道的。

刘迪森在法庭上也说，是2016年11月伍敏口头通知他之后才知道芬太尼是管制药品，但他认为他们生产的某种芬太尼物质与芬太尼有区别，顶多是违规行为，被发现的话就是罚款或者公司关停，不涉及违法行为，“我自己不知道，也没查过是毒品，如果知道我肯定不会生产这个东西的”。

庭审中公诉人认为，伍敏等人“最后一次生产时已经知道芬太尼是管制物品，但想留住客户，所以还是生产了”。伍敏对此予以否认，他说最后一次生产时仓库里的芬太尼是之前不知情时做的，知道芬太尼是管制后，当时找了很多借口，拖了很长时间，不想卖给王道化，但是中间有一些原因，“他那边急着要，我实在没办法了，从我的芬太尼里拿了两公斤卖给他。”

判决书中的记载也显示，伍敏三人在得知芬太尼是管制物品后本不想再做了。但刘迪森供述称，当时伍敏说南京客户要得紧，又有一些原料别浪费了，就生产了最后那批芬太尼。

面对公诉人“你怎么认识你们生产的東西”的发问，程生祥回复道：“我之前供职于一家药业公司，他们是专门做原料药的，后来在武汉赛狮做化学中间体，我认为我们生产的是医药中间体。”伍敏也说，因为上一家公司也做这些东西，所以他们跟着也做，不是主观上故意要做。

财新记者注意到，伍敏、程生祥、刘迪森到案后均交代了原来工作的武汉赛狮也有制造、贩卖毒品的行为，公安机关据此抓获了武汉赛狮多人。伍敏三人也因此被一审法院认定有重大立功情节。

对于 α -PVP，伍敏、程生祥都说直到被抓也不知道是列管物质，刘迪森说是进了看守所之后通过法律学习才知道的。

伍敏有在药企工作经历，程生祥、刘迪森、郭彬、孔令曦都为化学相关专业毕业。有相关药物或化学学历和工作经历的几个创业者，为何会对毒品如此不敏感不知情？

判决书中记载的一些证人证言与此有关。孔令曦就读学校的一名师的证言显示，孔令曦是他2007级的学生，他教的是有机合成单元课程，主要讲授物质间的合成规律，还有一门课是有机化学，也是教授化学分子式合成。没有专门一堂课会讲国家管制精麻药品，但是会在课上涉及到这方面时提到常见毒品，让学生引起注意，以后不要接触。上课时也讲过许多化学药品是国家管制的，提醒学生参加工作时不要去生产毒品。

北京理工大学的一位副教授以及郭彬的同学、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的证言提到，作为一个正常化学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知道原料的分子式结构，应该可以知道合成出来的物质的大概分子式，即使不知道全名是什么，也可以通过查询资料得到该物质的名称和性质。

从一审判决书来看，武汉中院并未采信被告人称自己不知情的说法，认为被告人伍敏、程生祥、刘迪森、王道化、王盈波、郭彬均具有大学文化，受过高等教育，伍敏、程生祥、刘迪森、孔令曦、郭彬等人还有在其他药物化学公司工作的经历，较常人对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类药品有更多的认知，且伍敏等五人供述分别于2016年8月、10月、11月等时间知道芬太尼是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为谋取高额利润，仍实施制造、运输和贩卖行为。结合公安机关查获的毒品，说明伍敏等人明知芬太尼和 α -PVP是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仍继续实施了制造、运输和贩卖行为，系故意实施毒品犯罪。

二审法院延续了一审法院的观点，对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主观不明知芬太尼是毒品的意见未予采纳。□

注：本文刊发于《财新周刊》2021年第9期，原题为：芬太尼无创业

版面编辑：吴秋晗

财新周刊 | 前瞻2021政策正常化之路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2021年全国两会信息显示，中国再度设立经济增长目标，财政支持力度明显高于预期，货币政策边际收紧，更加着眼中长期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开始破题

[《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于海荣

新冠疫情后的第一年，2021年中国经济发展逐渐回归常态，宏观政策也逐渐正常化。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重新设定增长目标，政策收紧力度低于预期。

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政府并未设定增长目标，为2003年以来首次。2020年四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6.5%，已经超过疫情前的水平。尽管在上年低基数的推动下，2021年增速强劲反弹已成定局，但是，政府工作报告中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相对保守，仅为6%以上，与疫情前数年的目标相衔接。

疫后第一年就重新设定增长目标，超出市场预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做政府工作报告时表示，经济增速是综合性指标，预期目标设定为6%以上，考虑了经济运行恢复情况，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经济增速、就业、物价等预期目标，体现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要求，与今后目标平稳衔接，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鉴于2021年增长目标易于实现，宏观政策逐步回归正常化，但财政政策支持力度仍超出预期。2021年财政赤字率从上年的3.6%以上降至3.2%左右，但由于GDP（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扩大，实际赤字规模下降并不多，仅下降1900亿元至3.57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不再发行，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规模也仅微降1000亿元，为3.65万亿元。而此前市场多预测财政赤字率将降至3%左右，专项债券新增额度降到3万亿元左右。

货币政策方面，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相比2020年的“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呈现一定收紧。

与此前五年计划开局之年不同，2021年全国两会着眼于中长期，按“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将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实化量化，要求着力提升发展质量效益、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

重设增长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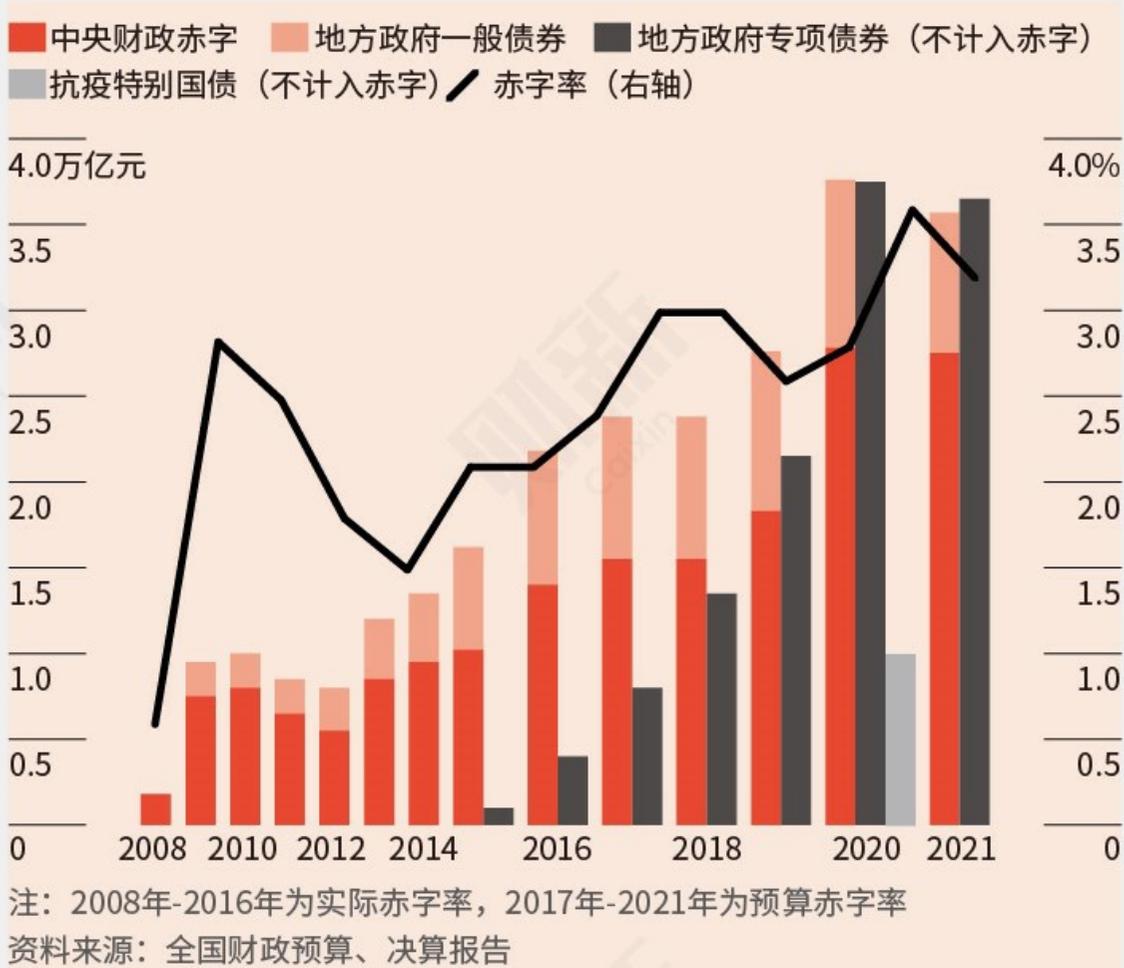
新冠疫情暴发后，不确定性陡增。鉴于此，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并未设定增长目标，虽然财政赤字率等指标设定中隐含了名义GDP增速，但与以往相比，传递出更强的淡化增速的信号。

由于2020年基数较低，市场普遍预期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将反弹至8%以上，甚至达到9%。在这种情况下，实现6%以上的增长目标，难度并不大。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称，这一目标对政策基调的意义不大，并不意味着宏观政策将显著收紧。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在两会“部长通道”上称，从今年1—2月情况看，中国经济延续了去年下半年特别是四季度以来的走势，保持了稳中向好的态势，有信心、有决心、有实力、有底气实现今年的目标任务。

财政扩张力度下降

2008年以来政府新增债券限额和赤字率走势



[点击见大图](#)

不过，在疫情复苏后的第一年就重新设定增长目标，多少出乎市场意料。此前研究者对2021年是否恢复设定增长目标存在一定分歧。

部分市场人士认为，2021年可能继续不设定增长目标。理由是，一方面疫情发展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低基数会导致2021年增速较高，根据潜在增速设定增长目标会过低，而8%以上的增长目标则会引发较大的误读，2022年恢复常态后目标下调或将引发担忧。在他们看来，不设定增长目标只是暂时的，2022年中国将根据潜在增速继续设定增长目标。

不过，最终中央政府还是选择设定2021年增长目标。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近日接受中新社采访时称，2020年未设增长速度目标是因为情况太特殊，在疫情得到控制的情况下，今年还是应提出增长速度目标。因为这跟中国长远目标密切相关，2035年远景目标要求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含有定量指标的目标。从未来实现现代化国家

的目标来看，有必要设定增长速度目标。

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孙国君在国新办吹风会上表示，把经济增速的预期目标设定为6%以上，综合考虑到多方面因素，包括经济恢复情况、基数因素和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他称，在确定今年GDP预期目标时，不仅要考虑今年的情况，也要统筹考虑明后年，尽可能做到预期目标在年度之间不要忽高忽低，能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运行。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宏观研究负责人王静文称，如果要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必须保持一定增速。今年实现6%以上的目标压力不大，更重要的考量是与今后目标的平稳衔接以及引导各方关注高质量增长。

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年回落，经济增长预期也分别在2012年和2015年下调至7.5%和7%左右。2016年首次采用6.5%—7%的区间形式，2017年和2018年增长目标则设定为6.5%左右，2019年再次采用区间形式，将目标设定为6%—6.5%。

增长目标设定相对保守，更重视平稳衔接，在此前省级两会上已有体现。财新记者统计发现，各省份设定的2021年增速目标明显低于市场预期，与2019年具有较强的延续性。31个省份中，有23个省份将增速预期设定在6%—7.5%，最高的是去年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湖北和享有自贸区政策红利的海南，均为10%以上。

野村证券计算的各省份加权平均增速目标为6.8%。在过去的实践中，这一目标往往高于当年全国增长目标，2021年亦是如此。

除了重设经济增速，部分经济指标的预期目标也恢复常态化。2021年就业目标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其中，城镇新增就业较2020年增加2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下降0.5个百分点。

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就业一度面临较大挑战，2020年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骤升至6.2%，此后虽一路下行，但持续高于往年同期，直到四季度，随着经济逐步回归常态，才降至往年水平，2020年1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与上年同期持平。

[华泰证券](#)固定收益分析师张继强认为，2021年经济形势大概率好于去年，吸纳新增就业能力也将增强，各项就业指标有望较去年改善。但今年就业压力仍不容忽视，一是线下服务业如旅游、住宿、客运等，还未恢复常态，疫情仍存局部反复风险；二是制造业出口订单面临回流压力，部分产业转移也可能加快发生；三是去年农民工外出务工人数下降，对城镇失业数据起到缓冲作用，今年疫情稳定，外出务工人数增多也会给城镇就业市场带来挑战。

政府工作报告要求，2021年就业优先政策要继续强化、聚力增效。着力稳定现有岗位，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给予必要的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继续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扩大失业保险返还等阶段性稳岗政策惠及范围。

财政力度超出预期

为对冲疫情影响，2020年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空前：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6%以上；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较2019年提高1.6万亿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此后，2021年财政赤字率下降、不再发行抗疫特别国债、专项债券规模下降，已是各方共识。

政府工作报告将2021年财政赤字率设定为3.2%左右，连续两年超过3%，但由于GDP规模扩大，实际赤字规模下降并不大，从3.76万亿元降至3.57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不再发行；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也由2020年的3.75万亿元减少到3.65万亿元。按此计算，2021年新增政府债券规模比上年减少1.29万亿元，但较疫情前的2019年，仍然高出2.31万亿元。

这一力度超出市场预期。此前瑞银、摩根士丹利和野村等机构均预计财政赤字率将降至3%左右；不再发行抗疫特别国债；专项债的新增额度从3.75万亿元降到3万亿元左右。只有少数机构预测赤字率为3.3%左右，新增专项债规模在3.6万亿—3.7万亿元。

陆挺称，赤字率和专项债券新增限额明显高于市场预期，显示政策不会急转弯，政策回归正常化的步伐是温和的，但也显示地方政府对债务依赖性较强，压减债务规模难度较大；同时，也会对土地出让收入下降、房地产投资放缓起到一定对冲作用。

预算报告称，考虑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和经济逐步恢复，赤字安排既体现财政政策的积极取向，又释放出“大水漫灌”式强刺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明确信号，并为今后应对新的风险挑战留出政策空间。

对适度减少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预算报告称，主要是已发行的专项债券规模较大，政策效应在今年仍会持续释放，也有利于防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风险。目前抗疫等一次性支出大幅减少，地方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保基本民生等支出可以通过正常渠道给予保障，因此不再发行抗疫特别国债。相应地，不再实行特殊转移支付，回归执行正常转移支付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2021年赤字结构发生明显变化。3.57万亿元赤字中，中央赤字2.75万亿元，地方一般债券8200亿元，分别较2020年下降300亿元和1600亿元。其中，地方一般债券规模已降至2017年以来最低，1600亿元的降幅也远超专项债券降幅。

预算报告称，在实际新增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压减本级、调整结构，增加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对地方转移支付安排83370亿元，比2020年略有增加，但一般性转移支付增长7.8%，增幅明显高于去年。

不过，地方一般债券新增限额不增反降，且下降规模高于专项债券限额，与各方预期相悖。此前多位财政人士都呼吁，增加地方一般债券占比，防止部分地方政府将经常性项目包装成收益性项目，通过专项债解决一般性问题，进而导致债务缺乏长期可持续性。

与一般债券不同，专项债券要求对应项目有一定现金流收入。2020年新增抗疫特别国债、专项债规模大幅增加，导致实际执行中，难以快速匹配到符合要求的项目，部分资金出现闲置。与此相关的，与2019年和2020年均在上年末就提前下达部分额度不同，2021年限额下达时间明显要晚。

为避免资金闲置，2021年专项债仍将坚持“资金跟项目走”原则，适当放宽发行时间限制，合理扩大使用范围，优先支持在建工程，不得盲目举债铺摊子。

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称，包括政府预算赤字、土地出让净收入、基建相关的地方政府平台债务及其他准财政支出在内的广义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减弱，意味着基建投资增速可能有所放缓，但可再生能源、5G和其他数字基建等“新基建”，以及公共交通网络建设方面的投资会继续快速增长。

为对冲疫情影响，2020年中央对新增的1万亿元财政赤字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采用财政资金直达机制，仅用20天时间，就将90%的中央直达资金下达市县基层，省级财政细化下达时间平均只有1周。

2021年中央财政直达资金范围扩大，将直接用于基层财力保障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年初可直接分配的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具备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纳入直达机制范围，涉及中央财政资金2.8万亿元，基本实现中央财政民生补助资金全覆盖。

为救助企业，2020年出台了多项阶段性减税政策，带动新增减税降费规模超过2.6万亿元，再创新高。财政部部长刘昆在“部长通道”上表示，对2020年出台的阶段性减税降费政策，在研究论证基础上，部分适当延长执行期限，部分到期后停止执行，不搞急刹车。2021年制度性减税降费政策将继续实施，政策叠加效应将持续释放，企业和个人减负会越来越明显。

政府工作报告中称，延长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优惠等部分阶段性政策执行期限，实施新的结构性减税举措，对冲部分政策调整带来的影响。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征点从月销售额10万元提高到15万元。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得额不到100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

货币政策权衡增长和风险

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表述一致，政府工作报告对货币政策的表述是“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具体要求是，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处理好恢复经济与防范风险的关系；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宏观杠杆率基本稳定。

王静文称，2020年年中以后，随着经济增速反弹和杠杆率飙升，央行“把服务实体经济放在更突出位置”的要求逐渐淡化，货币政策由疫情期间的明显宽松转向边际收紧，并重提“把好货币供应总闸门”。从政府工作报告的表述看，货币政策仍需要在防风险的前提下做好支持实体经济工作，尤其是中小企业。

与2020年经济增速大幅放缓、但“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明显高于去年”的表述相比，“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意味着货币政策边际收紧。

杨伟民近日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货币政策的宽松或紧缩，主要衡量标准就是货币供应和社会融资增长同名义GDP增速的比较。2020年货币供应M2增长10.1%，大大高于GDP3.2%的名义增长，两者之差高达6.9个百分点，是相当宽松的。今年货币政策要回归常态，货币供应可以略高于名义GDP的增长，但不会有6.9个百分点这样的大幅之差。

“货币政策正常化的节奏可能会根据经济形势和市场状况随时微调，以反映疫情相关的不确定性、信用市场和市场利率的波动。”汪涛认为，由于全年CPI（消费价格指数）增速不到2%，低于政府设定的3%左右的目标，影响货币政策正常化的主要因素是政府在防风险和控杠杆方面的考量。她预计，信贷增速放缓主要来自减少流动性投放、收紧宏观审慎措施、降低政府债券发行规模，以及持续规范影子信贷。

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3月2日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预计今年贷款利率会有回升，一度被市场理解为“口头加息”，当天股市盘中跳水，上证综指从微涨转为收盘下跌1.21%。不过，研究者普遍认为，这是误读。曾在央行供职过的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认为，郭树清所指的是实体部门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2021年可能出现一定幅度回升，但数据上行属于宽松工具退出的自然结果，而非央行加息。

其理由是，一方面，2020年疫情后投放的低息贷款陆续到期，另一方面，当前货币政策首要目标由缺失切换至金融稳定，货币政策转向稳健中性，货币环境收敛将推高市场利率水平，进而向信贷利率传导。

在他看来，当前监管部门高度关注风险问题，防范化解风险将是政策重心。货币政策因首要目标将切换至金融稳定而收紧，金融稳定不仅包括宏观杠杆率，也包括地产领域风险及金融市场杠杆率等。

应对新冠疫情暴发而推出宽松政策的一大后果是，宏观杠杆率快速攀升。根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测算，2020年中国宏观杠杆率已达270.1%，较2019年上升23.6个百分点，这一升幅仅次于2009年。

张继强认为，虽然今年宏观环境有望好转，但仍是疫后恢复期，经济有待巩固，尤其是总量火热的表象下，结构分化更为突出，经济木桶仍存短板。如果货币政策过快收紧，不但会阻碍经济内生修复，还可能触发风险，例如信用违约增多、银行不良率攀升、地产周期加速下行等。因此，货币政策的KPI从降低融资成本转为稳定宏观杠杆率，但还未到去杠杆阶段。

除了国内风险，货币政策还面临海外风险传导和跨境资本流动的挑战。为应对疫情，全球主要经济体都推出了宽松政策，2020年11月末，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比2019年末分别扩张73%、47%和23%，扩张速度空前。

郭树清称，这些政策副作用已经逐步显现。首先，欧美发达国家金融市场高位运行，和实体经济严重背道而驰，迟早会被迫调整；其次，由于经济已经高度全球化，流动性增加以后，外国资本流入中国数量会明显增加。中国经济目前还是恢复性增长，资产价格有很大的吸引力，和其他国家相比利差比较大，外国资本流入是必然的。

“目前来看，规模和速度还是在可控范围内。”郭树清称，也在继续研究如何采取更有效的

办法，一方面鼓励资本要素跨境流动，越来越开放；另一方面，又不能造成国内金融市场太大的波动。

新发展格局如何构建

与此前五年规划开局之年不同，2021年全国两会更着眼中长期，“十四五”期间的目标任务还考虑到与2035年远景目标的衔接。

提请全国两会审议的“十四五”规划草案，在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生态、安全保障五方面设置了20个指标，其中粮食安全和能源安全指标为首次设置。何立峰称，这20项指标充分体现了新发展理念的要求，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进行了充分对接。在具体指标值的设定和测算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同时也为应对不确定性预留了空间，这些指标就像奋力一跳就可以摘到的桃子，但是“必须奋力一跳”。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何立峰透露，国家发改委正在会同相关方面，抓紧做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顶层设计，也就是“1+N”，其中“1”是要出台一个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指导性文件，“N”就是根据不同领域，出台一系列指导性的政策和方案。同时，对影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各种堵点、难点、卡点，抓紧梳理、汇总、分类，力求提出更有针对性、实效性的解决措施。

杨伟民对财新记者表示，中央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激发结构性红利和体制性红利。从中期来看，增长速度的高低，取决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看起来是一个发展问题，但本质上是改革问题，所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进展，取决于改革进展。他举例称，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在生产端，有利于延长人口红利即增加劳动者一生的工作时间；在收入端，有利于每一个农民工都形成自己的终身职业，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他们一生的总收入；在支出端，有利于扩大他们的消费，支撑全国的消费扩大。“农民工市民化可以畅通生产、分配、支出三个环节，但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改革。”

各方的共识是，要构建新发展格局，离不开内需市场的发展。汪涛认为，这意味着政府会继续通过结构性改革来释放国内增长潜力和拉动内需。具体措施可能包括：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费购买的规定和进一步简政放权；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提高国企效率；支撑民企和服务业发展；深化土地和户籍改革；完善社保体系和促进公共服务更加均等化等。

杨伟民也表示，中国未来的增长，从需求侧看，最主要的是要扩大居民消费。其中主要有两条重要措施：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使居民收入的增长快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增长；二是减轻消费压力，主要是减轻房价、房贷对居民消费的压力，防止房价、房贷增长快于居民收入增长，特别是在特大和超大城市要建立租购并举、以租为主的住房制度。从供给侧来看，要提高消费型产业的供给。

对改善收入分配，多位接近决策层的研究人士对财新记者称，有些措施是必须要推出的，比如房地产税、宅基地改革等，但相关改革进展缓慢，亟须加速推进。

与提高消费型产业的供给相关的是，纲要草案提出“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并要求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推动房地产与实体经济均衡发展。

杨伟民表示，这主要是针对2013年后制造业占GDP比重下降幅度太快的情况提出的。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和消费同时放缓，导致工业增长放缓。而服务业比重的提高中，房地产业和金融业贡献率最大，达到52%。但金融业中银行业增加值增加过快，意味着制造业市场主体的负担加重，对制造业的供给形成挤压。而房地产则对居民消费形成挤压，表现为城镇居民消费率下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放缓，又导致了工业增长放缓，加大了经济下行压力。而2018年，银行业和房地产两个行业的营业盈余占了153个行业营业盈余总量的30%。在他看来，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是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的重要措施。

构建新发展格局另一重点是培育创新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汪涛认为，这意味着政府应继续鼓励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着力解决一批“卡脖子”问题，并增强知识产权保护。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期间将加快构建以国家实验室为引领的战略科技力量，打好

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案。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以上、力争投入强度高于“十三五”时期实际。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提醒，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涉及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问题，有两方面因素使之现在变得更加突出：一是中国控制疫情最有效，经济复苏也最快，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夸大“政府管控”在经济中作用的乐观情绪；二是现在中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遇到很大困难，特别是技术领域，似乎进一步增强了对“自主创新”特别是政府作用的期待。

“政府管控能力在应对危机时有明显优势，但不一定能替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的作用，面对创新与产业升级的挑战时更是如此。”黄益平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好的模式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结合。但“有为”到什么程度仍值得讨论。需要避免在后疫情时期形成对政府作用的过度自信，资源配置与定价的功能还应由市场承担。□

文中嵌入视频为：[直播回放 |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开幕会](#)

视频说明：2021年3月5日上午9时，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开幕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版面编辑：吴秋晗

专栏 | 美国如何摆脱“刺激陷阱”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一年内出台三轮刺激政策或使美国陷入刺激陷阱，要摆脱这一陷阱，需在推进刺激政策的同时，配以改革教育体系、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增加储蓄等三项改革



当地时间2021年3月1日，美国纽约街头。图/人民视觉

文|魏尚进

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讲席教授
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拜登政府力推的1.9万亿美元刺激计划引发争议，美国前财长、民主党人士劳伦斯·萨默斯和多位共和党人士均认为规模过大，或过快推升通胀。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美国是否正陷入“刺激陷阱”？

这一刺激计划是联邦政府一年内第三次试图提振经济的尝试。此前两轮刺激计划导致资产价格飙升，尤其是股市与房地产价格涨幅远超工资，美国本已很大的贫富差距或将进一步加剧。这促使人们提出诸多建议，包括提高税率、提高法定最低工资，以及更为慷慨的收入转移计划。

拜登2月中旬再度表示计划在四年内将联邦最低工资从7.25美元/小时提高至15美元/每小时。即便这不会成为新一轮财政刺激的一部分，随着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也会在此后获得更多支持。

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本意是帮助穷人。但是，法律能迫使雇主向工人支付最低工资，但不能强迫其雇佣员工，或在低薪部门开设更多企业。15美元/每小时的联邦最低工资可能打击就业创造水平，尤其在低技能部门，进而让许多人将就业和经济疲软作为下一轮刺激政策的理由。

下一轮刺激政策将引发另一波资产价格飙升，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并引发要求更高税收及提高最低工资的呼声，这将进一步削弱投资与就业增长，并证明继续实施刺激政策的“合理性”。这将让美国陷入刺激陷阱。

这种情境并非不可避免，要摆脱刺激陷阱，需要在出台刺激措施的同时，辅以三项配套改革。

首先，美国必须改革教育体系，让更多劳动者能从事收入水平更高的工作，减少可贸易部门与低薪的中国和墨西哥乃至收入水平更低的印度和越南劳动者重合的技能和岗位。政策制定

者需要认识到，美国低技能劳动者占比过大，当前的教育体系没能较好地服务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为已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劳动者提供更好的再培训，亦会有所帮助。

其次，在让所有美国人维持体面生活的同时，政策制定者应致力于让劳动力市场变得更灵活。可借鉴北欧国家比如丹麦的“弹性安全”模式，允许雇主根据市场条件变化灵活地雇佣、解雇以及调整工资水平，同时为下岗工人提供社会安全网。这一灵活但可靠的合同工作安排，会鼓励企业家开设企业，创造就业机会，同时也会激励劳动者终身学习，社保体系可以为就业转换提供足够的日常开支支持。

需要注意的是，在一个设计良好的“弹性安全”体系中，最低工资的增幅应与生产率的增长及移民政策保持协调。如果最低工资增幅超过生产率增长水平，劳动力市场会出现分层。一些幸运的低技能工人会保住他们的工作、获得更高薪资，同时也有许多低技能工人无法以法定工资水平找到工作。

而在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的同时放宽移民政策，可能导致低技能移民劳动者的涌入。如果他们在灰色市场上以低于法定最低水平的工资找到工作，低技能的美国劳动者日子将变得愈发困难。

笔者并非简单反对引入移民或工资增长，而是强调需要统筹考虑最低工资调整、劳动生产率增长，以及移民政策。

第三，为中低收入者提供更容易获得的低成本财富管理工具，同时提高其金融知识水平，来鼓励其增加储蓄。当前，美国家庭部门储蓄占收入的比例仅为12%—14%，远低于德国、日本和中国。收入水平最低的40%的美国人几乎不做储蓄。这意味着，每当资产价格上涨快于工资时，他们的相对财富水平就会进一步下滑。不少人认为低收入家庭收不抵支。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艾斯特·杜芙洛、奥巴马政府时期预算管理办公室主任Peter Orzag等人的研究表明，如果低收入人群拥有正确的知识及工具，他们可以储蓄。如果美国人的储蓄增加，投资率也会增加，推动经济更快增长，这将降低未来对刺激政策的持续依赖。□

版面编辑：吴秋晗

财新周刊 | SPAC魔盒狂欢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2.5万美元撬动千倍杠杆，吸引“各路大神”争当发起人设立SPAC，被呼作“大佬的盲盒来了”



SPAC是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的缩写，意即通过空壳公司IPO募集资金后，收购有实际业务的目标公司完成上市。图/视觉中国

[《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岳跃 特派香港记者 周文敏

华尔街近年来异常火爆的SPAC（特殊目的收购公司）上市机制，香港市场和新加坡市场欲纷纷效仿。在谈借壳色变的A股市场，SPAC短期内虽几无可能出现，但中国本土私募跨海参与的汹涌热情不可阻挡。

目前，硅谷知名创业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名噪一时的风投人士Chamath Palihapitiya、软银孙正义、李泽楷等都已上市了自己的SPAC；而中信资本、弘毅投资等多家中资背景的大型PE机构争相入场，知名PE大佬如方风雷、胡祖六，甚至连沉寂多年的管金生、债务缠身但痴心汽车制造的贾跃亭等，也现身玩家之列。

SPAC是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的缩写，意即通过空壳公司IPO募集资金后，收购有实际业务的目标公司完成上市。具体而言，一般由有私募股权投资经验的专业人士作为发起人设立特殊目的公司；该公司只有现金，没有其他实质性资产，但作为一种特殊形式可通过IPO募资并挂牌上市；在SPAC上市后，一般需要在两年内找好收购标的，使标的企业不经过传统的IPO就能实现借壳上市。

对标的企业来说，传统IPO有多种不确定性，而在SPAC模式下，标的企业估值定价由合并双方确定，上市成功率高、时间短。对那些因业绩未达标或存在“历史问题”而不能直接递交IPO申请上市的企业来说，SPAC提供了一条捷径。

从普通投资者的角度看，参与SPAC的IPO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一种保本投资：选择了一个并购基金管理团队（即SPAC的发起人），并在管理团队确定收购目标时，投资者作为SPAC的股东，有权选择赞同或反对收购事项；赞同则可以继续担任合并后公司的股东，反对则收回本金退出。

其实，SPAC机制并非近年才出现。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股市场，SPAC的前身“空白支票”并购公司（Blank Check Acquisition Company）就已诞生。但随着一系列欺诈案件的发生，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逐渐完善相关规则，如要求“空白支票”并购公司必须将募集资金存入第三方信托账户、限定期限内完成收购等，SPAC才得以走向规范发展之路。

SPAC运作模式



[点击见大图](#)

美股市场SPAC年度上市数量长期以来都在两位数，但2020年突然激增至248家，融资总额834亿美元，分别占2020年美股445例IPO、1570亿美元融资额的55.73%、53.12%。进入2021年，SPAC有加速井喷之势；截至2月底，美股市场SPAC上市数量达到201家，融资规模接近650亿美元。

对于SPAC的突然火爆，市场分析认为：一是因为疫情影响，经济刺激政策压低利息，金融扩张、资金供过于求，充裕的资金需要寻找投资标的；二是疫情之下资本市场的高波动让传统IPO难度加大，提升了市场对SPAC这一机制的关注；三是随着越来越多大型机构、知名专业人士的参与，SPAC融资额屡创新高，并在2020年完成了一系列备受瞩目的并购交易，自然引起投资者兴趣，甚至出现了跟踪SPAC的ETF基金。此外，在近年私募机构募资难、退出难的大背景下，SPAC也被视为一种募资新选择而备受推崇。

一位资深的PE界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SPAC打通了一、二级市场，把流动性、风险、回报等多种因素都考虑在内；它还打通了各类投资者渠道，相当于PE基金的公开募集，不再仅限于少数合格投资者。“巧妙地把融资上市和M&A（兼并与收购）结合在一起，SPAC将来可能会成为PE领域的主流投资产品。”

不过，亦有投资界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SPAC类似于PE大佬的投资盲盒，成立时并不知道具体投资标的，主要依赖公众对SPAC发起人声望和名誉的认可，“发起人往往都是投资界的大佬或者是知名人士，散户天然有一种‘跟着大佬投资准没错’的心态”；但问题是SPAC后期收购的公司如果资质不佳，股价一落千丈，损失的还是跟风的散户。

SPAC 收益长期跑输指数

	完成 并购的 SPAC 数量	一年持有收益			三年持有收益		
		SPAC	美股 指数	与美股指数差 距（百分点）	SPAC	美股 指数	与美股指数差 距（百分点）
2012	1	-53.20%	20.40%	-73.60	-98.10%	37.20%	-135.30
2013	5	-30.10%	17.90%	-48.00	-41.10%	28.00%	-69.10
2014	4	-51.60%	5.70%	-57.30	-89.60%	26.70%	-116.20
2015	9	-19.50%	0.70%	-20.20	87.70%	33.10%	54.60
2016	9	-5.20%	19.00%	-24.20	-35.10%	40.30%	-75.30
2017	13	-11.00%	11.70%	-22.60	-46.50%	29.00%	-75.50
2018	23	-35.00%	8.80%	-43.80	-37.70%	18.40%	-56.10
2019	25	-2.00%	5.00%	-7.00	2.20%	10.60%	-8.40
2020	25	-5.90%	7.90%	-13.80	-5.90%	7.90%	-13.80
合计/ 平均	114	-15.60%	8.70%	-24.30	-15.40%	19.40%	-34.70

注：持有时间从并购交易完成后第一天开始计算；不足一年或三年的，以可用数据计算；美股指数采用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加权市场指数计算

资料来源：佛罗里达大学沃灵顿商学院2021年2月22日发表的论文《Investor Returns on the Life Cycle of SPACs》

[点击见大图](#)

最新的学术实证研究也表明，SPAC平均回报率仍低于传统IPO的回报率，且在并购完成后普通股的中长期收益远没有跑赢指数，总体亏钱。另外，和传统IPO相比，通过SPAC途径上市的综合成本也更高。

传奇投资人、97岁的伯克希尔副总裁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近日公开表示，SPAC对于尚未成立或尚未遴选出来的企业进行投资，是一种疯狂的投机，这也是一种恼人的泡沫信号，“我根本不参加。我认为没有它们（SPAC），世界会更好”。

“这种投机最终一定会有糟糕的下场，只是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发生。”查理·芒格说。

2.5万美元撬动千倍杠杆

只用出资2.5万美元，发起人就可以注册成立一家SPAC公司，然后向SEC递交IPO申请。由于空壳公司不需要详尽的历史财务报表，在信息披露上非常简单，SEC审核时间也短，一般八周时间就能完成一家SPAC公司的IPO。

早年间，SPAC只能在场外交易，之后放宽至纳斯达克市场，纽交所于2008年也放开了SPAC的上市。目前，没有收入和负债的空壳SPAC上市，使用的是2012年JOBS法案中新成长型公司的上市标准。

SPAC的股本是投资单位（unit），每一投资单位的认购价格为10美元；每个单位包含一股普通股（common stock）和部分的认股权证（warrant），二者在上市一段时间后可分开交易，即使投资者赎回了普通股，仍然可以保留认股权证。

认股权证能让持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以事先约定的价格购买一定股份。在SPAC运作中，认股权证的行权价格通常为投资单位价格的115%至120%，即11.5至12美元。IPO时普通投资者之所以只能获得部分认股权证，是因为每只SPAC有不同约定，有的投资单位中只包含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认股权证。也就是说，一位持有300股SPAC的普通投资者，今后在行使认股权证时，只能购入150股或100股股票。

根据现行做法，在SPAC启动IPO时，发起人可以获得IPO之后所有股份的20%，相当于发起人只支付了2.5万美元的壳费就获得了20%的股份。这部分股份被称作“提振激励”（promote），是对发起人在SPAC上市工作中劳动的补偿。值得一提的是，VC/PE有限合伙基金GP提取的附加收益（carried interests）一般也是在20%。有市场观点认为，SPAC的“提振激励”是从GP附加收益模式演变而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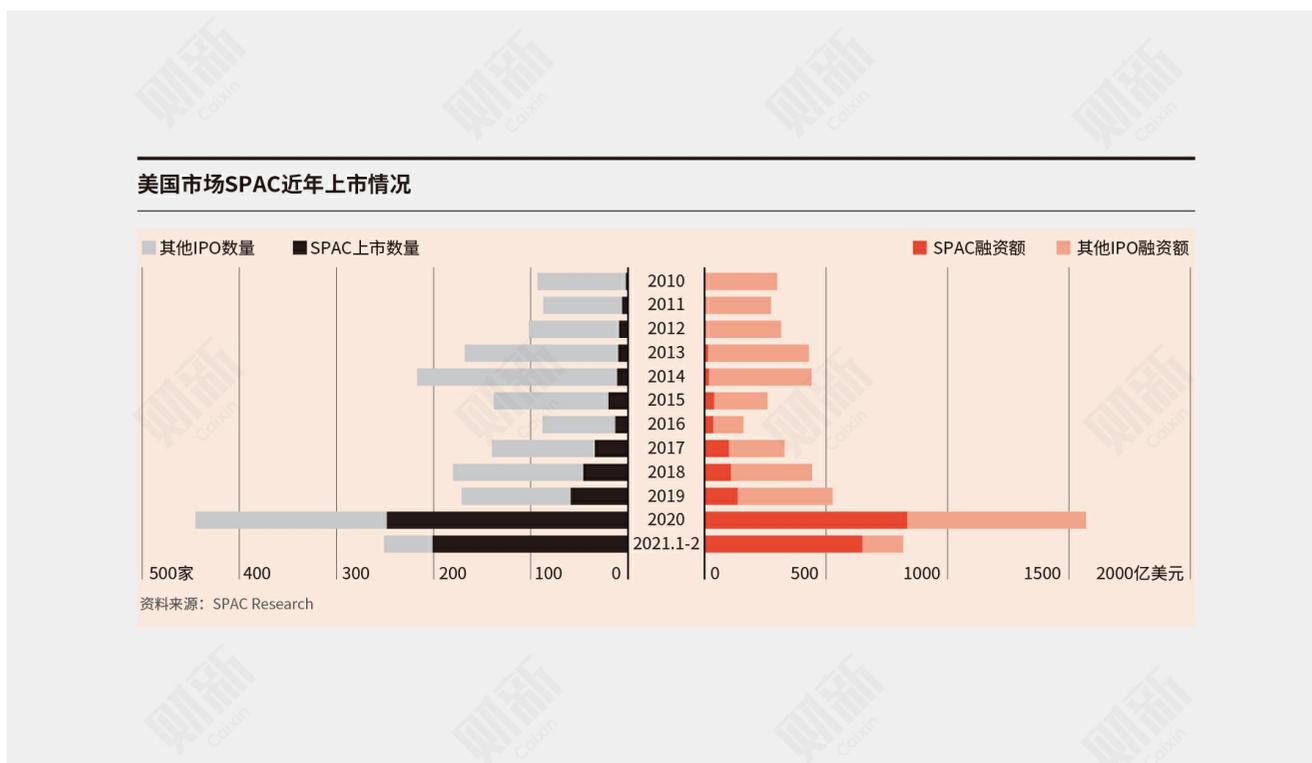
这一“提振激励”因有极高的投资回报率，被认为是发起人愿意组建SPAC的最大动力之一。一方面是因为这20%股份的获得几乎没有成本，收购合并完成后，这些股份可自动转换为普通股，有机会享受并购后期股价的增值。

另一方面，与普通投资者只能获得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认股权证不同，发起人可以获得与其持有的20%股份等额的认股权证，但这部分需要支付对价，通常每个认股权证以1.5美元的价格购买（即IPO时每一投资单位发行价的15%）；此外，在发起人行使认股权证时，还有特殊的无现金交易安排。

例如，某一只SPAC的发起人持有100万股该公司股票，此前以150万美元购入了100万份行权价格为11.5美元/股的认股权证。在SPAC并购交易后，公司股价上涨至15美元/股，发起人最多可以使用1150万美元购入市值为1500万美元的股票；同时，发起人也可选择无现金行权，将手中等值的76.67万股股票（15美元/股，市值1150万美元）抵充行权价。

正是这2.5万美元撬动的巨大杠杆，吸引全球各路知名投资人入局SPAC。李嘉诚次子李泽楷、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Peter Thiel）作为发起人设立的SPAC公司Bridgetown Holdings Limited（NASDAQ: BTWN）已于2020年10月在纳斯达克IPO。BTWN的这两位发起人以2.5万美元获得了287.5万股创始人股票。2021年3月1日收盘，BTWN报13.88美元/股，发起人持有的股份市值达到3990.5万美元——2.5万美元的出资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已增值近1600倍。

不过，作为SPAC的发起人，并不仅仅只付出2.5万美元。和传统的IPO一样，SPAC也需要承销商费用、律师费和日常运转的开销，而这部分资金通常就来自发起人认购认股权证的资金（如前述的150万美元）。此外，SPAC的承销费用（一般为上市募集资金总额的5.5%）可以分期付款，2%在SPAC上市时支付，剩余3.5%在并购交易完成时支付。这对发起人来说几乎不存在资金压力。



[点击见大图](#)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1月共有91只SPAC上市，上市首日股价平均上涨6.1%，这显著高于2020年的平均水平（1.6%），更远高于往年水平。一般来说，在IPO后的一段时间内，SPAC的股价都保持在初始发行价水平，且这期间成交量也通常较低；大多SPAC是在宣布并购交易消息时股价才会出现上涨。而现在，首日即大涨说明市场已经对SPAC重新定价。面对强劲的市场需求，不少SPAC的发起人也开始作出调整，例如减少SPAC在IPO时给普通投资者的认股权证数量，主动“降温”。

何不IPO?

“传统IPO是公司找钱，SPAC是钱找公司。”一名外资投行的人士对财新记者表示，通过SPAC上市也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首先SPAC要看得上标的公司，此外标的公司也想通过SPAC实现IPO，“跟传统的IPO和直接上市相比，标的公司其实只用参与SPAC的后半程，对标的公司而言是大大节约了时间和成本，最短三个月就能上市”。

新加坡管理大学教授张巍对财新记者表示，标的公司选择SPAC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上不了IPO，比如很多公司都试图IPO没成功，才转了SPAC；对标的公司创始人而言，IPO的成本也很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疫情期间显现出来的就是SPAC的收购价格比IPO价格确定得多，IPO受市场影响比SPAC大很多。孙正义投资的WeWork就是例子，它想IPO，结果遇到了市场重大抵制，预定的价格一跌再跌，现在它也走SPAC了。”张巍还称，通过SPAC上市时间短，没有IPO之前的静默期，更容易向市场推销。

前述外资投行人士也表示，对标的公司来说，通过SPAC上市定价更容易，只需要与SPAC协商价格，不需要像IPO那样多方多回合谈判。“SPAC的发起人都是自带经验和资源的投资界人士，标的公司也希望通过走SPAC上市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另外，合并时标的公司不必放弃太多控制权。不过，一般来说它们的体量和估值都不会太大，不然SPAC承接不了。”

根据SEC的规定，SPAC一般不得在IPO前锁定拟收购的标的公司，只能描述所属行业和地域；如果SPAC在IPO前确实接触了拟收购的标的公司，要做详尽的信息披露，这就会大大影响IPO的进程。

张巍表示，实际上很多SPAC的发起人早就看好了具体项目，“关键是在SPAC上市的时候，不能公开提及收购具体目标，但是宣传的时候可以把预期的收购对象描述得足够具体，就

尽在不言中了。很多是这样的，但是监管没有实锤也不好管”。

一家外资投行的亚洲股票资本市场部负责人也称，“其实很多私募在SPAC上市前就看好目标了，可能是长期关注的，不一定上市后就立刻注入；也可能是SPAC一挂牌就确定会注入某些资产，不用等两年那么久。现在不少SPAC都是这样，早就看好标的了。”

还有一种市场说法称，私募大佬设立的SPAC可能是为了给所在私募机构的被投企业IPO走捷径，或者是为了给旗下已发行的私募股权基金提供退出渠道，给LP一个交代。但这会涉嫌构成关联交易，在SPAC并购阶段会带来麻烦，或遭股东用脚投票。“不排除有某种巧妙安排，可以规避这些问题。”

高盛的一份研究报告称，2020年以来SPAC的标的行业已由价值转向成长。2010年至2019年间，一半以上的SPAC并购发生在工业、金融和能源领域；而在2020年，一半以上的SPAC并购标的公司来自信息技术、医疗健康、可选消费等领域。

“行业方面，其实创科或者一些医疗方面会比较多，因为这些市场都比较受热捧，投资者觉得这些领域未来爆炸性增长机会比较大。”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欧振兴说。

一般情况下，SPAC要在上市后的12个月至24个月内完成并购交易，如果在此期间没有找好并购标的或因故不能按时完成交易，在获得股东批准后可以延长SPAC的运作期限，否则将会清盘。若清盘，公众持股会按照原价10美元/股返还，而发起人将颗粒无收，并损失SPAC前期的各项运作费用。

在寻找好并购标的公司后，相关交易要获得SPAC股东的批准，否则就要继续寻找新的标的。根据SEC的规定，标的公司的市值要大约为SPAC所募资金的80%。而通常，标的估值都高于SPAC现金资产，此时SPAC要启动新一轮融资，最常见的是对机构投资者的定向增发（PIPE）。

随着2020年248只SPAC上市、2021年前两个月201只SPAC上市的井喷，让存量SPAC寻求优质并购标的需求爆发。前述外资投行人士担心，“几百只SPAC都有物色优质标的公司的压力，时间很紧迫，尤其是很多家的赛道一致，而好的标的就那么多。未来的供需关系或会倒挂，可能推高标的公司的估值。”

“各路大神”争当发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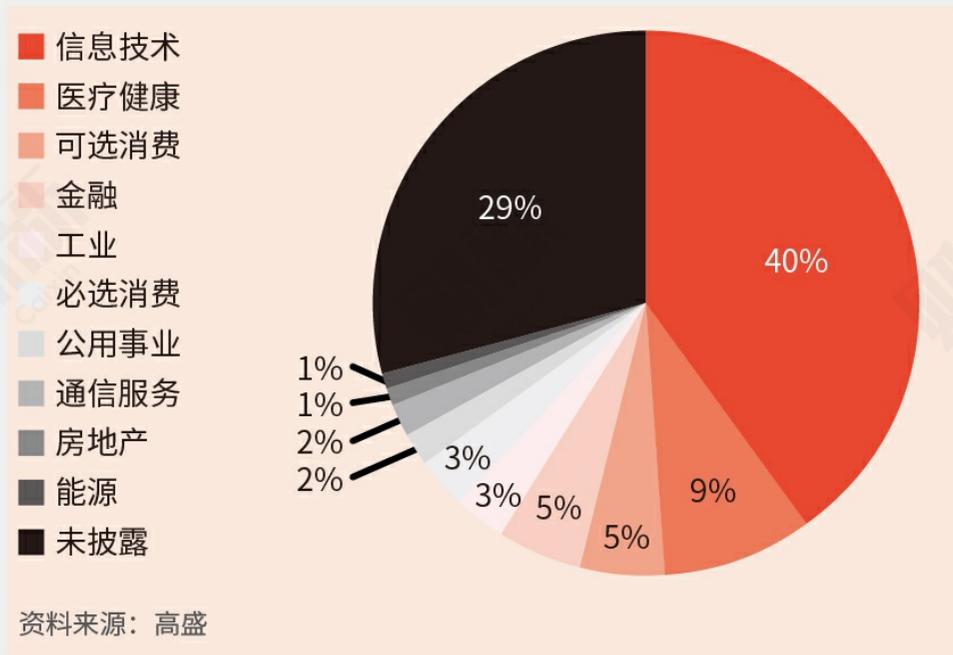
2021年1月26日，春华资本董事长胡祖六作为唯一发起人设立的SPAC公司Primavera Capital Acquisition Corporation（NYSE: PV.UN）完成了IPO，募资3.6亿美元，将聚焦于中国消费领域公司的并购。2月9日，厚朴投资董事长方风雷等人作为发起人设立的SPAC公司HH&L Acquisition Co.（NYSE: HHLA.U）完成IPO，共发行4140万个投资单位，募资4.14亿美元，标的公司将来自医疗保健行业。

路透社的报道称，弘毅投资作为发起人设立的一家SPAC公司已于2月底向SEC秘密提交注册文件草案，拟在纳斯达克上市募资3亿美元，标的公司将来自与中国有重要业务合作的医疗保健和消费品等领域。通常，秘密注册的公司可在路演开始前15天公布信息。

与此同时，中信资本一年前设立的SPAC公司CITIC Capital Acquisition Corp（NYSE: CCAC），据悉也已经找到潜在的并购对象，市场上有三家公司在“传绯闻”。CCAC于2020年2月10日在纽交所完成IPO，共募资2.8亿美元，标的公司重点放在能源效率、清洁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板块的公司，而且要在中国境内、亚洲有足够的市场空间。

2019年以来，二手车企业开心汽车、医疗企业和睦家、教育机构美联英语、共享办公公司优客工场等中国本土公司，陆续通过被SPAC并购登陆美股市场。其中，和睦家医疗通过香港特区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与黑石集团前董事总经理吴启楠发起的SPAC上市。

2020年美股SPAC标的公司主要集中于新兴产业



[点击见大图](#)

贾跃亭创立的电动车公司法拉第未来最近也宣布“逆袭复活”，将通过纳斯达克上市的SPAC公司Property Solutions Acquisition Corp完成上市。

因“3·27国债事件”为市场所熟知，后因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刑17年的管金生，出狱后在2016年创立了私募机构——[上海九颂山河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九颂山河在一年前设立了SPAC公司Newborn Acquisition Corp（NASDAQ: NBAC），目前信托账户中持有约5750万美元。2021年2月16日，NBAC已经谈好了标的公司，拟收购位于美国圣地亚哥的一家绿色能源技术公司Nuvve Corporation。

这些案例足以提振市场的信心。李泽楷和Peter Thiel作为发起人此前已经设立了两家SPAC；2021年2月3日，李泽楷的第三家SPAC公司Bridgetown 3 Holdings Limited已向SEC递交了注册文件。

软银孙正义设立的SPAC公司SVF投资公司（NASDAQ: SVFAU）2021年1月在纳斯达克上市，募资5.25亿美元。紧接着，软银又在2月5日追加两个SPAC的上市申请，分别为SVF 2、SVF 3，拟募资额分别为2亿美元、2.8亿美元。这三个SPAC都瞄准多样化的科技领域，包括移动通信和人工智能等。

据财新记者统计，截至2020年末，美国市场已有971家资产管理机构持有SPAC，合计市值824.07亿美元。从投资金额看，市场最大的三位参与者分别是Millennium Management（千禧基金）、Magnetar Financial和Glazer Capital，分别持有SPAC的市值为44.4亿美元、28.9亿美元、22.5亿美元。

千禧基金是目前SPAC市场最大的玩家。至2020年末，该基金总资管规模为470亿美元，其中10%为SPAC投资。在2020年对冲基金经理收入排行榜中，其创始人Israel Englander以38亿美元的年收入排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股GameStop（NYSE: GME，游戏驿站）炒作事件中，为散户“发声”的知名投资人、有“硅谷最精明的投资人”之称的Chamath Palihapitiya，亦是SPAC的极力鼓吹者。

Chamath是斯里兰卡裔的美籍投资人，早前在Facebook工作，后成立风投公司Social Capital。Chamath在2017年成立了其第一家SPAC公司Social Capital Hedosophia Holdings（NYSE: SPCE），募资8亿美元；2019年7月完成了与商业太空旅行公司Virgin Galactic（维珍银河）的合并，使后者实现上市。

在并购交易之前，SPCE的股价长期维持在10美元/股；并购交易后至今，最高涨至62.80美元/股。尝到了甜头的Chamath甚至放弃了Social Capital的VC业务，专心做SPAC。SEC的最新注册文件显示，Chamath的第六家SPAC已递交注册文件。

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知名人士加入到SPAC发起人的队伍中来，如高盛集团前总裁兼首席运营官Gary Cohn、美国前商务部长Wilbur Ross、美国退役棒球名将Alex Rodriguez……

“为了维护投资者信心，SPAC的管理者一般会强调自己的专业特长，比如面向中国企业的SPAC管理者会有相关投资经验。”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缪因知近日撰文称，“他们还常邀请华尔街精英甚至政治圈、体育界名流参与或列名，从而令壳公司产生独立的声誉价值，反而能帮衬希望通过SPAC上市的中小企业。”

欧振兴也表示，“买SPAC，相当于买个梦。就是看发起人是否眼光独到，能否发掘到一个有爆发性增长的公司。如果发起人本身有一定知名度，之前的投资表现不错，相信投资者给他们下注的几率是高的。”

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SPAC，如今越来越被“各路大神”所推崇，承销商们自然也改变了态度。比如在2016年，高盛开始承销其首个SPAC项目。“以前比较早的时候是一些精品投行在做，这些年一些大型机构做的也多了，主要是有市场需求。”前述外资投行亚洲股票资本市场部负责人说。

SPAC的市场表现

Chamath那单维珍银河通过SPAC上市的交易，确实让不少早期的投资者尝到了甜头。不过这毕竟是个案，而从整体上看，SPAC的投资者并不怎么赚钱。

佛罗里达大学沃灵顿商学院和南卡罗莱纳大学达拉摩尔商学院的三位学者，在2021年2月22日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考察了近十年来美国市场SPAC在完成收购后股价的一年期和三年期表现。

该论文从2010年1月至2020年9月间上市的SPAC中，以已完成并购为标准，筛选出了114只SPAC样本；其中，97只SPAC有完整并购前以及并购后一段时间的市场表现数据，17只稍晚上市的SPAC仅考察完成并购之前的股价表现。

统计数据显示，这114只SPAC在IPO后至完成并购交易前，都取得了正收益，平均年化回报率为9.3%；然而，在并购交易完成后，SPAC的普通股投资者平均每年亏损15.6%，跑输大盘表现24.3个百分点。这114只SPAC中的105只有认股权证的收益数据，一年期的收益平均为44.3%，三年期的收益平均为52.8%。不过，认股权证的整体收益表现主要是靠2020年市场波动中数据（一年期168.1%）的拉升，其他年份亦有较差表现，如2015年（一年期-40.9%）、2014年（三年期-91.1%）等。

投资顾问Renaissance Capital的一份截至2020年10月的统计也显示，2015年初以来的313只上市SPAC中，有93只已经完成了并购。这些SPAC的普通股平均亏损9.6%，中位数收益率为-29.1%；而自2015年以来传统IPO的平均市场收益为47.1%。

从成本核算看，通过SPAC上市的综合成本（包括承销商佣金、发起人“提振激励”、认股权证等）比传统IPO要高。前述论文基于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之间上市的47只SPAC的数据，和同期131宗传统IPO（剔除ADR等特殊IPO路径）的数据得出，SPAC上市成本占收入比重的中位数为50.4%，而传统IPO是28.4%；SPAC上市成本占市值比重的中位数是14.1%，而传统IPO为4.8%。

此外，统计数据还显示，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完成并购的SPAC中，投资者的平均赎回率和赎回率中值，分别为58%和73%；其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SPAC的赎回率超过90%。虽然SPAC有赎回的下行保护，散户把它归类为风险较低的投资，但赎回率也从侧面反映出投资者并没有长期看好SPAC。

卫达仕（Withers）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志伟对财新记者表示，传统IPO需要企业有一定的盈利要求，亦要通过繁复的上市申请程序；而SPAC是一家空壳公司，上市之后才去物色收购资产。SPAC的成立人通常是由基金、富豪、具名望的人，而投资者押注的是这些成立人的眼光及能力。所以，对投资者来说，风险必定比传统IPO高得多。

近来就出现了SPAC上市并购后被指欺诈的案例。

有“卡车界特斯拉”之称的电动卡车制造商Nikola（NASDAQ: NKLA）于2020年6月通过SPAC在纳斯达克上市，股价一度从每股十几美元涨至每股93.99美元。但三个月后，2020年9月，做空机构Hindenburg Research发布做空报告称，Nikola创始人Trevor Milton多年来一直在撒谎，Nikola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骗局”。报告称，Nikola在电池技术、氢气生产、大额订单等诸多方面存在数十个虚假疑点，并提供了私人邮件、录音等大量证据。

此后，SEC展开调查，投资者向亚利桑那州地区法院提起了集体诉讼，Trevor Milton被罢免。Nikola近日承认，Trevor Milton从2016年7月至IPO时，发表过一些不准确的声明，误导了投资者。Nikola近期的股价已跌至16美元附近。

“这两年SPAC上市很火爆，风险暴露肯定要等两年才会出来。”一名外资律师事务所的香港并购律师说，SPAC的财务造假风险比传统借壳上市低，“SPAC的发起人以大佬和机构为主，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投资回报，不像某些中概股造假是系统性的。这些机构和大佬未必能承受名誉的损失，也没必要靠收购一个假公司来赚钱，这对他们是得不偿失的”。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并购标的公司的潜在风险可能让投资者受损，不少市场人士认为，SPAC在设计上天然对普通投资者不公平。

前述外资人士解释道，SPAC在IPO后，80%的股份是公众持有，这部分股份是有现金支持的，但是发起人持有的20%股份是凭空造出来的，如果只把2.5万美元看作是SPAC的组建成本，那这20%股份背后没有现金支持。

例如，一只SPAC在IPO后发行了400万股股票，募资了4000万美元。由于发起人有权无偿获得IPO之后股份的20%，实际上这只SPAC在IPO后发行的总股份为500万股，其中公众持有80%（即400万股）有4000万美元支持，而发起人持有的20%（即100万股）则没有。也就是说，公众以10美元/股购入的股票，此时的价值已经稀释至8美元/股。

如果在并购前，有一半公众持股退出（200万股），这部分按照10美元/股的原价退出，那么剩余的200万股公众持股的实际价值就会稀释至6.67美元/股。

美银证券投资与ETF策略师Jared Woodard的最新报告称，目前对SPAC宽松的规定可能会给个人投资者带来沉重的成本，“隐藏的费用和成本如此之大，以至于SPAC IPO时每筹集的10美元，平均到SPAC收购目标时，剩下的现金就不足7美元。另外，收购时还允许发起人与大型企业进行附带交易的谈判，对私下有影响力的投资者可能提供了更优惠的条件，而没有将其透露给其余的投资者”。

亚洲市场SPAC猜想

在美股市场大受追捧的SPAC机制，有无可能引入亚洲市场？

新加坡交易所（下称“新交所”）早前称将在2021年一季度就引入SPAC上市模式展开征求意见。新交所执行副总裁及全球业务发起和拓展部主管周士达近日对财新记者表示，“在新交所启用SPAC上市机制，将增加散户的投资渠道，但我们需要确保有适当的保护措施来保护投资者。我们将力争建立一个平衡的制度，使投资者能够对接优质的发起人。我们正在仔细考虑其可行性，并将向市场征求意见是否应该修订规则以推出SPAC上市机制。”

早在2010年，新交所已有意引入SPAC上市模式。据新交所网站的公众咨询页面，新交所在2010年1月曾发布关于SPAC的咨询文件。该所当时对SPAC上市设定了一些条件，包括SPAC上市时要达到至少1.5亿新元的市值（按发售价和邀约后已发行股份计）、SPAC上市后完成并购交易的期限为三年等。但当时业界对这一机制的兴趣不足，此后便无下文。

近年来新加坡新股市场表现平淡，引入SPAC上市或将有助于其增强吸引力。据普华永道发布的新加坡资本市场报告，过去十年，新交所的IPO募资额及数量整体呈现下跌之势。2020年，新交所IPO募资额同比下跌55%，至14亿新元（约合10.5亿美元）；与前一高位2017年相比下跌约七成。

新交所首席执行官罗文才2月17日接受彭博社采访时就表示，“若市场支持，我们希望今年就能实现（引入SPAC）。”他认为，长期的低息环境、越来越短的商业周期、动荡的市场以及一些经济刺激措施，均提升了市场寻求资本的需求。而SPAC可在最大程度降低市场风险的同时，提供另一投资途径。

“新交所要引入SPAC很正常，它有地缘优势，本地企业在本地上市合乎逻辑，同时它本来IPO市场就不旺，现在有机会超车肯定是想把握的。”一名欧资投行的香港并购部人士称，“但新交所股市的池子并不大，流动性没有美股市场和港股市场好，所以即使有了SPAC，上市以后公司还要面临流动性的问题。”

近日，据香港媒体报道，香港交易所（00388.HK，下称“港交所”）启动了对SPAC机制的研究。港交所发言人回应财新记者查询时表示，该所不时研究加强或改革上市制度的各个方案，致力于提高香港新股市场的竞争力和吸引力，亦确保能维持市场质量。

在2月24日的港交所业绩会上，被问到港交所是否设立SPAC上市机制时，港交所代理集团行政总裁戴志坚说：“关于上市，香港也尝试过不同渠道。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把关的责任，香港证监会注重投资者保障，我们会平衡国际市场间的竞争。最终，我们的市场质量和设计，要能让投资者选择合适的公司，然后参与这些公司的增长。”

“上市公司也希望有一个比较直接有效的方法筹集资金，不需花太多时间或（担心）太多不确定因素，这些都是（我们）考虑改善市场的方向。至于以哪些途径或者以哪一种方式去做，我们一定会参考国际市场的不同成功因素，但我们不会照抄。”戴志坚说。

不过，孙志伟表示，港交所一直致力于打击“啤壳”（广东话指“造壳”）活动，相关的上市规例已在2019年10月生效，近一年来“啤壳”活动近绝迹；若SPAC在香港出现，与香港的传统监管模式有冲突。港交所作为一家上市公司，致力于提高香港IPO市场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无可厚非，但港交所应该谨慎研究相关议题，以平衡各方利益及保障投资者为大前提。

前述香港并购律师也表示，若短期内港交所真要引入SPAC，首先是怎么和市场交代。“因为港交所对借壳上市收得很紧，这几年借壳上市的并购生意很不好做。若引入SPAC，那就要解释SPAC和借壳上市的区别在哪里，为什么收紧借壳但接受SPAC。”

“我觉得亚洲市场机制未必能够完全接受SPAC，尤其是香港市场。香港市场一直以来都是以披露为本的原则审核IPO申请，即我们所说的‘前置式’监管；而美国市场有集体诉讼机制，后置的监管制度相对完善，才有条件应用SPAC。”孙志伟说。

一位投行界人士称，“SPAC上市不算是很正式和传统的上市方式，这种类似借壳上市的方式，说明公司没有走正规IPO的渠道。SPAC上市模式是存在于交易所和交易所之间的一种竞争，当一个市场上通过传统正规IPO渠道的上市数量远少于借壳上市数量时，说明这个市场处于比较紧绷的状态，有问题了。”

欧振兴表示，“SPAC市场未来会不会持续蓬勃、维持热度，需要看去年（2020年）那批上

市的SPAC能否达到收购标的公司的目标。若如期完成，相信这个市场就会有承接、有持续；如果做不到，未来市场对SPAC会更加审慎。”

“SPAC本质上就是借壳上市，作为监管机构，SEC没理由允许市场未来的主流是走捷径、钻空子，而不是走常规的途径。也许一年两年会以SPAC为主，但是长期来看，肯定是常规的上市途径占多数。”前述香港并购律师说。□

财新特派香港记者尉奕阳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吴秋晗

财新周刊 | IPO撤单隐忧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20家随机抽中现场检查的在审企业，16家选择了主动撤回；在审企业是否“带病闯关”，并挑战A股注册制底线？



对于当前的IPO排队情况，证监会明确表示，不能表述为“堰塞湖”，IPO审核效率已经大幅提升。

[《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刘彩萍

2021年1月31日，中国证券业协会按惯例组织了首发企业信息披露质量抽查名单第28次抽签仪式，参与抽签的企业为已经被受理的407家科创板和创业板企业，抽中企业20家。为了表明抽签的公平性，监管部门代表、自律组织代表、行业代表和媒体代表共同在现场进行了见证。

然而，这些被抽中现场检查的企业在2月9日—2月20日陆续向交易所递交了主动撤回IPO申请的材料。截至目前已撤回16家，撤回率高达80%，市场对此哗然。

除了现场检查，交易所现场督导的企业撤回材料的比例也高达80%。根据《科创板发行上市审核动态（2021年第1期）》披露，上交所2020年全年共对40家科创板项目的保荐人开展现场督导，其中32家项目分别在督导前后撤回。

一位接近监管层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相关部门对此十分重视，交易所已经要求撤材料的券商说明撤材料的理由，很严厉，这关乎注册制未来的走向以及投行未来的发展方向。

沪深交易所在2月26日的答记者问中强调，对于现场检查进场前撤回的项目，如发现存在涉嫌财务造假、虚假陈述等重大违法违规问题的，保荐机构、发行人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绝不能“一撤了之”，也绝不允许“带病闯关”。

由于现场检查抽签是随机进行的，如此多的撤单，是否意味着大批排队待审企业都有“浑水摸鱼”的念头？

北京一位资深律师告诉财新记者，“大批浑水摸鱼显然不可能，无论如何，投行、企业都知道IPO的重要性，大家显然对A股注册制的理解不够透彻，想法过于简单了。”

多位业内人士认为，从历史经验看，现场检查和现场督导已成为监管喝退“带病闯关”发行人的有效手段。“当前注册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发行条件更具包容性，大多发行人抱着‘时不我待’的心态，能早报就要早报，反正也要排队，先进去排个占位，这样的结果必然是队越排越长。”一位投行人士称，“被抽中现场检查的概率并不高，一旦抽中可以找理由退出，只要

再等一个财务报告期就又可以继续申请IPO了——这是个策略选择，不一定是这些企业都有问题。”

与境外市场的注册制不同，A股的注册制带有鲜明的市场标记：在散户投资者占市场比重较高的情况下，上市公司质量需要坚决保证，企业IPO注册过程肩负重大责任。这也是当前IPO排队越来越长、撤单企业越来越多的原因，交易所、证监会不得不拿显微镜看企业。

“随着A股市场机构化比例逐步提高，对上市公司的质量监控更多将由市场完成，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前述北京资深律师表示。

IPO排长队

当前IPO排队家数达752家，其中已过会266家。根据证监会网站披露，截至2021年2月25日，申请上交所主板的拟IPO公司共117家（其中47家已通过发审会），申请深交所中小板的拟IPO公司共54家（其中9家已通过发审会）；根据上交所网站披露，截至2021年2月26日，科创板IPO在审企业共196家（其中提交注册51家，已过会尚未提交注册38家）；根据深交所网站披露，截至2021年2月26日，创业板IPO在审企业共385家（其中提交注册51家，已过会尚未提交注册70家）。

对于当前的IPO排队情况，证监会明确表示，不能表述为“堰塞湖”，IPO审核效率已经大幅提升。

证监会表示，此前IPO没有实现常态化，停停开开，预期也不明朗，一些企业从首次提交申请到获得核准用时需要两到三年。近年来，证监会科学合理保持IPO常态化，特别是注册制改革后，证监会着力提高审核透明度和效率；目前科创板、创业板审核注册平均周期已经大幅缩减到五个多月。

证监会也坦陈，随着注册制的实施，排队现象反映出市场有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有关方（包括发行人、中介机构等）对注册制的内涵与外延理解不全面、对注册制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关系把握不到位、对注册制与交易所正常审核存在模糊认识，形成有效的市场约束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

“排队是上游入水速度太快导致的，国内企业对上市热情太高，这样的上市热情不论在哪个资本市场都会排队，香港市场、美国市场也一样。审核慢一点不应苛责。”某证券律师表示。

企业为什么对上市充满了热情？

上海一位投行高管认为，还是利益诱惑太大。“A股IPO估值普遍偏高，诱惑太大，而且上市后‘新股不败’的神话保持了这么多年，市场没有约束机制，加之当前市场资金充裕，不管什么企业都想去IPO冲一下，真正值得高价的优质上市公司并不多。”

在注册制实施的一年半中，资本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寿双指出：当前以信息披露为中心，改变了审核的理念，并让大家认识到以后的上市是个技术化的系统工程；而以前的上市总是希望把企业包装一下，然后和发审委员沟通，这样导致了很多问题。注册制改革就是让上市成为一个系统的技术化工程，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变得更加透明。

现场检查“松紧带”

证监会现场检查起源于2012年的财务专项核查，后作为IPO例行制度被贯彻执行，由证券业协会对在审IPO企业通过抽签5%的方式进行检查，一年抽签两次。此外，也存在审核员推荐的被要求现场检查的企业。

北京一位投行人士告诉财新记者，2012年财务专项核查是为了解决当时851家拟IPO企业形成的“堰塞湖”问题。根据2012年证监会发布的[《关于做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告专项检查工作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提高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财务信息披露质量有关问题的意见》](#)和[《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告专项检查工作相关问题的答复》](#)

等文件，证监会在2012年和2013年开展了大范围的财务专项核查，并且抽签对部分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查：到2013年5月底，共622家公司提交了自查报告，提交终止申请的有268家；证监会组织了两批抽查，共抽出了40家公司进行现场检查，这40家公司中最终有20家撤回申请；当时的IPO“堰塞湖”得到了暂时的缓解。

“现场检查对券商形成的威慑力才是其威力所在。”某投行保荐人表示，尽管证监会出台了明确的现场检查规定，交易所也出台了现场督导的规范性文件，但这些规定的出台，只是使监管行为有法可依而已，具体的检查标准并没有在文件中明确。

他举例称，对客户和供应商的核查比例，核查到70%、80%，还是100%？对实际控制人和董监高的流水核查，是10万元以上全查，还是5万元、1万元？不同的核查比例意味着不同的工作量和成本，更高的核查比例也未必就可以控制全部风险。但因为现场检查和现场督导没有具体标准，中介机构也无法证明自己“尽”职了，还不如撤材料，免得到时收到监管函扣分，影响券商整体的年度评分评级，进而影响投资者保护基金缴纳比例。

北京一家中小券商投行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他们此次被抽中的两个项目，其中有一个项目撤回了，撤回并不是因为财务造假，主要是内控有瑕疵，从规范性上还没达到IPO标准，撤回来抓紧调整，可以再申请。“现场检查中，证监会给的口径是抓大放小，但实际上十多人的现场检查人员在发行人现场待满两周，还是能查出问题的。”

有投行人士称，对于一家企业，“肉眼观察”是一种尺度，“拿着放大镜”是一个尺度，“拿着显微镜”又是一个尺度，尺度总是掌握在人的手里，这个尺度的拿捏就极为微妙。“如果没有这么多企业排队，现场检查就是一个例行程序，没什么可怕的；但现在这么多企业排队，大家感觉监管已经到了‘拿着显微镜看企业’的尺度上，心里普遍没底。”

终止审核的企业数量也大幅增加。2020年前十个月每个月终止审核的企业都是个位数；从2020年11月开始，首次达到10家，12月为29家；而2021年1月为17家，2月为36家，创出新高。

科创板破发股票统计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收盘价 (元)	首发价 (元)	下跌幅度
688065.SH	凯赛生物	83.85	133.45	-37.17%
688550.SH	瑞联新材	82.66	113.72	-27.31%
688199.SH	久日新材	41.85	66.68	-37.24%
688228.SH	开普云	40.70	59.26	-31.32%
688378.SH	奥来德	48.72	62.57	-22.14%
688335.SH	复洁环保	33.39	46.22	-27.76%
688330.SH	宏力达	75.69	88.23	-14.21%
688336.SH	三生国健	19.52	28.18	-30.73%
688551.SH	科威尔	29.28	37.94	-22.83%
688033.SH	天宜上佳	13.30	20.37	-34.71%
688168.SH	安博通	50.80	56.88	-10.69%
688177.SH	百奥泰-U	26.98	32.76	-17.64%
688118.SH	普元信息	21.96	26.90	-18.36%
688569.SH	铁科轨道	19.10	22.46	-14.96%
688221.SH	前沿生物-U	17.28	20.50	-15.71%
688128.SH	中国电研	15.61	18.79	-16.92%
688101.SH	三达膜	16.15	18.26	-11.56%
688658.SH	悦康药业	22.31	24.36	-8.42%
688025.SH	杰普特	41.88	43.86	-4.51%
688218.SH	江苏北人	15.43	17.36	-11.12%
688058.SH	宝兰德	77.93	79.30	-1.73%
688081.SH	兴图新科	26.99	28.21	-4.32%
688358.SH	祥生医疗	49.83	50.53	-1.39%
688466.SH	金科环境	24.00	24.61	-2.48%
688519.SH	南亚新材	32.12	32.60	-1.47%
688566.SH	吉贝尔	23.30	23.69	-1.65%
688338.SH	赛科希德	50.15	50.35	-0.40%

注：收盘日期为2021年3月3日

资料来源：财新记者根据公开数据整理

根据证监会过往现场检查案例看，在进场前，主动撤回的企业，证监会并未给予任何处罚，但是经过现场检查的企业，反而被指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甚至移交给了稽查部门。2020年4月证监会曾系统公布了2019年全年共84家企业现场检查的结果，其中1家企业移送稽查调查处理，采取36个月内不受理该企业股票发行申请的监管措施；12家企业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48家企业采取审核重点关注、督促整改会计处理及内控问题等措施；对其他23家申请撤回企业予以终止审查处理，该类企业普遍存在内控制度有效性不足、会计基础工作不规范等问题，若后续再次申报，仍将重点关注其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这也就意味着，2019年进行现场检查的84家企业全部存在问题。

等待市场之力

大批企业削尖脑袋挤入IPO排队大军，当然是瞄准了A股的“新股不败”与持续的高估值。与此同时，大批散户踩雷问题公司让监管压力巨大。

“中国市场投资者结构与国外不一样，简单希望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投资者损失问题不太现实，因此证监会一直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这就包括守住IPO。当然监管也明白，这不是长久之计，最终还是要依靠市场力量，因此这几年一直也在促进投资者机构化进程。”某投行高管表示，“市场的力量最终是会发挥作用的。”

科创板注册制实施以来，2019年12月首次出现新股上市后首日破发情形，也出现过发行价被压到底价发行的情形，有些公司已经有了推迟发行的念头，市场拒绝公司上市的愿景似乎很快可以实现。但是在科创板零星几只股票出现上市首日破发后，注册制批文节奏放缓，每周发放13家批文成为市场固定预期，企业上市首日即破发的现象也未再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科创板估值分化已出现，企业破发的时间越来越短。数据显示，截至3月3日，有27家科创板公司收盘价低于上市发行价，相比发行价平均跌幅为14.40%；其中，跌幅最大的是凯赛生物（688065.SH），最新收盘价比发行价跌去37.17%。这27家公司上市交易天数平均为183天，其中悦康药业（688658.SH）上市第五天就处于破发状态。

兴业证券研究报告指出，科创板的成长分化和“美股化”会比其他板块来得更早一些。目前，科创板投资者以机构投资者和中大型个人投资者为主，相较于其他板块，定价博弈或许更加充分，市场定价过程更类似于发达市场。

然而，上述投行高管向财新记者特别强调，对注册制来说，企业IPO上市首日破发的意义要远大于上市后才出现破发，这样才能真正解决打新资金过度拥堵、企业价高质差的问题。打新资金绝大多数都采用上市首日即卖出的策略，因此只有首日出现破发，才能迫使投行人员主动挖掘市场认可的优质项目，更会迫使企业专注于盈利以获得市场投资者的认可，新股发行定价也会逐渐回归到合理水平。他认为，在当前新三板精选层这种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市场中，企业上市首日接连破发就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对于实际控制人、股东和投资人，钟声一响，黄金万两。”一位市场人士称，要想真正让IPO理性化，出现首日破发对企业的震慑力更大。第一个上市即破发的企业会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打新即赚钱”的畸形市场总会停止。大量没有未来成长性的上市公司破发之后，实质上丧失了再融资的能力，失去了外部的资金支持；如果无法成功转型，那么只剩萎缩的主营业务、不再值钱的“壳”和高昂的信息披露成本。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董登新也持此类观点。他认为，当务之急仍是加速科创板扩容，加大新股供给，一方面满足高科技企业股权融资需要，另一方面又能充分满足投资者需求，这将有利于改善科创板供求，平抑股价，让股价信号真正回归正常。

也有市场人士指出，A股价格体系长期紊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借壳上市。尽管借壳上市成功的案例越来越少，但是只要这条路是通的，不明真相的散户投资者就认为“壳”有价值，跟风炒作的现象就依然存在；而在二级市场价格长期扭曲的情况下，一级市场自然受到影响，因为刚刚IPO的新公司资产负债结构良好，又没有历史包袱，其估值自然要高于丑闻缠身的ST壳公司。

退市新规已于2020年12月31日正式发布实施。证监会副主席阎庆民对此轮退市改革提出新

的期待，希望通过重组一批、重整一批、退市一批，拓宽多元化退出渠道。对于严重财务造假的“害群之马”、丧失持续经营能力的“空壳僵尸”，增强退市刚性，绝不允许“久拖不退”。

此外，加快推进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事后追责机制，也是解决IPO排长队、带病申报的重要办法之一。

事后追责不到位，倒逼监管不得不在事前准入方面做足文章。美国每年有300多桩集团诉讼案例，让未勤勉尽责的相关方付出应有代价，但是现在中国第一单集团诉讼案例仍未落地，各方还在博弈。

2020年11月6日，证监会处罚委主任滕必焱在证监会与最高人民法院联合举行的“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犯罪?维护金融市场秩序”新闻发布会上称，当前证监会也正在加大与公检法各机关的联动，综合运用行政监管措施、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刑事追责、诚信惩戒和退市监管、自律管理等手段构建起“立体追责”体系。

在事后“立体追责”体系中，下一步证监会将进一步提高涉刑案件移送效率，对行政执法过程中发现涉嫌犯罪线索，做到应移尽移、快移；积极支持推动相关刑事、民事和行政执法的司法解释、追诉标准的出台、修改工作，加强资本市场治理的制度供给；积极推动完善证券民事诉讼和赔偿制度，支持投资者保护机构依法作为代表人参加诉讼，推广证券期货纠纷示范判决机制，加大民事追责效率。□

财新记者全月对此文亦有贡献

版面编辑：吴秋晗

专栏 | 央行数字货币能走多远？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央行数字货币不太可能对第三方支付和银行存款造成太大冲击；在反贪和精准扶贫等领域，或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具有探索空间



在中国央行现任和前任官员的表述中，央行数字货币的定位是替代M0，即流通中的现金，因此不会产生利息。此外，因为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银行需要全额支付准备金，因此没有创造货币的能力。图/视觉中国

文/陈昌华

Aletheia Capital中国策略分析师

踏入2021年，数字货币成为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央行数字货币能否达到其政策目标，或能达到哪些目标，值得思考。

在中国央行现任和前任官员的表述中，央行数字货币的定位是替代M0，即流通中的现金，因此不会产生利息。此外，因为发行央行数字货币的银行需要全额支付准备金，因此没有创造货币的能力。这种设计主要是为了提高货币流通效率，那么，对日常经济的影响会有多大？

首先，根据央行发布的[《2019年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全国使用电子支付的成年人超过85%，在农村地区也超过76%，即绝大部分中国人已在使用电子支付，而逐步放弃用现金。

在此背景下，央行数字货币在未来一段时间应不会是电子支付的主流，其最大受惠者或是两类人：一是在偏远农村或城市中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或电子支付渗透不到的地方的居民，也是社会中最贫穷的群体；二是到中国境内旅游、差旅，但因没有银行账户而不能用[支付宝](#)或[微信支付](#)等平台的人群。未来，在机场和高铁站或将出现供旅客提取或兑换央行数字货币的兑换店，就像现在的现钞兑换店。

此外，央行数字人民币的双离线支付功能，也可在一些电信网络覆盖并不完美的地方推动电子支付。但这个优点在今天的中国也只是一个轻微改善，跟十年前电子支付取代现金的改变不可同日而语。

这么看，央行数字货币不太可能会对现在的第三方支付和银行存款造成太大冲击。中国几家最大的第三方支付运营商将继续以各种优惠和服务去保障其在电子支付市场的份额，而银行也会千方百计避免存款大量流失到数字货币中。相比这些大型银行和第三方支付平台，央行在人力物力上不可能投入太大，而提供额外服务和优惠的灵活性，又受到政府部门属性的限制。

实际上，在早期推广央行数字货币的过程中，央行十分依赖这些银行和第三方支付机构的配合和支持，但因潜在竞争关系，这些机构有多大意愿去推广呢？

因此，假若在可见的将来，央行数字货币在整个电子支付中只占较小份额，则部分市场人士担心的，例如是否会引致存款大量减少而产生金融紧缩效应，尚属多余。当然，假如人民币出现负利率，大量存款转移到央行数字货币则很有可能，但这种情况短期内不可能出现。同样，如果期望央行数字货币能打破现在电子支付市场的寡头垄断、零售市场的壁垒和市场分割，短期内看来也不现实。

至于解决客户隐私问题，央行数字货币在现在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之外提供了一个选择。但从过去十多年的经验看，除非央行数字货币能提供一些现在第三方支付不能提供的优惠，不然消费者不太可能单为了保护隐私而改变支付方式。

但央行数字货币在反贪和精准扶贫等领域，或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具有探索空间。从中国政府披露的贪腐案件看，现金交易是非法资金流转的重要渠道。基于数字货币交易的可追溯性，如果国内现金交易逐步被数字货币取代，这些非法交易会变得更困难。另外，若央行电子钱包能在城市和农村底层普及，特别在一些商业银行网络尚未覆盖的地方，可作为政府扶贫工作的工具。例如政府在推动振兴消费政策时，可向基层市民的电子钱包发消费券，或给偏远地区农民发农作物补贴。

最后，有论者希望央行数字货币可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减少对国际美元支付系统（SWIFT）的依赖。但要减少对SWIFT的依赖，大前提是海外商户愿意接受数字人民币，也能开立数字人民币钱包。这对于面向中国消费者的外资消费品牌应不是问题，不少商店会愿意接受数字人民币，但这类交易对中国没有太大战略意义。假如华为向高通公司采购芯片或国航采购波音飞机时，很难想象对方愿意接受数字人民币，而这些交易才是中国政府希望不完全依赖以美元为主的国际支付系统的领域。

版面编辑：吴秋晗

从“产品引领”到“客户引领”，联想中国自我变革的方法论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没有一直成功的企业，却有一直存在的客户。当一家企业成长为“行业的大象”，如何让大象一直保持轻松的“舞步”，跟上时代的节拍？联想的答案是：以客户为中心。

自从2017年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刘军提出“日出东方”战略之后，以客户为中心，以客户需求为驱动的转型，让联想和联想人释放了巨大的潜能。

联想中国的“日出东方”战略，可概括为“一个愿景，两个转型，三大基石”。一个愿景，即“联想 智慧中国”，两个转型是以客户为中心转型、智能产品和智慧服务转型。三大基石，即智能IT引擎、品牌再造、新创业文化和生态型组织。



联想中国区商用大客户事业部总经理 王立平

“过去我们是产品引领，现在我们跟客户、跟CIO、跟业务部门谈的时候不只是产品，而是为客户解决痛点、创造价值。”联想中国区商用大客户事业部总经理王立平感触良多，“当我们把重心从产品转向客户、从销售产品转到提供服务的时候，视野马上开阔了。”在客户眼中，联想的客户经理，不再是某个产品的推销员，而是拉通整个联想产品线和解决方案的先锋军。

商用IoT，全新赛道上的联想

以客户为中心的转型，直接带来的是全新赛道的崛起。商用IoT（Internet of Things，物联网）正是联想中国在“日出东方”战略推出之后，秉承以客户为中心的思考，开辟出来的全新业务。

高斯（中国）是业内一家印刷设备制造领军企业，其运营痛点是印刷设备需要人工到场调试维护，运维管理成本高、效率较低；现有设备无法实现生产数据有效采集、管理和处理，从

而无法挖掘数据价值。

他们通过联想的ECG工业计算设备和Leap IoT智能物联平台，实现了生产运行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分析，并可通过远程运维平台，对设备进行远程运维管理，并支持客户利用采集的数据对设备状态进行预测性分析。而这种远程维护，不仅克服了维护人员出差的成本和不确定性，还可以根据大数据带来的信息，对产品设计、研发带来更大的帮助，推动产品和业务模式的创新。

王立平说，我们首先自己实现了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转型，有这个经验，然后赋能客户，对很多制造型企业来说，通过联想智能制造能力内生外化，可以真正为他们提供帮助。他举例说：“在疫情期间，联想的工厂、无论是武汉的摩托罗拉移动互联生产基地，还是联想（合肥）产业基地—联宝科技，一两个月产能就快速起来，而这就与联想的柔性制造能力相关。”据了解，联想目前在为100多家500强企业提供智能化转型服务。

智慧教育，撬动教育内容与方法变革

同商用IoT一样，智慧教育也是联想中国内部定义的蓝军业务。

教育信息化已经从1.0时代进入到2.0时代。如何让信息技术更好地贴近教学使用场景，切实提升教师信息化能力，专注学生的个性化教学？

王立平说，联想智慧教育聚焦在几个方面：一是智能多媒体教室，以教师备课机和智慧大屏为核心通过备授课平台软件实现教师平台化应用，未来结合5G及AI技术，为客户提供教学空间整体智能化解决方案。二是智能功能教室，依托IDV和VDI智能云桌面技术，实现计算机教室的多场景应用，轻松实现人工智能教室、虚拟实验室、英语听说教室等多类型教室的快速切换。三是智慧校园，依托联想自身顶层设计能力及生态产品能力，构建“教、学、考、评、管”的业务闭环，持续推进从教室到校园的智慧化建设。

“日出东方”战略目前已坚定实施三年，进入中盘，各项业务成绩亮眼。在2019/2020财年，联想商用智能物联设备营收同比增长超过55%，智慧教育行业解决方案提速发展，同比实现超过4倍的增长。

“我们正在成为领先的智能产品和智慧服务提供商。”王立平说。

*本文刊发在财新市场企划版块，不代表《财新周刊》编辑部观点

财新周刊 | 货拉拉如何赚钱？谁来监管？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货拉拉为何问题频出、整改迟缓？这和同城网络货运行业长期未明确主管部门，以及上位监管政策缺失有重要关系



2月6日，长沙23岁女孩车某通过货运平台货拉拉约车搬家，在跟车途中离奇跳车身亡，半个月后此事才曝出，引起舆论极大关注。图/视觉中国

[《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包志明 见习记者 杨雪

【编辑荐语：2月6日“长沙女跳车事件”后，货拉拉于当月24日发布用户跳车事件致歉信和整改公告，3月11日再公布整改进度：[上线录音功能，试运行车载设备](#)。据其称，当前已有10台“安心拉”在长沙装车试运行，4月起，将陆续在上海、杭州、苏州等8个城市上线试运行1万台，7月开始在全国推广应用，将于年底覆盖同城业务50%订单。

如此措施，是否有效率、有效果？能否解决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读完财新周刊的调查分析，你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2月6日，长沙23岁女孩车某通过货运平台[货拉拉](#)约车搬家，在跟车途中离奇跳车身亡，半个月后此事才曝出，引起舆论极大关注。

长沙警方3月3日公布了详细的调查结果：运输前，车某与司机曾因搬运费、等待时间产生矛盾；运输过程中，司机周某为节省时间三次更改行车路线，而车某数次提出车辆偏航并要求停车，司机均不予理睬，最终车某离开座椅将身体探出车窗外并坠落。在此过程中，司机未采取语言和行动制止，也没有紧急停车，仅轻点刹车减速并打开车辆双闪灯。车某送医抢救无效，于2月10日不幸离世。

调查称，车内未发现打斗痕迹，也未发现司机有侵害女用户的行为。2月23日，公安机关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对司机刑事拘留；3月3日，检察机关批准对其逮捕。

综合来看，这是一个因双方情绪冲突造成非正常意外死亡的极端案例，对司乘双方都是悲剧。警方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之下，以细致入微的调查基本平复了公众猜测。但在案件传出初期引发的对货运平台责任的讨论余音未散，留下了诸多血的教训。

为何车内没有监控设备，偏航为何没有预警，司机是否具备相应资质，平台应承担何种责任等等，面对舆论一系列的质疑，货拉拉沉默了18天。直到2月24日才发出道歉信，承认平台存在种种风险隐患。

货拉拉承诺于3月29日前完成七项整改，基本对齐网约车平台[滴滴](#)三年前一月出两命案后

进行的风控整改要求，包括增加网约车标配的录音、行程分享、紧急联系人、跟车人安全提示、一键报警、号码保护、逾期未完成订单、路线偏航、长时间停留识别报警等功能。

但财新记者近日走访货拉拉多个网点后发现，货拉拉并没有整改落地的迹象，对入驻司机审核及管理的松懈、客货混运、忽视司乘人员安全等平台漏洞依然存在，这也是该平台过去数年的运营常态。

货拉拉为何如此有恃无恐？这和同城网络货运行业长期未明确主管部门，以及上位监管政策缺失有重要关系。货拉拉是只需要ICP备案登记的互联网信息撮合服务中介，还是须受《[道路运输条例](#)》和《[网络货运管理办法](#)》规制的网络货运公司？货拉拉自称是前者，而后者由交通运输部实行牌照管理。但即便是前者，平台对撮合交易的双方甚至三方，到底负有何种责任？货拉拉在其用户协议中设置了完全免责条款。总之，货拉拉对信息中介的定义可总结为“三不管”：不管运输过程，不管司机，不管纠纷和损失。损失则包括对用户托运过程中的财产和人身伤害。

上海交警部门曾表示，在多次网约货车专项整治行动中，有大量违规发生在货拉拉平台，但因针对平台的立法没有那么细，出现“罚得了司机，罚不了平台”的现象。

货拉拉的说辞和早期网约车平台如出一辙。法律界人士认为，相关部门应对《[网络货运管理办法](#)》进行细化，明确货拉拉这样的网络货运平台是否属于该法监管；如果不属于，则应借鉴网约车监管思路，出台适用于网络货运平台的监管法规。

曾参与网约车监管文件制定的城市交通专家徐康明称，货拉拉此次整改只解决了一起事件，没有解决行业发展的核心问题。其业务中用户跟车行为已涉及人员运输，如不禁止则必须有安全前置机制。政府必须以人员运输的最高要求来监管，运输企业也必须以客运服务的最高要求来经营，当前最需要的就是完善监管机制。

平台风控形同虚设

在上述案例中，年轻女孩车某与司机周某之间，因拒绝搬运服务、等待时间长、路线偏航等问题，充满了情绪冲突，导致车某萌生中途离车的想法，酿成悲剧。

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司乘关系紧张是货拉拉平台长期存在的问题。由于货拉拉一直用低运价来吸引单量，从而吸引新司机加入以及留住老司机，但这种低运价策略也导致司机利润微薄。平台事实上鼓励司机私下与客户协商价格，叠加所谓的“增值服务”，导致司乘关系紧张，客诉量大增。

[上海大众运行物流公司](#)总经理张荣峥向财新记者表示，搬场业务场景复杂，之前各地正规搬场公司都会在协会和消保委指导下制定一套定价体系，针对搬运品类、运输距离、楼层数量、电梯情况、平面移动距离以及特殊需求等明确计价标准。所有费用都在业务开始之前与客户确认好，并在搬家当天随车携带一张打印好的物品、价格清单，便于客户现场核对监督、签字确认，这样就可最大限度地避免纠纷。而且通常不允许客户乘坐副驾驶位跟车。

张荣峥指出，由于搬场业务面对普通消费者，因此专业搬场公司对司机与搬运人员的要求均比普通货运车要高，除了要审核籍贯、住址、无犯罪记录，入职前后都会对其进行专业培训和考核。此外，搬场公司会建立专门的管理团队，所有人员与公司签订合同，由这些搬场管理团队进行统一管理。

货拉拉在事件发生后声称，其对平台司机和车辆均有严格审核，司机均通过现场培训上岗。而财新记者在前往货拉拉某网点咨询入驻事宜时，其工作人员不断强调，“平台上的司机每月能赚三四万元，只需身份证、驾驶证即可入驻赚钱”。该工作人员还表示，货拉拉平台是“普惠平台”，不设门槛，只要没有刑事案底，一般都可以入驻。

而所谓的“培训”也是“走过场”。在货拉拉某培训现场，财新记者看到，整个培训持续约20分钟，其中约10分钟是让司机熟悉如何使用App，剩余10分钟主要介绍购买平台会员的好处。而用户服务方面的培训，只在介绍平台服务评分时寥寥几句带过。在有司机询问如何处理与用户的纠纷时，培训师竟然冷冷地回答：“自己解决。”

培训结束后的审核也极为松懈，财新记者看到，司机只需把开来的货车拍照上传即可完成注册，工作人员并不会检查车辆的保险及使用年限，也不会去核对司机住址。更严重是，许多司机驾驶的客运面包车居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入驻平台。

面包车通常分客运与货运两种版本，《[道路安全法](#)》严禁机动车客货混运，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而财新记者发现，许多司机将客运版面包车后排座椅拆除后用于在平台上装货。对此，货拉拉的现场人员语气肯定地说：“客运面包车也能入驻平台，只要不被交警查到。”

业内人士称，客运面包车类似私家车，不需办理营运证，保险费较低，部分交通限行城市还能在非高峰时进入市区，对司机吸引力极大，允许这部分车辆入驻平台极大地降低了入驻门槛。

而在日常管理上，货拉拉的风控体系形同虚设。此次事件中，身亡的女用户是作为乘客随托运物品跟车，但货拉拉现有的规章制度并未对这种随车行为有任何的保护。货拉拉在用户协议中明确：“用户在托运货物装卸过程中受到的任何人身伤害及/或财产损失，均与货拉拉无关，货拉拉不承担任何责任。”

财新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货拉拉对运输过程中的司乘人员安全毫无监管，多人跟车、货仓载客，甚至如果用户将货拉拉作为“滴滴”使用，许多司机也照单全收。

《[道路安全法](#)》明确规定，货运机动车不得载客。货拉拉也在服务协议中表明，货拉拉车辆不能用于客运服务。交警工作人员告诉财新记者，“如果是货车，一般不允许带乘客，面包车如果有固定座位，副驾驶之类的是可以的，但超过2人以上多人坐车乃至坐货仓，都不允许。”

一名司机称，平台虽然不允许货车载客，但仅限于口头禁止，在日常运营中并没有实际有效的管理方式来杜绝这一现象，很多司机都将载客订单作为一种收入手段。

此外，在几次使用货拉拉的过程中，财新记者发现，货拉拉司机基本不会去检查运输的物品，这也让货拉拉成为运输危险品、违禁品的重灾区。裁判文书网显示，2019年3月，一批净重超8公斤的海洛因被藏匿进电视机，通过货拉拉运送至物流点；同年2月至4月，数百公斤非法销售的丁内酯通过货拉拉进行运输，这批丁内酯最后被制成毒品饮料。

目前，货拉拉主要以拒单率、准点率和行为分三个维度来约束司机的行为。根据货拉拉于2020年底出台的“新版行为分”规则，平台将司机账号分为优秀到淘汰六个等级。不同级别的差异在排单质量、提现到账时间和账号正常存续三个方面进行区分。最严重的惩罚措施是“永久封号”。整体来说，其对司机的奖惩力度并不算强。

多名司机告诉财新记者，拒单率、准点率可以通过后面正常跑车“自然回血”，也可以通过“刷分”来提升。而如果账号永久被封，则可以找中介办理小号来洗白。

财新记者在多个货拉拉司机微信群中看到大量中介在操办“刷分”业务。一名中介称，小号来自货拉拉内部人士关系，将原号码的车辆、银行卡平移挂到小号下面，就可以正常接单和提现了。

货拉拉如何赚钱

极低的入驻门槛，粗放的管理，与货拉拉特殊的商业模式密切相关。司机就像是平台的一棵棵“摇钱树”，一旦严格管理，短期肯定会冲击平台收入。

货拉拉由周胜馥于2013年底在中国香港创立，当时叫EasyVan（啦啦快送）；2015年2月在深圳设立运营主体深圳依时货拉拉科技有限公司。周胜馥有斯坦福经济学学士和贝恩咨询公司的亮眼背景，也曾是德州扑克牌桌上的职业玩家。

货拉拉进入内地的时间，恰逢中国私募股权投资热潮，货拉拉获得了A轮2000万美元的融资。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货拉拉与很多互联网平台一样走向了“烧钱”模式，做了大量地推和用户端及司机端补贴，业务覆盖国内主要城市，市场占有率迅速提升。截至2020年11月，货拉

拉国内业务已覆盖352个城市，平台月活跃司机48万，月活跃用户720万。

2016年至2020年，货拉拉又获得了B轮至D轮的4.4亿美元融资。[高瓴资本](#)、红杉资本、[钟鼎资本](#)、PVCapital跟投、[顺为资本](#)、[零一创投](#)等知名VC均在股东之列。货拉拉最近一笔融资是在2020年12月，获得了由红杉资本中国基金领投，高瓴资本、顺为资本等股东跟投的5.15亿美元E轮融资。其在国内的主要竞争对手[58同城](#)旗下[快狗打车](#)也不甘示弱，2017年8月，快狗打车宣布与GOGOVAN合并，由其母公司[58到家](#)持有新公司大部分股份。2018年7月，合并后的快狗打车宣布完成2.5亿美元融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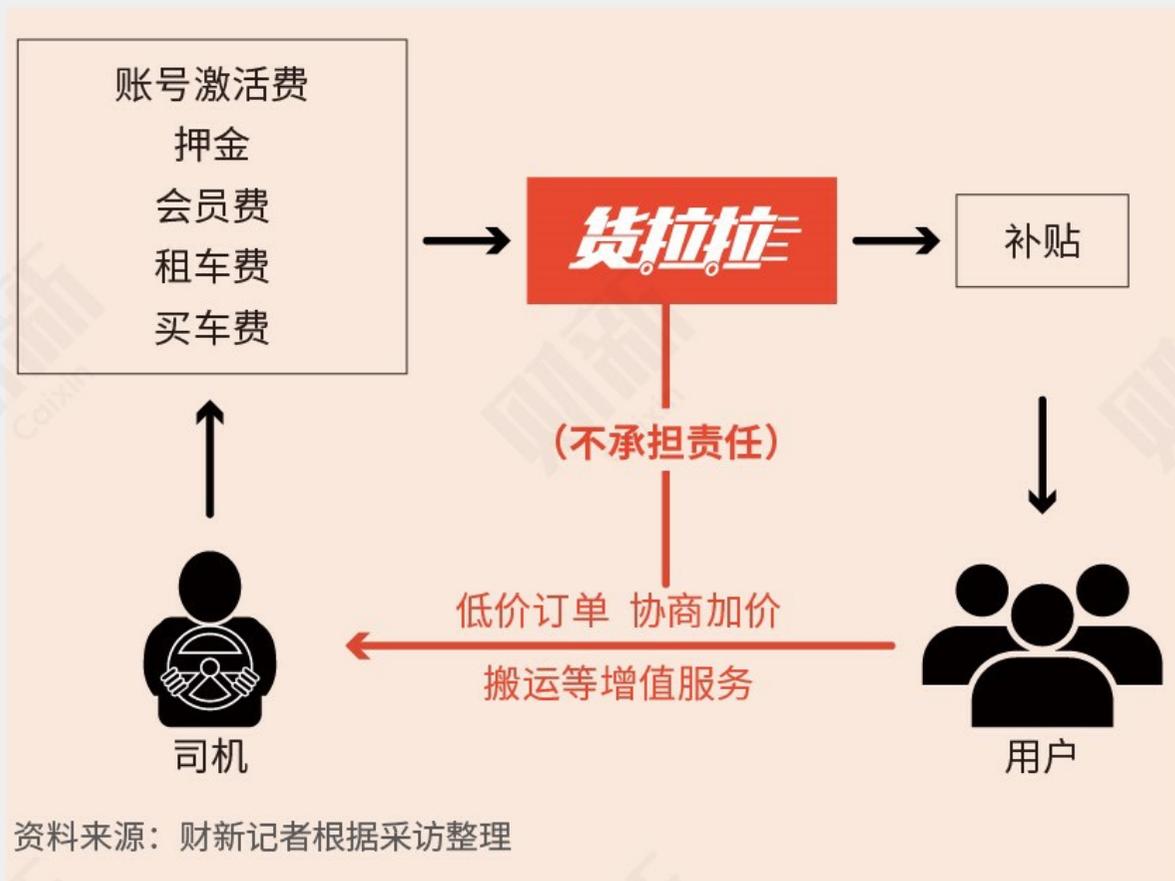


[点击见大图](#)

资本加持下，2018年开始，货拉拉与快狗打车数次在行业里发起“价格战”，运价一降再降。货拉拉在这场博弈中胜出。Fastdata的一份报告显示，按GMV（成交总额）计算，2019年上半年，同城货运平台货拉拉的市场份额占比约53.6%，快狗打车市场份额排名第二，占比约24.6%。而这个赛道的更多玩家，如[咕咕速运](#)、一号货的、[蓝犀牛](#)、[多多配](#)则基本退出了市场。

与滴滴等面向C端（消费者端）的网约车，以及[货车帮](#)、[G7](#)等面向B端（商户端）的网络货运平台不同，货拉拉这类平台上既有C端用户又有B端用户，主要是搬家场景的散客以及小商户的日常发货。这使得平台上的用户存在消费频率低、非计划性需求占比高，运价低等特点，导致货拉拉很难像滴滴那样主要靠运价佣金为主要收入模式。

货拉拉收入模式



[点击见大图](#)

某网络平台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公路货运毛利很低，网络货运平台运费佣金比例不会很高，所以平台一般会绑定一些运量稳定的大客户，并通过开票返点等额外收入来补贴平台运营。而货拉拉都是散单，平台运维成本更大，“一般网络货运平台都对这块业务避而远之”。

货拉拉靠何牟利？知情人士告诉财新记者，货拉拉目前主要的盈利手段是在司机端收取会员费，平台上入驻的司机按车型与抢单权利每月缴付固定月费。这种盈利模式也是货拉拉首创。此外，围绕司机展开的汽车金融、保险、汽车后市场，也成为货拉拉重要的收入来源。

该人士称，由于盈利模式主要来自司机，货拉拉非常重视司机的入驻量，而各城市站的城市经理最主要的KPI考核就是所在区域的司机入驻量和交费比例。“简单来说就是靠‘拉人头’赚钱。”

据财新记者了解，司机入驻货拉拉平台须先缴纳300元的账号激活费和1000元的押金。而会员费则分为原价399元/月的初级会员、799元/月的高级会员和1099元/月的超级会员。在上述货拉拉某培训现场，工作人员告诉在场司机，要入驻货拉拉，除了缴纳账号激活费和押金，必须购买一个月的超级会员费。

据货拉拉2021年1月发布的《2020年城市货运数据报告》，平台2020年新增司机超过90万人。按上述费用计算，货拉拉去年仅新司机账号激活费就实现了2.7亿元收入，并获得了9亿元沉淀押金；按最低档会员费测算，会员费年收入则在43亿元以上。

如果司机不买任何会员，那他每天只能接2单，几乎无法在平台生存，而付费会员则无接单限制，还能减免甚至全免运费佣金。上述货拉拉内部人士称，在接单成功率上，平台也会向付会员费的司机倾斜，会员等级越高，接单成功率也会越高，甚至会直接派单给付费更高的平台租车司机。

货拉拉的另一棵“摇钱树”是汽车租赁。对于无车司机想入驻平台，货拉拉提供租车方案。以一辆瑞驰新能源微面为例，司机租车需先缴纳9000元押金（出现一次保险赔付就扣1000元）；租车费则根据时间长短分为每月3590元、3690元和3790元三档，如租满一年，则需支付4.31万元的租金。货拉拉工作人员表示，租赁车辆大部分为二手车，少部分为新车，平台会向租车司机赠送原价1099元/月的超级会员。

而财新记者询问瑞驰新能源车经销商得知，该车新车售价在9万至10万元左右，二手车可能只有一半价格。

货拉拉工作人员称，租车司机可以加入货拉拉车队，让货拉拉直接派单。“过往租车司机在平台上一天能接到10单，每月赚个两三万甚至三四万元都不成问题，相较获得的收入而言，这点租车费并不贵。”

租车合同显示，货拉拉租车业务的经营主体是成立于2018年6月的货拉拉融资租赁（天津）有限公司，惟一控股股东为香港公司货拉拉智能物流有限公司。

然而很多司机直到开始跑单才发现，入驻平台虽容易，但要在平台上赚到钱却很难。以货拉拉App上海地区的报价为例，货拉拉小面包车起步费为30元，每公里运费为3元，除了起步费稍贵，其里程费已和滴滴非常接近。

多名货拉拉司机告诉财新记者，货运服务单量少、车辆油耗大，再加上司机等候搬运时间长等因素，导致货拉拉的司机收入要低于滴滴司机。“滴滴司机拉了人就能走，而我们免费等候时间长达40分钟，到达目的地后，还有卸货时间，通常做一单都得一两个小时。”有司机称。

也有司机告诉财新记者，随着平台上新司机越来越多，订单也越来越难抢到，司机收入呈下降趋势。

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货拉拉调研分析报告》显示，有62.5%的司机日均接单量不超过5单；有50%的司机月收入在4000—8000元，有14.3%的司机月收入低于4000元。在满意度上，仅有38%的司机对货拉拉平台感到满意。

谁是第一责任人

种种乱象背后，没有明确的监管部门和法律法规来约束货拉拉是一个重要原因。此次用户跳车事件发生后，货拉拉虽然道歉，但其具体应承担何种责任，该受到什么样的处罚，至今未

有明确说法。

裁判文书网显示，货拉拉近年的几十起诉讼中共有7起涉及人身伤害案件，其中3起为司机卸货或搬运时发生伤亡意外；1起为随车乘客行车途中因货物没有固定而受伤；1起为两名随车乘客在行车途中遭遇单车事故受伤。在这些案件中，货拉拉均以中介服务定位和用户免责条款进行辩护，且在此类案件中全部胜诉。

在过去，线下货运企业主要由《[道路运输条例](#)》和《[道路交通安全法](#)》来约束。网络货运出现后，一度给监管带来难题。2016年开始，国家交通部启动无车承运试点工作，在三年试点的基础上，2019年9月，国家交通部和税务总局联合颁布了《[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管理暂行办法](#)》（下称《[网络货运管理办法](#)》），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两年。在此期间，物流企业可申请经营范围为“网络货运”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

这意味着，货运行业有了类似网约车经营许可的行业牌照性管理。文件对网络货运平台日常经营管理、监督检查、如何审核入驻车辆及司机的资质、违规后有关部门的惩处等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

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明确了网络货运平台是第一责任人，订单运输过程中一旦出现问题，其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然而，《[网络货运管理办法](#)》却给货拉拉们留下了政策空隙，其中有一条称，网络货运经营不包括仅为托运人和实际承运人提供信息中介和交易撮合等服务的行为。货拉拉一直没有申请“网络货运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自称平台业务属撮合业务，不适用网络货运资质。

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鞠秦仪认为，货拉拉是否受《[网络货运管理办法](#)》监管，尚有争议，其在实际经营过程中所提供的服务已经超过了撮合和中介的范畴，其实际服务内容与《[网络货运管理办法](#)》中网络货运资质企业服务内容无本质差别。

一名公路行业人士表示，《[网络货运管理办法](#)》主要针对的是公路干线运输上的网络货运平台，设计时并未将含有C端用户的同城网络货运考虑在内，因此有一定的政策局限性。

也有地方政府对同城货运出台文件进行监管。1999年，上海出台的《上海市货运出租汽车运输管理暂行规定》也明确了经营平台为运输第一责任人，还对平台车辆的使用维护、服务方式、驾驶员行为规范、处罚进行了明确规定。

然而，这样的地方法规依然无法约束货拉拉平台。业内人士表示，上海市货运出租车管理规定只监管需要进入上海市区的黄牌货车，而货拉拉平台在市区从事货运业务的以不受约束的蓝牌车（私家车和小货车）为主。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要约束货拉拉这样的货运平台，首先需要明确运输订单中谁是第一责任人，不能将责任推诿给司机和用户。

2020年11月，国家交通部起草了《[道路运输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网络平台的安全责任和所承担的合同义务，且未将信息中介和交易撮合服务免除在外。一旦该条例获得通过，货拉拉等同城网络货运平台的监管将有法可依。

交通部称，目前部分制度设计与“互联网+道路运输”的快速发展不相匹配，因此修订后的《[道路运输条例](#)》将对网络平台货运经营进行规范，明确以无车承运人身份从事货运经营活动的网络平台，具备承运人属性，并对其备案条件、行为规范、法律责任予以系统规定。

2月25日，交通部针对货拉拉用户跳车身亡事件发声：无论传统道路货运物流企业，还是依托互联网、信息化技术成长发展的新业态新模式，都应牢牢坚守安全发展的底线，决不能打着创新的旗号、走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路子。

3月3日，深圳市交通运输局也表示，已再次约谈了货拉拉相关负责人，并将采取督促该司建立、完善交通运输相关安全管理体系，配备安全管理人员等措施，落实运输环节货物运输安全相关要求。

注：本文刊发于《财新周刊》2021年第9期，原题为：谁来监管货拉拉

版面编辑：吴秋晗

财新周刊 | 经济复苏热钱涌动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再来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全球量化宽松和经济复苏扰动市场预期，原油、金属等大宗商品价格经历一轮暴涨后又陷入剧烈调整



大宗商品此轮价格上涨，需求端成长空间不及上一轮超级周期，供给端产能释放必将平抑价格，微观层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罗国平 卢羽桐

经济复苏，热钱涌动，市场情绪火热。工业金属、石油化工等所谓“顺周期”板块，自2021年2月以来突迎爆发性行情，推动大宗商品价格崛起，令市场一度热议超级周期有望再来。但进入3月份，顺周期板块很快陷入剧烈调整。

所谓“超级周期”，是指大宗商品持续多年的上涨或高位徘徊。2000年至2014年，受中国、印度需求支撑，以及中国在2008年的“4万亿”计划，石油、铜等主流大宗商品曾走出一波超级周期行情。

新冠疫情以来，全球主要国家实行大规模的货币宽松政策，截至2020年12月底，美欧日三大央行M2（广义货币供给量）46.8万亿美元，同比大增21.16%。其中美国国会已通过数轮经济援助方案，总规模达4万亿美元左右。美国新任总统拜登上台后，给出的1.9万亿美元纾困刺激方案尚未落地，近日又传出将推超万亿美元的大规模基建计划，掀起了市场对“放水行情”更大的预期。

美国激进的财政刺激计划推高了经济增长预期，加之疫苗接种顺利推进，消费复苏前景利好原油。过去两个月，美国通胀预期开始抬升，资本市场中的“再通胀”交易变得活跃起来。大宗商品迎风起舞。覆盖19个大宗品种的路透CRB商品指数在2月以来最多上涨约12%，较2020年4月底拉升超过八成。和新能源概念相关的上游金属原材料更是市场追逐的热点。LME铜、LME铝、LME镍、LME锡分别最多上涨约22%、13%、13%、18%，碳酸锂价上涨超过30%。尤其伦铜一度冲破9600美元/吨，创九年半新高。

“大宗商品之王”原油的价格，已经回到疫情前水平，布油原油期货、WTI原油期货每桶均破65美元，一个多月就涨了约两成。产业链被疫情打乱的农产品也在飙涨，豆油、棉花主力合约分别较2月初最多上涨约19%、13%。钢铁上游的铁矿石，则从2月初的150美元/吨高位继续上涨，截至3月4日涨幅也近18%。

美国长期国债利率自2月中旬一路上行，美元走强，经济陷入滞胀预期，2月底开始，市场旋即调头，大幅回调。至3月9日，路透CRB商品指数较高位最多跌去约3%，伦铜从高位最多跌去8.5%。二级市场最为敏感，和期货市场联动反应，加上被国内多家机构重仓的“抱团股”瓦

解，二级市场回调速度比大宗期货市场更剧烈。

2月，有色金属龙头紫金矿业（601899.SH/02899.HK）、江西铜业（600362.SH/00358.HK），铝业巨头民企中国宏桥（01378.HK）、央企中国铝业（601600.SH/02600.HK），镍矿标的中国中冶（601618.SH/01618.HK），此外还有中国石油（601857.SH/00857.HK）等，短期涨幅最多普遍在20%以上，港股涨幅更大。中铝、中冶的港股涨势堪称疯狂，不到一个月涨幅高达70%、50%。而至3月9日，短短数日，除石油股，其他股票普遍跌回2月初至2月中旬的水平。

基本面不同，大宗各品种之间分化正在加剧。由于OPEC+限产力度不减，沙特遭袭，美国又因疫情、天气难以短期提升产量，原油走出了独立于其他大宗商品的行情，一路震荡走高。镍则因技术改进，供给过剩预期强烈，价格自3月3日出现大跌，5个工作日跌去15%，回到2020年11月份的价格。

多名产业界和资本市场人士认为，货币超发依旧，通胀不减，有金融属性且有一定基本面支撑的大宗商品，或仍将在高位震荡。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下称“有色协会”）一名负责人指出，金融或资本导致的市场大幅波动，将对产业造成恶劣影响。待全球经济恢复至2019年水平，有色金属产业难免转向下行周期。“产业是老老实实靠本事吃饭，而金融或资本导致的后果一定是产业界来吃。就怕一阵风过去，产业界要清扫一地鸡毛。”

多名实业界人士称，此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需求端的成长空间尚不及上一轮“超级周期”，供给端产能逐渐释放必将平抑价格，且企业、产业链、市场层面仍存诸多不确定性因素。英国大宗商品咨询机构CRU近日也发布长篇报告指出，疫情后的经济复苏、通胀预期、低库存、供给端扰动等因素都是暂时的，难以长期持续。



2016年第14期封面报道
[《大宗商品走向何方》](#)

“硬通货”避险效应

2021年的关键词是“疫情后”，经济复苏是大背景。莫尼塔首席策略分析师何晓说，顺周期行情实际从2020年下半年就已启动，彼时由于中国疫情率先得到控制，企业复工复产有序推进，有色金属、化工、煤炭等周期行业自2020年7月开始上涨。2021年2月以后，全球疫苗接种

逐步铺开，全球经济复苏确定性更强，又进一步刺激了这些板块继续飙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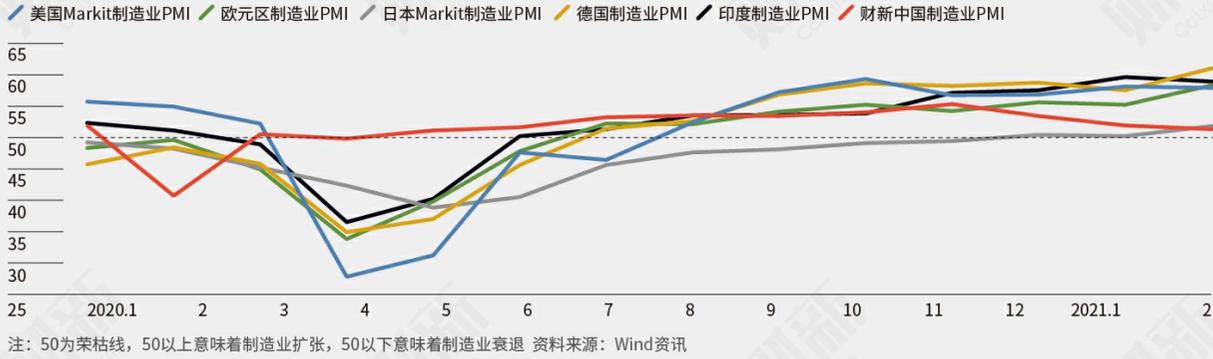
当前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制造业均在回暖。2021年1月，美国Markit制造业指数PMI报59.2，欧元区PMI指数报54.8，澳大利亚制造业PMI报55.3，印度制造业PMI报57.7，均高于荣枯线；2021年2月，美国、欧元区分别报58.5、57.9，均处于高位。

何晓认为，2021年大概率出现全球贸易共振。疫苗落地后，海外经济继续修复，制造业补库存将推动进口，这一过程将对应中国、韩国及东南亚地区等主要制造业基地的出口扩张。中国作为全球主要制造业基地，全球贸易共振带动出口增加，大宗商品等周期性板块的景气度仍将处于高位。

何晓回顾称，此前在2009—2010年、2016—2017年两轮复苏周期中，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上行回升，中上游顺周期板块都存在较好的表现。目前中国PPI刚刚同比转正，2021年1月为0.3%，PPI上行趋势有望延续，这对中上游周期行业盈利产生了较大支撑。

标普全球普氏（S&P Global Platts）金属分析师Paul Bartholomew向财新记者进一步分析，此前两轮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都是全球市场从严重衰退中复苏的体现。中国也是这两轮衰退中首先恢复的国家，支撑了大宗商品的需求。

全球经济正在回暖



大宗商品全线翘头



新能源相关金属供给偏紧



金属价格高位震荡



[点击见大图](#)

大宗商品在2011年时曾经历一波价格急剧上涨，几个月内达到的高位至今尚未打破。如伦铜在2011年2月数次冲破1万美元的高位，最高达10190美元/吨；布伦特原油期货从2011年1月底攀升至100美元/桶，并保持在110美元/桶至120美元/桶之间浮动，直至2012年中开始回落到100美元/桶以下。

一家国有有色金属企业的高管告诉财新记者，此轮大宗商品暴涨，实质是资产在重新定价，而非反弹行情，整个大的供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由于美元货币泛滥，而大宗商品以美元计价，美元贬值的金属属性间接反映到了大宗商品价格里。而隆众资讯副总经理闫建涛从资产配置角度分析认为，大宗商品被视为“硬通货”，为抵御通货膨胀、美元指数下跌，资产有重新配置大宗商品的避险需求。

新能源卖点

大宗商品覆盖许多品种，近期有跟风普涨的特点，但不同品种投资逻辑、供需弹性、稀缺度并不相同，行情走势必然出现分化。

[农银汇理基金](#)经理赵诣告诉财新记者，中国、欧盟在2020年加强了碳排放投资力度，美国拜登政府重回《巴黎协定》，发展新能源是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方向，因而新能源成为各大经济体共同的战略性投资方向。

掌握能源定价权，减少对原油进口的依赖，能源自主可控，也使得新能源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点。依据中国的政策规划，2030年，中国风电、光伏总装机容量须达到12亿千瓦，较2020年底的5.3亿千瓦再涨1.3倍。国务院办公厅2020年11月发布的规划提出，2025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新车销量须达约20%，在2020年5.7%的比重上提高14.3个百分点。

资本市场买的是预期，市场普遍预期铜、锂、镍、钴、铝、锡等与新能源相关金属的需求有望出现大幅上涨，而其产能在短期内很难大幅提升，只有通过价格平衡供需。与新能源金属2月至少13%的涨幅相比，铅、锌等传统金属的价格涨势略逊一筹，LME铅、LME锌期间内最多分别涨了6.5%、11%。

[五矿证券](#)总裁助理葛军告诉财新记者，过去几年有色金属价格一直保持在较为正常的区间，导致该领域的资本开支增加不多，新增产能有限，因而有色金属本身的总体库存偏低，也促成了此轮行情的产生。

铜价的飙涨最为典型。多家市场机构预测国际铜价可以突破每吨1万美元以上。[中信证券](#)2月21日发布的报告将2009—2011年（金融危机）与2020—2022年（疫情危机）两段相似背景的铜价走势进行比较，称铜价上涨已来到“供需缺口+通胀”为核心驱动力的新阶段。未来一年，伦铜甚至有望达到1.2万美元/吨。

紫金矿业一名中层人士告诉财新记者，从2020年下半年开始，铜的需求逐渐增加，短缺态势明显扩大，而当前铜矿新增项目并不多，且新建矿山至少需要三到五年，老矿山扩大产能也受制约，供给短期内难以跟上需求。

铜的下游需求主要为电力、建筑、家电、电子、汽车等行业，以电网基建、电源基建在内的电力网络消费最大，增量集中在光伏、风电装机；纯电动汽车的铜消耗量也比传统汽车要高约1倍左右。

世界金属统计局（WBMS）2020年的供需平衡数据显示，全球铜供需缺口从2020年4月持续扩大，全年铜供应缺口达139.1万吨，较2019年的9.4万吨缺口扩大了近130万吨。

也有部分期货市场交易助推铜价上涨。上期所数据显示，2021年2月，铜成交量同比增105.59%，成交额同比增189.72%。上期所期货公司会员企业在2月铜期货总持买量为37.67万手，较1月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持买量增加了34%，对应约188.35万吨铜。

铜之外，新能源汽车使用的三元电池需要锂钴镍等金属原材料，其中锂的市场价格迅速上升。2月22日，碳酸锂（99.5%电池级/国产）报8万元/吨，较2月初上涨约30%，较2020年8月时4万/吨上下的锂价已经翻倍。葛军认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已进入正向反馈加强阶段，金属锂的需求或将持续旺盛，而全球锂有效新增产能有限，且有时间约束，未来锂矿价格仍较乐观。

由于技术出现革新，行情波动最大的是三元电池主要原料之一镍。3月3日，中国不锈钢龙头[青山控股](#)间接宣布其高冰镍产线已试制成功，并公布了三年扩产计划。这则供应扩张消息瞬间扰乱整个镍市，伦镍当天跌去7.72%，创2016年来最大跌幅；第二天续跌，两日抹去了1月以来的所有涨幅。

“镍铁冶炼高冰镍再制电解镍通道打通，电池行业缺乏一级镍的故事暂时宣告结束，基本上支撑镍价的主要故事不存在了。”一名镍业资深人士解释，此前行业主要用硫酸镍制电解镍，而硫酸镍资源紧缺。

铝市一片火热，沪铝主力合约在3月3日报收17640元/吨，同样创下九年半新高。上述国有

有色金属企业负责人告诉财新记者，铝的应用增量主要在光伏板、分布式电站。中国自2017年启动铝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国内电解铝总产能设定在4500万吨。铝耗电量在工业品种中最高，在碳达峰约束下，很难再有产能增量，供不应求的局面或持续。

与此同时，沪锡也涨至上市以来的新高，2月25日主力合约报收19.2万元/吨，较年初上涨约26%。安泰科锡项目部经理郭宁表示，中国有三成的锡需要进口，且基本从缅甸进口，疫情防控措施加上近期缅甸政局动荡，使得锡供应进一步收紧。此外，后期锡相关产业“十四五”规划的落地也会提升锡市场的需求预期。

前述有色协会负责人认为，能源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是资金流向基本金属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供给侧改革下，包括钢铁和铝在内的行业已经达到了产能“天花板”，难以新增任何产能。

而铅有毒，主要用在传统铅酸蓄电池上，现正被锂电池等新储能材料逐步替代。锌主要用做镀锌板、锌涂料以防腐蚀，用量与钢铁行业发展息息相关。弘业期货在2月底的研报中表示，再生铅企业节后复产预期好于去年，加上下游蓄电池企业原料库存充足，铅价弱势格局或将延续。而节后市场对锌消费预期乐观，锌价易涨难跌。

油价在2月迎来超预期上涨。闫建涛解释，背后刺激因素是疫情下的需求季节性错位，以及美国南部地区出现极端天气。疫情之下，大宗商品周期的季节性变化普遍推迟，目前相当于往年的九十月旺季行情。

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投行认为，结构性牛市正在路上，纷纷上调油价预期，高盛近日将三季度油价预期调升至75美元/桶。摩根士丹利甚至认为接下来国际油价或出现一轮超级周期，最乐观情境或升至100美元/桶。

但中化集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教授级高级经济师王海滨提醒，油价短期上探不无可能，但油价与工业金属上涨的逻辑不同，美国页岩油气革命之后，页岩油气从开钻到投产，周期只有半年左右，原油供给弹性变大，油价难以长期维持高位。美国页岩油盈亏平衡点在40美元/桶左右，只要油价高于此，美国钻井数就将增加，供应增加，进而压低油价。且油价上涨，大型油企也在做套期保值（卖空）锁定利润，这对油价也有平抑作用。

闫建涛进一步指出，石油作为传统能源，需求增长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在疫情前，全球石油需求增速已在下降；疫情后，在新能源冲击下，需求增速只可能接着下降。

原油供给背后的政治博弈错综复杂，一德期货总经理助理余建跃也对财新记者分析称，原油不仅是工业原料，也是生活资料，对美国而言，压住油价就意味着压住了通胀，不会允许过高的油价出现，美国可借力沙特、伊朗压低油价。作为产油大国的俄罗斯也不希望油价过高，否则会丢掉自己的市场份额。

供给端反应更快的农产品，整体表现不如工业品，不过仍在持续上行。以大豆为例，豆油主力合约3月4日盘中达到近9000元/吨，为八年来新高，较年初上涨约15%。一名农产品分析师称，2020年全球供应链出问题，近月大豆到港量少，大豆库存较低，供应紧张，而中国生猪产能恢复好于预期，对大豆需求较旺盛，导致其价格上涨。

拐点在何时

大宗商品市场如火如荼，但不少业内人士仍保持谨慎态度。无论如何，市场都将回归基本面。

半夏投资创始人李蓓2月底在公开场合表示，美国得州暴雪导致的原油产量下降，伦铜库存从年初以来出现的反季节下降，以及欧美疫情的好转早于预期在内的事件，共同导致了大宗商品市场的情绪共振，但这些事件都有一定的偶然性。

李蓓认为，虽然铜的显性库存低，但占据国内铜近半消耗量的下游铜杆的隐性库存近期上升量已经超过了伦铜库存的下降数量，而原油价格的回升仍主要依靠主要产油国的减产，这些均说明现在的基本面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此外，葛军也称，目前有色金属的需求端只是给价格上涨提供了一个边际推动力。作为消

耗全球过半金属的大国，中国从2012年已经过了工业化的加速阶段，没有其他国家能承接中国金属需求增速下滑所带来的缺口。

大宗商品主要需求来自房地产和基建。在3月2日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会上，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房地产的金融化、泡沫化倾向仍比较强，但2020年投向房地产的贷款增速八年来首次降到了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之下，相信房地产的问题会逐步得到好转。市场普遍预期，2020年颁布的“三条红线”房地产信贷控制政策，将在行业去杠杆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加之需求端“房住不炒”、限贷限购政策长效化，未来房地产市场在供需两端都很难再爆发性增长。

此外，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吸取上一轮金融危机时期“4万亿”计划的教训，宏观层面现已在讨论如何从疫情状态“转弯”及宽松政策温和退出的问题。据国家交通运输部部长李小鹏预计，2021年全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2.4万亿元，该目标比2020年完成量低近三成。

率先复工的中国已出现经济动力减弱的迹象。中信建投金融工程兼大类资产配置与基金研究团队首席分析师丁鲁明提醒，在2021年1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已出现了明显的超季节因素下行，“市场在当前这个位置需要更谨慎一些”。

2021年2月，受春节因素影响，财新中国制造业PMI录得50.9，环比下降0.6个百分点，虽连续第十个月位于扩张区间，显示疫情后经济仍在持续恢复，但该数值已连续第三个月下降，至2020年6月以来的最低值，经济复苏边际效应进一步减弱。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录得过去十个月和九个月的最低值，就业指数则连续第三个月下降。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企业购进价格指数大幅高于荣枯线，维持强势，过去三个月是2018年1月以来购进价格指数最高的三个月，通胀压力持续增加。

截至3月4日，反映通胀预期的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在约1.47%，升至一年以来高位；2月初，这一数据还仅在1.07%左右。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在2月23日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淡化通胀担忧，表示即使经济前景改善，仍将继续保持资本购买速度，美国通胀应不会持续太久。

宽松政策何时退出、如何退出，是接下来市场的核心关注点。资产管理公司矽亚投资总裁张兰丁认为，美联储加息缩表，导致全球美元回流，且经济恢复不及预期，美国就业数据不佳，可能带动大宗商品回调。

对于未来市场而言，流动性回收与经济修复可能会存在青黄不接的动能衔接问题，2021年全球市场的波动也将进一步增大。中信建投认为，全年市场走势或“一波三折”，即涨势行情出现在2021年一季度，未来在三季度或有小反弹。其中，消费、制造业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或出现一定回落，出口也将前高后低。

“这一轮后续的走势在于关注世界经济何时出现拐点。”何晓表示，从中长期看，如果后续美国通胀回升至潜在目标以上，美元流动性回收，全球经济大概率重回疫情前的下行周期，那么“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仍将是长期趋势。回顾2011年下半年，欧债危机爆发，全球经济转向下行，大宗商品价格旋即调头直下。

流动性方面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所带来的资金大量流动，对大宗商品产业本身并不是一件好事。前述有色协会负责人提醒，这种在世界范围内为了让经济在重大灾难面前保持稳定而采取的非常措施，一旦经济恢复正常，影响就会体现出来：商品价格的上涨刺激产能的释放，这意味着将来的生产水平会非常高；而疫情一旦稳住，各国刺激政策收紧，实际消费量上不去，将来遍地都是金属，“企业就要准备再过苦日子了”。

财新特派华盛顿记者杜知航，记者于海荣、陈曦对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刊发于《财新周刊》2021年第9期，原题为：重估大宗商品

观点 | 疫情后争建大型公立医院并非上策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强化分级诊疗体系更有助于防控疫情，但现有政策与此背道而驰；改变现状可从三招入手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范围内已经有近20个地区规划新建大型公立医院。

文付明卫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疫情被控制住后，多个城市纷纷新建大型公立医院。譬如，武汉2020年7月在四个区各开工新建1家床位不低于1000张的三甲公立医院。河南省卫健委在2019年初表示今后不大改大建公立医院，但2020年3月表示今后五年要新增162家三级公立医院、新增三级公立医院床位10万多张。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范围内已经有近20个地区规划新建大型公立医院。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新建大型公立医院不利于疫情防控

原国家卫计委2014年曾专门发文《关于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过快扩张的紧急通知》（国卫发明电【2014】32号）。2015年公布的《[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严格控制新建和扩建公立医院，尤其是省办和市办公立医院。

疫情后，各地违反中央政府规定，纷纷规划新建大型公立医院，是因为他们错误地理解了武汉疫情防控经验。武汉疫情期间，武汉协和医院、中南医院等大型公立医院在确诊、救治新冠患者方面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外省中驰援武汉的北京协和医院、湖南湘雅医院、山东齐鲁医院、四川华西医院等大型公立医院引人啧啧称赞。正是这一现象触发了各地纷纷规划新建大型公立医院。然而，各地没有认识到，新建大型公立医院虽然有助于确诊、救治传染病患者，但会促进传染病传播，增加感染人数。

大型公立医院拥有高水平医生和先进设备，在确诊和救治传染病患者上具有优势。但是，大型公立医院建成后，会使得有限的优质医生进一步向大医院集中、加剧社区优质医生匮乏状况，导致患者进一步向大医院扎堆。结果是，个别去大医院就诊的传染病患者有很大机会迅速感染众多其他就诊者。少数居民感染传染病带来的恐慌，会让更多病人涌进大医院，形成“医疗挤兑”。

虽然没有专门的统计数字，但多位医务人员已指出，武汉众多普通发烧居民是在大医院排队候诊时感染上新冠肺炎的。譬如，武汉市肺科医院发热门诊护士长王洁在接受《人物》采访

时曾回忆道：“所有病人都陷入了恐慌，不管新冠非新冠，全部涌进门诊，造成了更严重的交叉感染”；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也曾对上述媒体介绍：“病人来看病，一排队随便就是几个小时，我们也完全没法下班，发热门诊和急诊也都不分了，大厅里堆满了病人，抢救室输液室里到处都是病人。”

各地也没有认识到，不做好预防，一旦传染病暴发开来，新建多家大型公立医院也无济于事。

武汉是医疗资源十分丰富的城市，辖区内有10多家床位超过2000张的三级公立医院，20多家床位超过1000张的三级公立医院，其中五家医院是各种中国医院排行榜的“百强医院”。可以说，武汉的医疗资源丰富度是全国绝大多数城市无可比拟的。然而，即使这样，疫情暴发后，武汉收治患者的病床缺口仍然十分庞大。火速新建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后，床位依然不够。后来建设众多方舱医院才满足需求。其他城市即使新建多家大型公立医院，人均医疗资源也很难赶上武汉的规模，因此也很难独力应对此类恶性传染病冲击。如果仅仅为了应对恶性传染病冲击而新建足够多的大型公立医院，那么这些医院平时必然会处于闲置状态，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新冠疫情冲击给全球经济增长蒙上阴影。随着经济增速进一步下滑，全国多地财政收入锐减。新建大型公立医院耗资少则数亿元，多则几十亿元，后续的运营投入数额会让本已脆弱的地方财政雪上加霜。

分级诊疗体系有助于最大限度控制疫情蔓延

一个好的医疗服务体系，平时要能高效满足居民的常规医疗服务需求，瘟疫暴发时能把恶性传染病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样的医疗体系，就是中国新一轮医改矢志建立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分级诊疗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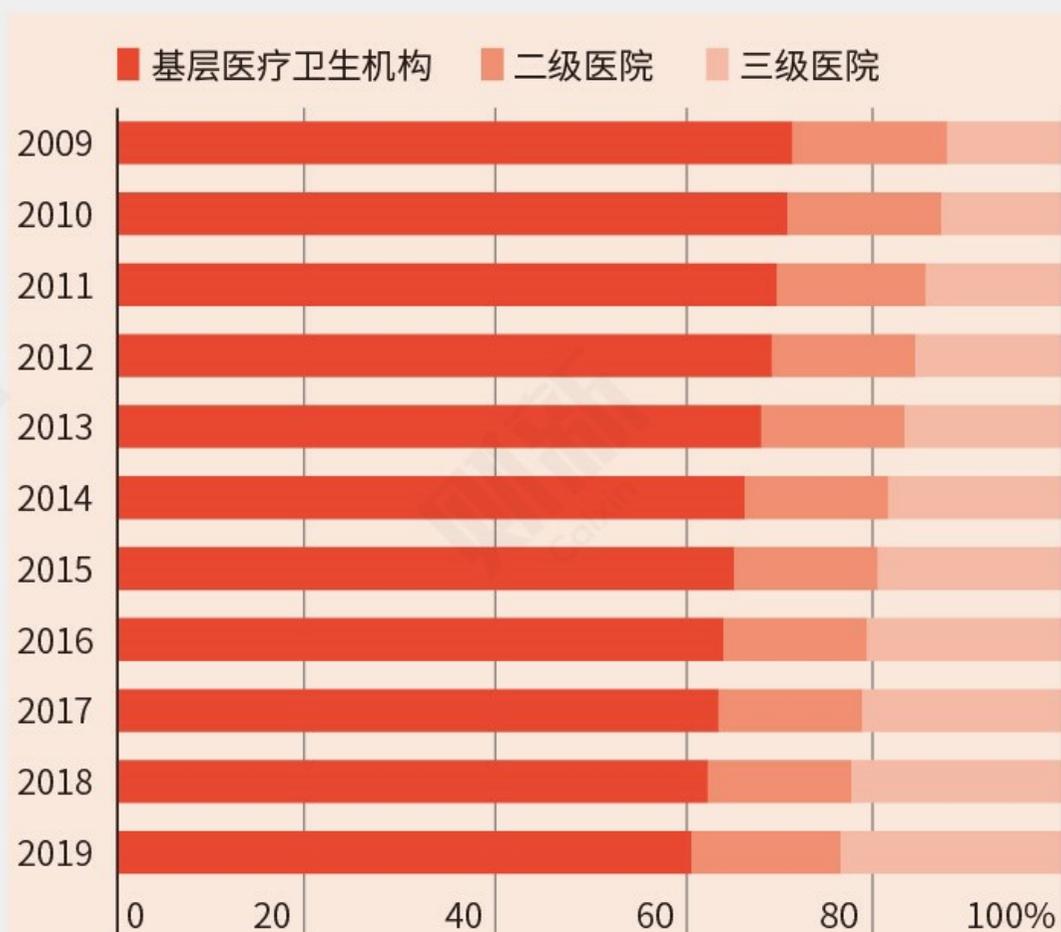
在这样的体系中，由家庭医生执业的诊所处理常见病、多发病和慢性病，疑难杂症由家庭医生转诊到相关大医院救治。这样就实现了“小病不大治”，不仅减轻患者负担，而且杜绝了大医院看病拥挤现象。

家庭医生和病人间有稳定的联系，通常会服务同一个家庭的几代人，熟悉病人病史，和病人有高度信任。病人出现状况，会第一时间求诊于家庭医生，不会病急四处投医，因而能降低传播疾病的可能性，并且大幅缓解疫情来袭时的恐慌情绪。

家庭医生分离出一般感冒患者和不明病因患者后，将后者分诊到专科医院；即使没能分离出此类病患，这种就医模式下不明病因患者接触的医生和其他疾病患者都很少，这就大幅减少了交叉感染。而中国今年年初在河北和黑龙江等地发生的疫情，都是先从农村或县域地区悄然暴发，病毒已经在一定范围内扩散后方被发现，由此也凸显了基层医疗资源不足带来的巨大风险。

遗憾的是，十多年来，新医改与建立分级诊疗体系的目标渐行渐远。2009至2019年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诊疗人次数占比从71.3%下降到61.0%，每年平均下降1.0个百分点；三级医院的诊疗人次数占比从12.6%上升到23.6%，每年平均上升1.1个百分点。在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诊疗人次数占比超过80%，英国超过90%。这表明，医联体、医保差别化报销比例、强制性基层首诊、城市医院对口支援农村等系列措施均无济于事。新建大型公立医院，会进一步恶化分级诊疗状况。

三级医院、二级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诊疗人次数占比



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包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诊所、村卫生室和医务室等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

[点击见大图](#)

建成分级诊疗体系的关键因素

建成分级诊疗体系、筑牢疫情防控网底的关键是基层有优质医生。

基层有优质医生，是指有自愿选择长期扎根在基层执业的优质医生。这样的医生为了获得更高收入，会不断提高诊疗水平和改善服务态度，赢得社区居民的信任。目前，针对对基层医疗机构缺乏优质医生的困境，各地通过大医院对口支援和医联体内医生到基层轮诊的方式予以

改善。但通过此类渠道下基层的优质医生，不是长期到基层执业，无需在基层“擦亮招牌”，自然不能获取社区居民的信任。

基层所需的优质医生，也不可能依靠医学院校为基层定向培养，原因有二：首先，有多年执业经验的医生才能成为优质医生。医学院校直接培养不出来优质医生；其次，如果不取消公立医院医生的事业单位编制，医学院校定向培养的医学生，在基层执业多年变为优质医生后，也会被大医院“虹吸”走。

疫情后如何筑牢防控网底

中国绝大多数优质医生都集聚在公立医院。只有通过相关政策让他们自愿走出来自由执业，基层才会有好医生。为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取消公立医院医生的事业单位编制。

公立医院医生基本都是有事业单位编制的“单位人”。由于公立医院养老金制度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并轨，事业单位编制带给公立医院医生的利益还剩下工作稳定性、职称评审、课题立项和评奖评优等。如果不取消公立医院医生的事业单位编制，和体制外医生相比，这些不公平的利益就废除不了，优质医生就不会走出来。国家新医改以来多次发文鼓励医生多点执业，但“雷声大、雨点小”，实际实现多点执业的医生少之又少，背后原因就在事业单位编制。取消公立医院事业单位编制，还能让公立医院医生收入不再受公务员、教师等收入的掣肘，实现高收入的阳光透明化。[深圳市新入职医务人员2015年6月起就不再事业单位编制](#)，目前运转良好。

第二，建立医保签约医师制度。

中国基本医疗保险（简称“医保”）的支付定点资格目前只面向医疗机构，而不是医生个人。虽然中央政策反复强调医保定点要公平对待民营医疗机构，但现实中很多民营医疗机构运营多年后都申请不到医保定点资格。这让很多想走出公立医院开办个体诊所的医生望而却步。

医保部门应尽快改革现行医保支付定点资格制度，施行国际通行的签约医师制度。施行签约医师制度后，医生无需再倚靠医疗机构获取医保签约服务资格，可自由执业；医疗机构招聘到医保签约医师即可接诊医保患者。施行签约医师制度还强化了医保对医生个人诊疗行为的规范和引导，有利于完善医生个人的声誉机制。2015年发布的公立医院改革文件都强调，医保对医疗机构服务的监管要延伸到对医务人员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医保签约医师制度正是延伸监管的落地举措。将医保支付定点资格的对象由医疗机构变为医生，监管机构所增加工作量的绝大部分都可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来完成，因此无需担心医保部门人手不够的问题。

第三，建立医疗机构和医生的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

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既能约束医疗机构和医生的违规行为，也能让优秀新设医疗机构和医生迅速获得患者认可。2019年发布的《[关于印发促进社会办医持续健康规范发展意见的通知](#)》提出建立医疗机构信用评价体系和信息披露制度，搭建可免费公开查阅的公共信用记录网络平台。此平台不仅要记载各政府部门对医疗机构和医生的相关处罚信息，而且要公布医疗机构收费水平、服务质量等方面的信息。

中国当前互联网应用广泛，建立此类平台也并无技术上的难度。英国政府建立了公开网站“Choose and Book”，提供医院不同科室平均看病等待时间、死亡率、感染率、门诊量等信息。美国政府建立了公开网站“Hospital Compare”，提供医院死亡率、感染率、患者评价等信息。此类制度也为患者提供了极大便利，中国可借鉴上述国家的成熟经验。

基层医疗体系的完善，一度曾被认为是西方国家防疫的优势，其分级诊疗体系在防控疫情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美国首例确诊病例，就是去一家急诊诊所首诊，在那做了相关检查后被转送医院。至于疫情的快速蔓延，主要是与西方国家未及时实施社交隔离政策和严格执行“口罩令”等情况有关。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就曾在2020年3月接受《Science》杂志采访时表示，“不戴口罩”是欧美防疫最大的错误。中国应理性审视疫情后大建公立医院的风潮，也要谨防将分级诊疗的作用

与西方国家早期防疫政策的失误混为一谈。□

注：本文刊发于《财新周刊》2021年第09期，原题为：疫情后争建大型公立医院并非上策

版面编辑：吴秋晗

回溯 | 一周回溯（《财新周刊》2021年第09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3月1日，2021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习近平讲话强调，年轻干部需不断增强意志力、坚忍力、自制力。

2月24日，美国总统拜登解除了前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发布的“绿卡”冻结令。

2月27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投票通过1.9万亿美元经济救助计划，以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此后，该计划将交由参议院审议。

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完善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进行第28次集体学习，习近平讲话强调，要紧盯老百姓在社保方面反映强烈的烦心事、操心事、揪心事，不断推进改革。

2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大关，预计全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72447元。

3月1日，习近平分别同波兰总统杜达、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通电话。

3月4日、5日，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和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先后在北京召开。

3月2日，欧盟宣布对与俄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事件有关的4名俄罗斯人员实施制裁；同日，美国也以纳瓦利内事件为由宣布对俄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

3月1日，恩戈齐·奥孔乔-伊韦阿拉正式就职世贸组织（WTO）总干事一职。

2月26日，美国情报部门公布沙特阿拉伯籍记者卡舒吉遇害案的调查报告，美国政府随即宣布数项针对沙特的制裁。沙特外交部声明拒绝接受这一报告。

2月25日，美军空袭了位于叙利亚东部阿布卡迈勒附近的民兵组织的基础设施目标，摧毁多处设施，空袭是对美军和多国联军人员近期在伊拉克遭袭的回应。

3月2日，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势头得到遏制，2020年房地产贷款增速8年来首次低于各项贷款增速。

2月27日，嫦娥五号带回来的月壤正式入藏国家博物馆。月壤即覆盖在月球表面的“土壤”，包含微细的矿物颗粒、岩石碎屑和玻璃质微粒等。

2月28日，赵婷凭借《无依之地》斩获金球奖“最佳导演奖”，她是首位获得这一奖项的亚裔女性导演。

2月28日至3月1日，中央有关部门在深圳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人士对完善“爱国者治港”有关制度的意见。

3月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广州出席国际疫情防控专家研讨会，与美国著名传染病学专家福奇博士连线对话，探讨全球抗疫合作等话题。

2月25日，陈薇团队研发的新冠疫苗获批上市，该疫苗是目前国家批准上市的新冠疫苗中，惟一可采用单针接种程序的疫苗。

3月1日，法国巴黎刑事法庭对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贪腐案做出判决，萨科齐被判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两年执行。

3月2日，北京市通报，自1月1日全面启动9类重点人群新冠疫苗接种，截至当日14时，全市累计接种765万剂次，累计接种达500万人，其中264万人完成两个剂次接种。

3月1日，为从源头防范植物疫情风险，大陆暂停台湾地区菠萝输入，台社会各界对此颇为

关注。

3月2日，通过谈判，尼日利亚扎姆法拉州2月26日被绑架的279名女子中学学生获释。近来，尼学生遭绑架事件时有发生。

2月24日，委内瑞拉宣布驱逐欧盟驻委大使伊莎贝尔·佩德罗萨。欧盟近年来持续对委进行干涉，累计通过55项干涉决议或制裁措施。

3月1日，国产大飞机C919在全球的首个正式购机合同签约，东航首批引进5架C919客机。

2月27日，吉林化纤公司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工人吸入有毒气体致5人死亡8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

2月27日，香港知名喜剧演员吴孟达在香港病逝，终年69岁。吴孟达被誉为“香港黄金配角”，与周星驰的合作更给人们留下难忘印象。

3月2日，缅甸警方释放511名早前被扣押的抗议者。2月初以来，缅甸多地持续出现示威抗议活动，持续的抗议活动造成多人死伤。

版面编辑：吴秋晗

前瞻 | 日本纪念“3·11”大地震十周年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当地时间2021年3月2日，日本岩手县，当地海上搜救部门仍在继续着搜寻在2011年地震中的失踪者。图/视觉中国

[《财新周刊》](#) 文财新特派日本东京记者 陈立雄

2021年3月11日是日本遭受“3·11”特大地震和海啸灾害十周年纪念日。10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国内有观测纪录以来最大的9.0级地震和其引发的巨大海啸袭击了东日本地区，共造成15899人死亡、2527人失踪。

10年过去了，虽然重建工作取得不少进展，但日本仍未彻底摆脱此次灾害的阴影。就在2月13日，福岛东部海域又发生了7.3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认为，这是“3·11”大地震的余震。

日本政府决定于3月11日在东京的国立剧场举行十周年纪念活动，预计天皇德仁和皇后雅子、首相菅义伟及国会众参两院议长等均将参加，其中一项内容是在当年地震发生时的下午2时46分举行默哀仪式。

受新冠疫情影响，去年的纪念活动曾被取消，改为在首相官邸举行小规模献花仪式。今年，政府仍将大幅限制参会者人数，从以往的约1000人参会，缩小到各界代表约220人，一般民众也不得到现场鲜花。

菅义伟在3月2日发表讲话称，“我们不让过去的教训消失，将实现防灾、减灾和国土强韧化，以加强抗灾能力”。

据日本政府复兴厅最新统计，地震发生后，震区大部分人外出避难，高峰时达到47万人，目前已降至约4.1万人，他们仍在日本各地生活。东京奥运会的圣火传递活动定于3月25日开启，其起点就是福岛核电站的中转场所“J-Village”。

日本广播协会（NHK）近日舆情调查结果显示，共有近三成的受访者认为“（灾区）复兴没有取得进展”或“尚未取得很大进展”；另有七成受访者认为，“复兴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进展”或“相对取得了进展”。这种谨慎评价反映了地震发生后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留下的阴影。

而清理工作任重道远。东电在今年2月28日公布，发生堆芯熔化的三个机组当中，仅有3号机组成为首座完成燃料搬出作业的机组。按照日本政府和东电的时间表，整体清理作业需要30至40年时间。

当务之急是核污染水的处理。为控制反应堆内的高温，东电向其中注入大量冷却用水。但这些冷却水在接触熔毁的核燃料后，变成核污染水。再加上与地下水和雨水混合，总量不断增加。由此，经净化后保管的大型储罐数量已超过1000个，在厂区内林立，密密麻麻。如何处理

这些储水，菅义伟近日重申，“政府将在适当时间负责任地决定处理方式”。日本经济产业省此前曾认为，这些处理水在稀释到标准浓度以下后可排入大海，但遭至当地渔民反对，中韩等邻国也表示关切。

核泄漏事件让日本重新思考了本国电力电源结构，据日本最新“能源基本计划”，到2030年，核电比例将降低到20%至22%，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则提高到22%至24%。如今，福岛成为日本第二大的太阳能发电中心，县内风力发电站项目也正在增加。

版面编辑：吴秋晗

国风 | 内蒙古清退虚拟货币挖矿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资料图：一处比特币矿场内的矿机运算板。根据剑桥大学另类金融中心测算，2020年4月，约有60%比特币算力分布在中国，第二为美国，约占7%。图/视觉中国

[《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胡越

近日，[内蒙古发改委发布《关于确保完成“十四五”能耗双控目标任务若干保障措施（征求意见稿）》](#)（下称《能耗双控保障措施》），宣布全面清理关停虚拟货币挖矿项目，2021年4月底前全部退出，同时严禁新建虚拟货币挖矿项目。其实，早在2019年4月，由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征求意见稿）》](#)中，就将“虚拟货币‘挖矿’活动（比特币等虚拟货币的生产过程）”列入“淘汰类”。

根据《能耗双控保障措施》，2021年全区能耗双控目标为单位GDP能耗下降3%，能耗增量控制在500万吨标准煤左右，能耗总量增速控制在1.9%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等价值）下降4%以上。除了传统行业如钢铁、焦炭、火电、铁合金等，该征求意见稿也关注到了耗电量巨大的虚拟货币挖矿行业。

根据剑桥大学另类金融中心测算，2020年4月，约有60%比特币算力分布在中国，第二为美国，约占7%。具体到省份，比特币总算力中约有36%的算力分布在新疆，10%分布在四川，7%分布在内蒙古，5%分布在云南。不过，目前真实的算力区域分布并无准确详实数据，而且不同季节、不同月份分布会有差异，例如冬季枯水期煤电就优于水电。

莱比特矿池创始人江卓尔对财新记者分析称，国内水电较为丰富的地区是四川和云南，煤电较为丰富的是新疆和内蒙古。其中，新疆的电力富余情况优于内蒙古，原因是新疆的煤炭、电力输送出省成本更高，而内蒙古靠近北京，多余的煤炭、电力可以输出。“如果是有经验的矿工，选择矿场会优先选择看起来远但电力安全性高的新疆，对市场研究不深的矿工可能会选择内蒙古，而且现在还是冬季，电力都很紧张，离开内蒙古很多矿场也无处可搬，所以总体对矿场的影响肯定有，但是对市场的影响不会太大。”

根据国盛区块链报告，在比特币价格位于58000美元高点时，比特币日产900个，比特币挖矿行业的出块奖励规模为每日5115万美元，交易手续费为765万美元，总计5880万美元（约合3.8亿元人民币）。近日比特币价格有所下滑。

目前，披露详细算力数据的一般为上市挖矿企业。根据国盛区块链报告，截至2021年2月19日，以Marathon Patent Group、Riot Blockchain和BTBT为代表的挖矿股已经扫货33万台矿机，公告算力近21EH/s，超过比特币全网算力（136.18 EH/s）的16%。而在这些上市公司中，至少有Bit Digital Inc（BTBT）、第九城市等披露过矿机部署在内蒙古等地。该报告也援引业内调研称，约有六成算力分布在中国。

2020年9月，中国承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这一大背景下，长期来看，中国境内能够提供的矿电尤其是火力发电预计将减少。□

版面编辑：吴秋晗

心智 | 老年父母和成年子女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文|黄扬名

安人心智科学顾问

最近看了两部电影，《孤味》和《亲爱的房客》，剧中都涉及老年父母与子女之间沟通的议题。

在《孤味》中，我看到妈妈依旧关心儿女，但从儿女角度出发，总觉得妈妈的关心搔不到痒处，反而显得啰嗦，让人反感。

在《亲爱的房客》中，妈妈基本和儿子们没有什么话说，任儿子予取予求，需要钱就给钱，需要帮忙照顾孩子，就帮忙照顾孩子。

《孤味》中的妈妈，至少还口头抱怨了，说女儿不懂体谅自己的辛苦；《亲爱的房客》中，妈妈则是秘密计划自己的复仇，把惟一值钱的房子过户给孙子，而不是给自己的儿子。

这里，就要提一下华人的亲子关系。在孩子年纪还小时，父母会觉得自己懂得比较多、见过的世面比较广，所以认为孩子应该听自己的。孩子比较小时，或许还不会有反弹，即使稍微大一点，也会因为我行我素吃了亏，不得不屈就于父母的说法。

在孩子成年之后，有些比较想不开的父母，还会持续介入孩子的生活，想告诉他们该怎么生活，才是对自己比较好的，结果造就了一些啃老族，以及一些乐于被啃老的父母。随着父母年纪增长，这样的亲子关系，又进入到另一种角力关系。这时变成子女强势、父母弱势。子女会认为父母不该做哪些事情，因为这样对他们的健康不好等等。

最后的结局，大概都是老年的父母表面上忽略子女，仰赖着愿意听他们命令的那些人。但是，在心底最软的地方，还是放不下对子女的关怀。这样的循环，大概是多数华人家庭的脚本，以至于对多数子女来说，爱总是来得太迟，徒留遗憾。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最根本原因，大概跟我们长幼有序的传统观念有关，即使现在，辈分还是在家庭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对华人来说，家庭关系从来就不是扁平的，而是阶层式的。过去，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多是阶层式的，所以这样的家庭关系不会显得突兀。

但是，随着时代进步，很多人际关系渐渐扁平化，而家庭关系变革的幅度却没有那么快。

对比之下，就会让人很纠结，甚至想逃离家庭关系的束缚。只是很遗憾，在私人层面你或许能够闪躲，但在社会层面、法律层面，你都逃不了。就算你父母对你再不好，如果你对他們不孝，甚至對他們有伤害行为，都会受到严重惩罚（除非你能证实自己当时无行为能力）。

阶层式和扁平式的关系有什么差别呢？最大的差异在于，阶层式关系中，上层的人不尽然要理会下层的反应，可以我行我素；而扁平式的关系中，不论你身份如何，只要有想法，就都应该被当作一回事。你想想，过年的时候，会以谁的意见为重？多数成年人，都是以最年长的那位长辈的意见为重。如果长辈想要在家吃年夜饭，那大家就必须在家吃年夜饭，这就是阶层式关系中的互动特性。

该怎么破除这样的关系呢？在华人社会，想把亲子关系拉成扁平的，很困难。即使你愿意，别人对你还是会有不同的期待，而这些期待，不论对父母或是对子女，都是压力。但你还是可以试试这么做：

第一，要有共识。我不会鼓吹所有的亲子关系都该是扁平的，而是彼此间要有共识。不能子女期待是扁平的，而父母期待是有阶层的；也不能是有时候要求是扁平的，有时候又期盼是阶层的。

第二，尽可能直接表达。很多时候亲人间的误会，都来自迂回、不直接的表达。那么，不论你们决定要采用哪种互动关系，都尽可能直接表达，不要觉得别人应该要知道。丑话讲在前面，对彼此的互动都是比较好的。

第三，练习表达自己受伤了。很多时候，我们会不经意伤害到别人，也会受到别人不经意的伤害，无论是家人还是朋友。所以，当自己受到伤害时，请练习让你的家人知道，不要忍耐，因为这些伤害都会累积。与其有一天爆发，还不如在伤害还小的时候就让对方知道，假设他们有意愿，也才有机会做出改变。

最后，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不一定要自己去解决和父母之间的分歧，你还可以请友人帮忙当作沟通的桥梁。若你还爱着你的家人，就开始做点改变吧！

更多精彩请阅读：[【专题】心智](#)

版面编辑：吴秋晗

天眼 | “两会”进行时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图|中新社

图|中新社

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称，经济增速是综合性指标，今年预期目标设定为6%以上，考虑了经济运行恢复情况，有利于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图为开幕会结束后，代表们有序走出会场。□

版面编辑：吴秋晗

回声（《财新周刊》2021年第08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恒恕：气候变化对大自然和人类的影响早已不是书本上曾经的“可能性”，而是实在的、一再被证明的事实。支持将传统能源的污染性纳入其成本，通过价格使全民直接感受到减排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能源转型关键在于价格》](#)

财新网友：新冠的大流行给mRNA开了一扇门，不然生物伦理这个盒子又怎么能轻易打开？

[《解码mRNA疫苗》](#)

simplex1j：指望所谓“领导力”是一种悲哀。

[《贞德与郭京》](#)

小黑同学：和《我不是药神》一样，世上永远治不好“穷病”。

[《苦涩的“糖”》](#)

MR_Davidforever：电子烟本质上就是“新瓶装旧酒”。

[《悦刻能火多久？》](#)

版面编辑：吴秋晗

读周刊看视频（《财新周刊》2021年第09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金融体系资产及投融资活动的低碳化重塑，挑战政策制定者、监管部门和市场参与者——
@《财新周刊》《驯服“绿天鹅”》，相关视频：[碳中和目标下的能源转型路线](#)

1型糖尿病病童除面对疾病本身，还遭受着他人的歧视和排斥——@《财新周刊》《苦涩的“糖”——糖尿病孩子生存实录》，相关视频：[认识糖尿病](#)

电子烟是个怎样的行业，令市场对其未来给出近乎疯狂的估值？——@《财新周刊》《[悦刻能火多久](#)》，相关视频：[电子烟和真烟相比危害几何？](#)

3月1日，奥孔乔-伊韦阿拉就任WTO总干事，任期至2025年8月31日——@《财新周刊》
《[奥孔乔-伊韦阿拉上任](#)》，相关视频：[非洲需要明智且负责任的投资](#)

版面编辑：吴秋晗

财新视听内容精选（《财新周刊》2021年第09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财新时间】女性创新与领导力](#)

打破常规和局限，女性领导者有哪些独特优势？如何脱颖而出？数字新浪潮袭来，女性应该怎样运用科技杠杆来提升社会领导力？

[【音频】财新Morning Call](#)

[纽交所启动中海油摘牌程序/吉利沃尔沃达成合并方案](#)

[【音频】重点来了](#)

[结婚少离婚多，不结婚的人在想什么](#)

版面编辑：吴秋晗

答疑（《财新周刊》2021年第09期）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联系编辑部：邮箱 newsroom@caixin.com 或电话（010）8590 5000

深圳读者 白石：

各地近期相继推出“集中发布出让公告、集中组织出让活动”的土地市场“两集中”改革措施，这将带来哪些影响？

本刊产业新闻部：

土地市场“两集中”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可以营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更多房企有地可拿。

土地市场“两集中”改革后，头部房企难以“垄断”全部优质地块，但也可能加剧同一城市内热点地块的竞争。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房企集中涌向优质资产。

集中供地对房企的资金链造成较大压力，促使其加大力度促销回款。降负债压力较大的房企或将减少拿地数量。

尽管“两集中”改革的初衷之一是营造更加公平的拿地环境，但“强者恒强”的规律不易撼动。此前，头部房企会在参拍前“互相打招呼”以避免竞争激烈致使价格过高。“两集中”后，房企难以一次性参拍多块土地，头部房企之间可能更倾向于互相“打招呼”，优质地块可能集中在头部房企间流通，中小房企难以抢到优质地块。

开发商同时集中拿地，意味着日后会有更多项目在同一时间推向市场，如果拿不到优质地块，后期项目销售将不具备优势，中小房企或面临更大的销售压力。

整体而言，土地“两集中”改革措施有利于督促房企谨慎理性拿地，且对房价管控也有一定促进作用。“两集中”后，每批土地集中放量，房企可根据自身发展需求选择拿地时间和区位，而非抢地，有利于土地市场健康发展。□

版面编辑：吴秋晗

“冬奥有她”：Visa助力京津冀女性小微企业成长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冬日的寒气还没散去，但对来自北京延庆的郭春平女士来说，她参加的一场关注女性小微企业赋能课程却让她如沐春风，感受到春天的喜悦和希望。

郭春平作为学员参加了由Visa携手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与北京体育大学共同举办的“冬奥有她”第一期女性小微企业赋能课程。“冬奥有她”项目是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量身打造的公益项目，由Visa联合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北京体育大学于2019年12月共同发起。项目覆盖京津冀地区的体育、旅游和文化产业，通过多元化的赋能机制，旨在帮助女性小微企业提升其对接奥运机遇的内在能力和外部资源，为女性小微企业家的成长提供更广阔的平台，为奥运主办城市的包容与可持续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据悉，为更贴合实际地了解京津冀地区女性小微企业的需求，“冬奥有她”项目早在启动之前就发起了“女性小微企业基线调查报告”，至今已有近700位文旅小微企业参与调研。通过调研，项目组基于调研及真实需求，有针对性地开发出围绕能力建设的教学内容，通过有效实用的赋能培训，帮助女性小微企业主解决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赋能课程的重点既囊括了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的短板领域，如网络营销、财税管理、金融能力、人力资源管理，还结合文旅行业的特点与当前形势，组织了学界和业界导师，创造性地推出了后疫情时代文旅产业形势分析、文旅企业对接冬奥机遇、文创产品开发、民宿经营管理、商务谈判沟通等模块，颇受学员们的好评。

据延庆区妇联主席贾春媚介绍，目前，延庆区的很多民宿、餐饮及传统手工艺等文旅体企业都非常有特色和底蕴，2022北京冬奥也将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但也存在一些运营及创新方面的挑战。通过“冬奥有她”项目提供的课程培训，学员可以深入了解到自身企业的不足和欠缺，最重要的是通过培训获得能力，找到提升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冬奥有她”项目为张家口的女性小微企业提供的实用课程和培训为企业普及并传递了诸多实用知识和数字化管理工具，大大提升了女性小微自身及企业的能力和素质，提前为与冬奥机会正面相遇做好准备。”张家口市妇联副主席路剑英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据了解，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了两期培训课程，在为后续的课程积极筹备中。作为为期三年的公益项目，“冬奥有她”计划于2022年底覆盖5000家女性小微企业，为奥运主办城市和地区在后奥运时期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作为项目的发起方代表，Visa大中华区总裁于雪莉总结道：“作为超过30年的奥运会与残奥会全球赞助商，Visa很荣幸能参与到这项有意义的事业中，支持与伴随女性小微企业的共同成长，为冬奥主办城市的包容与可持续发展贡献价值。我们也期待通过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携手努力，共同探索并总结出借助大型赛事赋能小微企业发展的有效路径，将这一中国经验在国际上推广开来。我们相信包容性经济可以使每个人在任何地方都得到提升。”



Visa大中华区总裁于雪莉致辞

事实上，不管是助力女性成长还是小微企业发展，这与Visa一直以来的旨趣高度契合。Visa作为全球排名前列的支付技术公司，成立60余年以来，始终坚守企业的使命，即通过创新、可靠和安全的数字支付网络连接世界，助力个人、企业和经济的蓬勃发展。

除了通过普及数字支付帮助个人、企业与经济实现具体可衡量的收益外，Visa还投入大量资源，在全球释放积极的社会影响力。在中国，截止到2020年9月底，通过支持并参与中国人民银行“金惠工程”、中国扶贫基金会四川产业扶贫等项目，Visa提前实现惠及一千万农村居民的目标。Visa通过与国内政府及行业伙伴长期而紧密的合作，有力地支持了脱贫攻坚，推动了包容性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刊发在财新市场企划版块，不代表《财新周刊》编辑部观点

THE LINE：让能源100%可再生的社区成为现实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2020年尾声之际，中国将环境可持续发展纳入到其全球领导力范畴之内，习近平主席向全世界树立大国榜样，承诺中国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沙特阿拉伯，科学家、城市规划者和环境专家们也在为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可再生能源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在沙特阿拉伯西北部的NEOM地区，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者汇聚一堂，共建THE LINE城市。这是一条长达170公里、超级互通的带状未来社区群，该项目的建设旨在优先实践可持续发展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重塑现代生活理念。

THE LINE在重新定义可持续发展，该项目旨在开发由100%清洁能源驱动的碳积极城市，致力于为未来的居民提供无污染且更健康的可持续环境。



THE LINE将充分利用附近的海岸线和充足的阳光，高性价比的可再生电能在这里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全球仅少数国家拥有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资源，而沙特阿拉伯就是其中之一，具有不可小觑的低成本太阳能和风能潜力。THE LINE愿景的核心要义是自然，仅需步行5分钟，居民即可轻松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同时以不破坏该地区自然环境和美景的方式发电。

THE LINE附近的风力发电站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以提供充足的电力，满足工业和居民的用电需求。即使拥有了丰富的可再生利用资源，THE LINE正在解决着在其他地区未能解决的问题，如风力或太阳能不足、剩余电力的储能效率较低等问题，这些问题阻碍着可再生能源成为100%可靠能源。

NEOM能源部门负责人Peter Terium指出，THE LINE专为应对这些挑战而生。这些社区的微电网将通过THE LINE内部名为SPINE的底层基础设施相连。Terium介绍：“当一片电网供过于求，而另一片电网供不应求时，通过SPINE，一切都能实现互通。”该系统将实现本地发电及供电，并与先进的互联互通电力网络连接，使能源分配得到优化。

THE LINE作为一处完全新建立的社区群，以清洁能源为核心，从零到一建设基础设施，而不是基于旧的能源生产和供给模式，对传统基础设施进行改造。通过这种方式，NEOM正成为新技术和全面系统的试点，为中国等国家实现其宏伟的气候目标提供参考。

THE LINE将成为开发实施尖端清洁能源发电、生产研究、创新的枢纽。它将证明，只要采用正确的手段，清洁能源就可以独立运转。Terium称这种观念是“开创性的”，并认为它有可能颠覆“我们看待未来城市化的方式”。

NEOM咨询委员会成员Ganesh Kishore博士表示：“随着NEOM成为创新中心，全球性企业和新玩家可以在这里对创新技术进行研究、孵化及产业化，加速着人类进步。我们将能看到沙特阿拉伯经济的多元化和整个红海地区从中获益。”

只有全球化的解决方案才能解决温室气体和气温上升的问题，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等全球各国为解决这一问题作出了宏伟承诺。中国和其他国家正计划对本国经济体进行前所未有的调整，努力实现碳中和，在此之际，沙特阿拉伯和NEOM力求加快进程，开创能够推广至其他地区、以可持续能源为支撑的生产和生活模式。□

*本文刊发在财新市场企划版块，不代表《财新周刊》编辑部观点

正谷，碳中和目标下的有机农业践行者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有机农业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产业形态，其社会、环境、哲学价值被进一步挖掘，并得到了愈来愈多的重视。有机农业的四原则“健康（Health）”、“生态（Ecology）”、“公平（Fairness）”、“关爱（Care）”，充分诠释了其在各个价值维度所能发挥的作用：有机农业，始终将人类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发展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生物的营养和健康来自特定的生态环境，个体、群体的健康与生态系统的健康密切相关。

正谷的有机商业实践

正谷成立于2007年。企业创立之初，中国的有机产业尚处于起步阶段，机遇与挑战并存。随着商业实践的不断推进，正谷将业务定位与市场环境结合，以有机食品卡的形式，为企业客户提供礼品解决方案，呈上自然美味，表达美好情感。

探寻世界范围内优势产区，在全球范围10多个国家的30多个优势产区，建立正谷标准农场，提供从田间到餐桌的优质有机食材。对产地选择、种植生产过程、质量控制、产品追溯等环节严格管理，以正谷卡分享优质的食物：丹麦有机奶酪、希腊有机特级初榨橄榄油、瑞士海盐黑巧克力、有机奶酪年糕、有机牛肉月饼.....

正谷瑞士海盐黑巧克力，以生长于亚马逊河秘鲁支流流域的特立尼达可可豆为原料。经碳中和认证的正谷瑞士海盐黑巧克力，对生产过程的每个环节所产生的碳排放进行追溯，并计算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采用改变耗能、植树造林等方式抵消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

可持续咖啡生产与消费，能够帮助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消除贫穷、清洁水源、推动负责任的消费与生产.....正谷有机咖啡致力于帮助庄园咖啡农提高咖啡品质的同时，推进长期可持续的咖啡种植，提高社会、经济和环境保护的标准。

正谷全球有机价值链的建设，除了有利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相互学习，提升有机农业生产技术，跟进国内外的行业情况和动向，同时还有利于人们从其他国家的文化、道德、社会意识等多个角度，全面地看待人与自然，人与食物的关系，关注地球环境的平衡发展。

正谷目前拥有2万多个企业客户，配送服务于120多万个家庭。通过正谷卡的分享与传递，持续与更多的企业机构交流有机农业“健康、生态、公平、关爱”的内涵，并在交流中达成更多的共识，共同关注食物健康、重视环境保护。

心有愿景，素履以往

作为IFOAM国际有机联盟（IFOAM - OI）全球合作伙伴，正谷在商业实践的过程中，也不断加强有机信息的共享与交流，助力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有机的发展。自2012年起，正谷连续十年翻译《世界有机农业概况和趋势预测》，这本被视为国际有机行业的白皮书，为期望了解有机行业发展的国内人士提供了解途径。此外，每年组织有机行业从业者，进行有机论坛交流，探讨有机农业相关生产技术，生产管理组织模式，对客户端的价值创造与分享等。

正谷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世界自然基金会（WWF）、IFOAM国际有机联盟（IFOAM - OI）、瑞士有机农业研究所（FiBL）、国家认监委等组织机构持续深入合作，共同推广可持续理念，推动国内有机行业发展。

2020年2月，结合多年有机商业实践经验，由正谷有机农业技术中心组织编写的《有机农业在中国（2020）》英文版在2月13日由IFOAM所主办的GLobal Organic Market Overview论坛首发，与更多国际同行及来自世界热爱有机的读者们介绍、分享中国有机农业的发展经历、中国的有机标准与法规、有机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机遇及预测等，尤其期望未来能够推动国际与中国有机标准互相认可。

正谷的商业模式离不开正谷卡背后的价值经营：健康、生态、公平、关爱.....为客户提供高价值的产品与服务是正谷的商业使命，以“有机礼品”分享关爱，而关爱所涉及的人与人、人

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内涵，逐渐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有机事业的发展未来可期。□



Organics:
Better
Food
Better
Future

*本文刊发在财新市场企划版块，不代表《财新周刊》编辑部观点

双核驱动创新，广汽集团如何践行内外循环？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十三五以来，我国汽车产业尤其是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迅猛，正逐步从汽车产业大国迈向汽车产业强国。在碳中和的宏伟目标下，新能源汽车当仁不让地成为上佳的践行领域，全球政策、资本和产业正深度聚焦智能电动汽车，各国都力求在新赛道取得领先。在全球汽车产业大变革的背景下，创新发展将成为智能电动企业的取胜之匙，作为国内汽车产业重要的组成部分，以广汽集团为代表的国有汽车企业领军梯队正逐步浮现。

顺势而为，紧跟时代跨越成长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产业也迈入新阶段，智能电动汽车百花齐放。在新四化的推动下，汽车产业不仅是经济支柱，也是国家之间竞争的核心产业，加快发展智能电动汽车，既是推动汽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紧迫任务，也是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举措。过去五年，我国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取得了飞速发展，产业溢出效应明显，带动了投资、就业和税收的增长，根据中汽中心发布的数据，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累计投资超过2万亿元。

工信部等相关部委制定了面向2035年的智能电动汽车发展规划，给产业和社会各界带来长期、明晰的发展预期，在今年两会上，智能电动汽车的可持续发展再次成为人大代表们的焦点。广汽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曾庆洪提出：要加快推进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在基础设施建设、法律法规、研发测试、技术推进、道路建设等方面都需要做相应的协调和匹配，推动实现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的规划目标。



曾庆洪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十三五”期间，广汽集团在智能电动汽车领域取得了长足发展，坚持“一个中心，两个不动摇，三个转变”发展主线，全面实施“1513”总体发展战略，在“十三五”收官之际，多项目标均提前完成，广汽集团累计产销量超过990万辆，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77万亿元，工业产值1.42万亿元，利税总额2758亿元；市场占有率约8.8%，相较“十二五”期末提升3.5个百分点。汇总营业收入每五年翻一番，利税目标提前2年完成，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深化改革，心之所向使命必达

“十三五”的成功源于广汽集团深化改革。按照发展规律，企业改革是产业变革的动力源，只有规模化的龙头企业才能快速推动产业重塑，在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的影响下，国有汽车巨头

稳步前行，是汽车产业的压舱石。作为自主头部企业，广汽集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推动了广汽集团疫情防控和生产经营平稳发展。

面对市场变化，广汽集团调整产品结构，加强产品创新，密集推出多款全新和改款车型，推进营销节奏，加快数字化转型，开展“云看车”、“云发布”以及“老总带货”等活动，为广汽集团完成2020和十三五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面对技术升级，广汽研究院开发了数字化远程办公系统，支持3700人同时在线办公，突破性地支持远程数模设计、仿真计算，将疫情对研发任务的影响降到最低；而面对数字化潮流，广汽集团以改革促创新，以创新谋发展，优化组织机构、创新合作模式，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以营销赋能为核心，实现五大项目群齐头并进，启动了大数据平台建设等项目。在企业服务方面，也同步提升了企业运营效率。



广汽智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园效果图

改革和创新推动广汽集团在“十三五”收官之际取得了丰厚的成果。2020年，中国汽车产销同比下滑约2%，但广汽集团实现汽车产销均超200万辆，与去年基本持平，其中产量更是逆势增长0.5%，行业排名也进入前四，向市场交出亮眼答卷。此外，集团也完成了GPMA架构平台设计，发布全新一代动力总成平台品牌“钜浪动力”，动力电池电芯、电子电器EEA 3.0、集成电驱IDU等关键技术也取得了重大进展，部分技术已实现量产，ADiGO3.0智驾互联生态系统升级，数字座舱项目实现初版功能。

双轮驱动，创新发展铸就实力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和产业节点的节点上，大开放、深融合已经成为时代主旋律，坚持内外循环，走开放道路，谋共赢发展，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有力回答，这也是中国汽车工业应对行业百年变革的真实写照。广汽集团在时代的主旋律下，“十四五”期间将坚持自主创新和合资合作“双核”驱动发展战略，把技术创新作为推动企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不仅取得了合作伙伴的积极响应，也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标准和品牌。

在合资合作领域，广汽集团充分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深层次开展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探索合作新模式，坚持“两优两专”的发展策略。“两优”是持续推进与本田、丰田公司的合作广度与深度，做大做优广汽本田、广汽丰田，力图打造标杆合资企业；“两专”是充分发挥JEEP、三菱世界级专业SUV的技术优势和品牌影响力，将广汽菲克、广汽三菱打造成为国内汽车市场有鲜明特色的专业品牌。

在自主创新方面，打造“双子星”计划，传祺和埃安作为广汽自主整车两大品牌，在力求做到资源协同的同时，又保持各自的品牌特性。传祺作为燃油汽车品牌，继续保持产品优势，为用户提供高质量服务。埃安作为高端智能电动车品牌，坚持科技创新，以一系列行业优势的创新成果以及特色的营销服务模式，打造世界级的产品和服务，赢得市场认可。

自主可控是智能电动汽车产业的核心环节，要强化自主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引导创新要素向优势企业集聚，形成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广汽集团的自主布局和国家创新发展的大战略相辅相成，通过企业资本投入、专项建设等多种方式加大创新力度，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既符合碳中和的发展趋势，也走在科技潮流前端。

战略落地，利好兑现未来可期

在以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为特征的技术革命推动下，以共享化、服务化、平台化为特征的模式创新作用下，在以品质化、个性化、差异化为消费者升级牵引下，广汽集团以超预期的速度理解行业巨变，全面迈向“十四五”，为中国车企的发展提供路线参考，用“国家队”效率推动智能电动汽车行业发展。



实施“1615”战略，打造创新引领、持续为顾客移动生活创造价值的科技广汽

“十四五”期间，广汽集团将全面实施“1615”战略，即力争到“十四五”期末，实现年产销量350万辆，年复合增长率超10%，全集团汇总营业收入超6000亿元，利税总额超660亿元；夯实6大板块，做强做实研发、整车、零部件、商贸服务、金融服务和出行服务六大板块；突出1个重点，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集团高质量发展；实现5大提升：全面实现电气化、智能化、数字化、共享化、国际化五大方面的提升，打造创新引领、持续为顾客移动生活创造价值的科技广汽。

围绕“移动生活价值创造者”品牌定位，广汽集团将以强大的自主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打造高品质的产品和优致的服务体验，满足消费者的美好生活需求，实现从品牌到品味的转变。到2035年，广汽的愿景是成为汽车产销超500万辆、全集团汇总营业收入超一万亿元的世界知名企业。广汽集团也正在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本文刊发在财新市场企划版块，不代表《财新周刊》编辑部观点

财新周刊 | 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大调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32年来首次大调，体现出从对单一物种的保护转向对整个食物链、整个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财新周刊》](#) 文财新记者 康佳

自1989年实施以来，“千呼万唤”声中，《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下称《名录》）迎来了32年来首次大调。2月5日，调整后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下称新《名录》）正式发布。

新《名录》共列入野生动物980种和8类，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34种和1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46种和7类。原《名录》中的476种物种全部予以保留，其中豺、长江江豚等65种由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升为国家一级；熊猴、北山羊和蟒蛇因种群稳定、分布较广，由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调整为国家二级。

新《名录》明确了不同物种的管理部门。上述物种中，686种被定义为陆生野生动物，由林业部门管理；294种和8类为水生野生动物，由农业农村部渔业部门管理。其中，虎纹蛙（俗称“田鸡”）等涉及人工养殖的两栖爬行动物，均纳入水生野生动物的范畴管理。因背后牵涉巨大产业利益，人工繁育亦是新《名录》关注的重点。早在2017年，原国家林业局和农业部相继发布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的陆生和水生野生动物名录，将30余种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纳入其中。在此基础上，新《名录》进一步明确，大鲵、虎纹蛙、松江鲈、胭脂鱼、锦绣龙虾、乌龟、花龟、平胸龟、黄喉拟水龟等63种野生动物，保护范围“仅限野外种群”。

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教授向财新记者介绍，《名录》是野生动物保护的基础性制度，直接关系到野生动物的保护范围、执法力度，也影响后续的保护方式变化、资源投入等多个方面，“牵一发而动全身”。新《名录》出台后，在获得肯定的同时，也伴随有争论和对于后续工作的期望。

32年来首次大调

国家重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一直由林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共同牵头管理。1989年1月14日，原林业部、农业部首次发布了《名录》，明确了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范围，将476种野生动物纳入其中，分为国家一级、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管理。

《名录》发布30多年时间里，一直没有进行系统性更新，只有两次“微调”：2003年，将麝类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调整为国家一级；2020年，因穿山甲种处境危急，保护级别从二级升为一级。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有多名专家学者呼吁更新《名录》。中科院动物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原常务副主任蒋志刚记得，1998年前后他就参加过《名录》调整的相关研讨工作，2000年后又参加过多次研讨，但《名录》的修订工作还是长期陷入停滞。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法律团队负责人刘金梅也告诉财新记者，近十年来，有多名专家、学者和代表委员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提案、议案，希望能够尽快调整《名录》。

30多年时过境迁，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和处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蒋志刚介绍，上世纪80年代，中国对本土动植物的种类、数量、分布情况等了解肤浅，所以《名录》比较粗放。动物学基础在30多年间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以灵长类动物为例，当时认为全球有170余种灵长类动物，目前已经有500余种。

得益于技术和研究方式、研究能力的进步，近年来，国内对野生动物和濒危物种的研究也更加深入。蒋志刚对财新记者说：“我们进行了多次大规模考察，包括多次对无人区的调研，研究范畴也不断扩张。”与此同时，随着经济高速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变化巨大，生境破碎化成为很多野生动物面临的共同难题。《名录》的更新迫在眉睫。

2017年1月1日，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正式实施，当时的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加速了《名录》的调整和修订。2019年1月，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组织相关专家学者进行科学论证研究，形成了《名录》的修订稿。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野生动植物保护研究所所长杨道德教授向财新记者介绍，2019年他曾作为林业部门邀请的专家，在四川都江堰参与过新《名录》的初步讨论。除学者外，还有管理部门、养殖业代表、行业人士等参与讨论。

随后，相关部门又分别征求了31个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意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及行业界等专家学者的意见，最终形成《[名录](#)》征求意见稿。2020年6月，新《名录》征求意见稿公布，众多民间机构和学者提交相关意见。2021年2月5日，新《名录》终向公众发布。

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所长、生态与自然保护学院教授时坤在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名录》涵盖因保护而濒危程度得以缓解的物种、部分濒危程度加剧的物种、新的珍贵濒危物种，也使上述受威胁程度不同的物种得到适宜的保护位置。此外，新名录列入了很多捕食性濒危物种，并规范了其可利用程度。

据有关部门介绍，《名录》的调整依据濒危性、珍贵性、相似性、预防性、兼容性和关注度等六个原则。其中，对平胸龟科、陆龟科、鼈科、金线鲃属等分类单元中的部分物种，虽不完全满足列入《名录》予以保护的科学标准，但考虑到在执法监管过程中，其与列入名录的同科或同属物种无法进行有效区分，根据相似性原则将其列入保护范围。

而马来穿山甲、印度穿山甲等尚无确切证据证明在中国有自然分布的热点敏感濒危物种，以及野马、麋鹿和高鼻羚羊等在中国历史上有野外自然分布记录的物种，则根据预防性原则，一并列入保护范围。

对虽尚不完全满足列入的科学标准，但由于开发利用强度持续增大或栖息地减少等原因已引起广泛社会关注的物种，根据关注度原则，本次调整中也积极考虑列入；反之，对虽符合列入的科学标准，但社会关注度极低、一旦列入反而可能加剧非法猎捕和贸易风险的物种，则不考虑列入。

蒋志刚认为，新《名录》背后体现出30年间针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理念发生了重要变化。以东北虎为例，要保护东北虎，还要保护当地的孢子、梅花鹿和野猪等东北虎食物链上的物种，“不然它就没有生存基础”。

“以前我们想到动物保护，就是别猎杀，别让它灭绝。”他介绍，现在的保护边界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名录》体现出从对单一物种的保护转向对整个食物链、整个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小型兽类、鸟类得到重视

“总的来说，《名录》的更新是很重要的进步，这是毋庸置疑的。”公益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保护主任赵翔的观点与蒋志刚类似，他认为此次调整最大的进步，是评估野生动物的视角从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转变为一个完整、健康的生态系统的需求。

比如，众所周知的狼、豺，曾因和人类生产生活的广泛冲突而被列为“害兽”，但如今食肉动物在生态系统中的价值越来越受关注。除纳入狼等大型食肉动物外，豹猫、藏狐、沙狐、貉、赤狐和椰子狸等也都被纳入新《名录》。猫科、犬科以及灵猫科和林狸科保护都获得了极大进步，其中在中国可能有分布的13种猫科野生动物都在保护之列，7种位列一级保护动物，6种列入二级保护。

除了对食肉动物的重视，体型较小的雀形目和伊犁鼠兔、贺兰山鼠兔也被纳入新《名录》，这被赵翔认为是“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就。这两类小型动物往往因缺乏研究或“颜值不够”易被忽略，鼠兔过去更是一一直被当作草原鼠害的元凶，曾被有组织的投毒消灭。而小兽和雀形目在保护名录中所占的比重，正是评价一个国家的动物保护名录是否科学、全面的衡量指标。

新《名录》也彰显出“明星物种”的保护效应。赵翔介绍，近年来被民间机构和民众所关注的江豚、豺、豹猫、藏狐等多个物种在新名录中都得到了升级或增补，与之相应，受关注较少

的两栖爬行动物则处于相对劣势地位。“所以营造一个民间组织和社会大众都能够参与的良好氛围，对野生动物保护非常重要。”

北京师范大学动物学教授、中国动物学会副理事长张正旺是鸟类研究专家，曾多次参与过《名录》相关论证。他向财新记者分析，旧版《名录》更关注体型较大的鸟类保护，猛禽、鹤科等均在被保护范围，但忽视了体型较小的雀形目等物种。根据具体物种的生存状况，新《名录》将雀形目增加到了89种，数量占比很高，弥补了此前的缺憾。

新《名录》继续加强对猛禽的保护。据林业、农业两部门的征求意见稿解释，因猛禽类处在食物链顶端，起到调控较低食物链物种种群的作用，对维系生态系统功能十分重要，国际上猛禽的贸易行为屡见不鲜，因此将猛禽所有种（鹰形目55种、隼形目12种和鸮形目32种）列入保护名录，其中重要物种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此前花鸟市场上被追捧的一些明星“笼养鸟”，包括云雀、百灵鸟、绣眼鸟、红后歌鸲等，也成为新《名录》关注的重点。张正旺说，它们的数量具有一定规模、分布区域相对较广，但由于宠物市场的火热，带动了背后的乱捕乱猎，非法买卖严重，“让它们面临捕捉的压力很大”。因此，从预防性的原则考虑，将之纳入了新《名录》。

相比升级，新《名录》对于保护物种的降级十分慎重。褐马鸡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生存状况得到明显改善，数量翻番。但考虑到降级后保护力度减弱，有可能让种群再次面临威胁，因此仍保留在一级。朱鹮的数量从1981年的7只到现在已经增长至5000余只，但同样保留为一级保护动物。“这是非常稳妥的一种做法。先稳定一段时间，如果它的状况能持续得到改善，再下调保护等级。”张正旺说。基于同样的原因，新《名录》中，仅熊猴、北山羊、蟒蛇3种野生动物因种群稳定、分布较广，由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调整为国家二级。

但张正旺也强调，被列入《名录》中的鸟类仍有大批处境危险。比如，绿孔雀被纳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30多年间，种群数量从超千只下降到如今不足500只。他说，被列入《名录》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之后的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

两栖爬行动物有待改善

与鸟类、兽类相比，新《名录》中两栖爬行类动物及部分水生鱼类的数量对比过去也有所增加，但占比相对较少。对于个别物种是否应该列入，存在不小争论。

中国动物学会常务理事和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委员、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史海涛对财新记者表示，作为一线研究人员，新《名录》仍有很大改进空间。他以自己研究30余年的爬行纲龟鳖类为例介绍，由于长期过度猎捕及栖息环境的破坏，国内龟鳖类每个物种的野外种群都在快速下降，包括中国曾经分布最广、野生种群最多的中华鳖和乌龟，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为“易危”和“濒危”等级。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多名科研人员2020年在国际知名期刊[《科学》上发表文章称](#)，中国野生龟类多样性非常丰富，世界排名第三，共有34种龟类，包括3种陆龟、5种海龟和26种淡水龟。根据《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评估结果，除3种缺乏数据外，其他龟类全部是“濒危”或“极度濒危”等级。文章称，近30年来，大部分龟类的野外种群下降超过90%，“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中国野生龟类将在不久的将来走向灭绝的境地”。

此次《名录》征求意见稿发布后，史海涛曾向两部门提出，因为生态位、生态功能等不同，人工养殖无法替代野生种群，因此建议将目前中国有记录的所有龟鳖类有效物种全部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名录，包括乌龟、黄喉拟水龟、中华花龟、海南四眼斑水龟、中华鳖、沙鳖、小鳖、东北鳖等8种龟鳖类。但在新《名录》中，上述8种龟鳖仅增列入了前三种。

“在全世界的濒危物种中，龟鳖类是最濒危的类群，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史海涛称，尤其在鳖科，中华鳖、沙鳖、小鳖、东北鳖野外种群状况很不乐观，但无一入选《名录》。因保护资源投入十分有限，目前甚至连上述几种鳖科的基本数据也没有掌握。

此外，出现在《名录》征求意见稿中的多种两栖爬行动物在最终公布的新《名录》中消失。财新记者梳理发现，在征求意见稿中，游蛇科被列入了20个物种，最终仅保留9种，乌梢蛇、黑线乌梢蛇、舟山眼镜蛇、孟加拉眼镜蛇等此次均无缘新《名录》。

杨道德解释，乌梢蛇因人工猎捕和非法买卖的情况较为严重，最初被列入到《名录》征求意见稿中。但后来在屡次研讨、论证中发现，乌梢蛇在中国分布范围较广、数量相对较多，背后涉及多个地区的养殖产业，医药领域有经营利用的需求，民众有猎捕传统，多种因素综合衡量之后，最终将之移出《名录》。

“新《名录》中的物种不只是根据种群数量和濒危情况来定，还需要考虑科研人员、管理部门、经营利用部门、民众等多重意见，是各种因素平衡的结果。”杨道德说，与其他物种相比，两栖爬行动物面临着利用程度高、执法难度高、猎捕难度低、受关注程度低等问题。因此，银环蛇、金环蛇、孟加拉眼镜蛇等被IUCN评为“濒危”等级，但均未能进入新《名录》。

时坤表示，由于受到资金、技术人员和水下监测仪器的限制，目前水生鱼类和两栖爬行动物的科研工作开展受限，对它们的资源量及受威胁程度调查数据不足，缺乏足量的本底数据进行评估和预测。后期随着技术的提升和发展，可以逐步补足相关数据，做到“全面规划、积极保护、科学管理、永续利用”，从而更合理、准确地实现保护。

“仅限野外种群”引发争议

与1989年开始实施的《名录》相比，新《名录》中有63种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标注保护范围“仅限野外种群”，以与人工繁育种群区分。财新记者梳理发现，其中貉、梅花鹿、马鹿、塔里木马鹿四种陆生野生动物归林业部门管理，剩余59种物种被划为水生野生动物，包含两栖类、爬行类、软体动物和鱼类，归农业渔政部门管理。其中，多种涉及较大规模养殖、利用程度较高的两栖爬行动物，如虎纹蛙等，被从林业部门划到渔政部门管理。杨道德解释，这意味着有关部门之后将进一步对野生动物的人工驯养繁殖和野外种群进行分类管理。

2017年6月，原国家林业局公布《[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第一批）](#)》，共9种，包括梅花鹿、马鹿、虎纹蛙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鸵鸟等境外引进、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管理的6个物种。随后，农业部分别在2017年11月、2019年7月公布了[第一批](#)和[第二批《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共24种，包括三线闭壳龟、大鲵（娃娃鱼）、胭脂鱼、山瑞鳖、松江鲈、黄喉拟水龟等。

史海涛认为，63种野生动物被标注保护范围“仅限野外种群”，意味着两部门出台的人工繁育名录中的物种会在现有基础上大范围增加。但他认为这63种的涵盖范围值得探讨。比如，目前国内养殖的平胸龟几乎均需要从野外种群补充种源以改良品质，“被大肆捕捉了几十年，对野生种群已经伤害极大，还是没办法完全成功养殖”。

2019年5月，农业农村部公布的《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第二批）》征求意见稿中，就包含平胸龟等19个物种。但当年9月公布的最终结果中，平胸龟未被列入，这让不少关心平胸龟保护的人松了一口气。“当时就提出过建议，针对平胸龟也已经做过充分论证，结论就是它的养殖技术尚不成熟，这很明确。但不知道为何这次又被列进了‘仅限野外种群’。”史海涛说。

业内人士认为，野生动物被标注“仅限野外种群”保护后带来的必然隐患是，持有驯养繁殖证照的机构可能对非法盗猎、非法收购的野外个体进行“洗白”。实际上，靠证“洗白”的案件屡见不鲜。令人震惊的2019年大连斑海豹盗猎案中，持证单位秦皇岛市鸽子窝公园就被查出，其报备的6只新生斑海豹幼崽在亲子鉴定后确认有4只是非法来源。

如何做好区分、鉴别，成为分类管理的关键所在。史海涛说，对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尚可以通过标识、谱系和遗传信息等进行鉴定，但在两栖爬行动物中，人工驯养繁殖的数量多，鉴定成本高、鉴定难度大，在执法过程中几乎不可操作，“在实践中，这一条根本没办法落地”。在他看来，对平胸龟的保护“仅限野外种群”，在目前的执法管理环境下可能将这一物种置于危险处境。

但杨朝霞解释，从上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野生动物背后牵涉庞大的养殖户群体的利益，一些偏远、欠发达地区的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可能直接关系到民生问题。根据东北林业大学马建章院士主持编写的《中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报告》，2016年全国野生动物养殖产业的直接从业者有1408.98万人，创造产值5206.16亿元。因此，建立合理、合法的驯养繁殖许可制度尤为重要。

“自然之友”曾在国内多地走访、调研人工驯养繁殖行业，刘金梅得出的结论是，目前的驯养繁殖许可制度仍显笼统粗放，而一些国家会要求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每一代、每一只都有单独的许可证。“我们很多时候只规定允许对某些种类进行驯养，并不规定具体的养殖数量，也不会按规定进行年检。”她认为，当上游无法做到精细化管理时，无异于把所有的困难都加在执法端，“允许人工驯养繁殖的大前提是许可制度的精细化管理”。

时坤也认同，现有家畜检测机制针对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检验检疫标准还有待完善。他建议，未来将野生动物特种养殖产业逐步发展为家畜家禽产业，建立双重白名单制度并公示，接受公众监督。可通过严格论证和法定程序，将符合科学标准的用于食用的人工繁育野生动物列入特种养殖动物名录，作为法律规定的例外情况；同时也建立特种养殖动物经营者白名单，只有经过科学认定、严格管理和公众监督的经营者才能进入合法经营名单。

他表示，逐步将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另立新分类，以便社会公众准确理解，有助于野生动物保护更名正言顺，也使执法人员更便于认定和进行相应执法。但达成这些的同时离不开科研专业人员对物种的甄别鉴定，在选取育种方面需要建立更详尽的标准。

专家建议成立科学委员会

新《名录》中物种数量的大幅增加，肯定会增大基层执法人员的工作压力。赵翔说，物种划分得十分细致，让基层执法人员去掌握988种（类）物种，有些过于苛刻，在此情况下，“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和理念，让越来越多的公众和民间组织参与到保护中来，尤为重要”。

近年来，尤其是新冠疫情后，针对陆生野生动物的保护氛围积极向好，保护大于利用的观念也逐步被接受。相较之下，人们对水生野生动物的心态仍是以利用为主。赵翔认为，鉴于目前众多的水生野生动物“命悬一线”，水生野生动物的主管部门应改变“重利用、轻保护”的理念，并且在社会上积极营造保护水生野生动物的氛围。

时坤也表示，过去多年来保护工作存在多种问题：陆生与水生野生动物及“三有”保护名录存在不同名录交叉、范围划定不清、制定部门不统一等问题；林业部门和渔业部门存在职责划分不明问题，渔业部门本身偏重于渔业发展和资源利用等；二者在执法层面也都存在执法机构不完善、执法人员少、执法能力弱的问题。这些问题亟待解决，需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努力提高野生动物执法规范化水平。

此外，时坤强调，陆生、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应各有侧重点。陆生野生动物面临的是栖息地面积减少和破坏，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面临的是水质污染问题，后者更难治理，耗费时间更长，且水域相连，不是单单治理一片区域就能解决问题。他认为，“陆生野生动物侧重于单一群体的保护，而水生野生动物往往是栖息地水质环境的保护大于对某单一物种的保护，依照目前的现状来看，陆生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明显好于水生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保护所带来的人兽冲突，是另一个亟待关注的问题，如《财新周刊》2020年10月19日发布的封面报道《[西双版纳人象之争](#)》。杨朝霞说，随着保护加强，人兽冲突已在多地显现。全国野生动物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基本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但野生动物致害补偿资金的大部分需由地方财政来承担，这无疑加重了地方保护野生动物的负担。目前，全国已有云南、陕西、吉林、北京、西藏、甘肃、青海、安徽等八省份建立了地方性的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制度。

在今年2月27日国家林草局局长关志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内容中，亦包含对人兽冲突的关注。他表示，对商洛野猪泛滥、青海棕熊伤人、云南亚洲象致人伤残及财产损失等重点案例，林草局和发改委进行了专题调研，提出了科学开展种群猎捕调控、事先主动预防、事后充分补偿、研究生态移民及转产激励机制等工作思路。财政部加大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补偿的支持力度，地方按规定统筹中央财政资金对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的损害给予适当补偿。

2017年1月1日起施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中第十条规定，《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组织科学评估后制定，并每五年根据评估情况确定对名录进行调整。但此前《名录》的更新足足等了32年，这让多位受访专家对能否在五年后如期调整充满疑虑。

《名录》调整滞后的一大直接后果是应该保护的动物未及时得到保护。比如，此次被调整为一级保护动物的黄胸鹀，此前因食用带来的滥捕滥猎，导致它在短短13年间从“无危”等级变成“极危”，其中从“濒危”到“极危”仅用了4年，距“野外灭绝”仅一步之遥。史海涛很担心，如果不及时调整，一些濒危的两栖动物可能面临和黄胸鹀一样的命运。

多位受访对象都提到，希望在自然资源部下设立专门的野生动物保护部门，或针对野生动物的评估和保护成立科学委员会。张正旺称，成立独立部门负责保护工作，是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科研人员能更直接了解和掌握相关物种的科学数据、生存状况、种群变化趋势等，专业性更强；另一方面，能够减少两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障碍和壁垒，真正从保护的目出发，减少其他方面的干扰因素。

与此同时，杨朝霞认为，应立足国情全面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并积极推进其配套法规、规章、名录的出台、更新和完善。生态文明法治建设包括污染防治、资源保护和生态保护修复三部分，它们应该三足鼎立，“但目前的状况是‘两长一短’”。从立法角度讲，共有39部生态文明的专门法，其中污染防治法13部、资源保护法有16部、生态保护法只有5部，短板明显，“生态保护的相关法律已经落后很多，从法治建设的角度来讲，当务之急是尽快补齐短板”。

关志鸥也表示，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推动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体系，以《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为契机，积极修改完善相关法规规章，科学界定法律调整的物种范围，推动建立地方政府保护目标责任制，落实有关部门分工监管职责，力争尽早发布“三有”名录、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和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专用标识管理办法，实现对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保护、猎捕、人工繁育、经营利用、运输寄递、市场及网络交易、进出口等多环节、全链条保护管理，全面强化野生动物保护法治基础。

文中嵌入视频为：[【峰会?观点】唐瑞：世界正处在最严重的物种大灭绝时期](#)

相关视频说明：2020年11月，在第11届财新峰会上，英国野生动物保护专家唐瑞表示，两栖动物或哺乳动物的消失率高达约58%，这种流失不仅是悲剧，更会带来包括疫情爆发、经济损失等巨大风险。

版面编辑：吴秋晗

显影 | “野蛮生长”时期的深圳——摄影师余海波的新移民记忆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在上世纪80年代末，余海波成为千千万万闯深圳的新移民当中的一员，踏足这片生机涌动，遍布可能性的土地，眼前的一切让他目眩神迷。在之后的时间里，他“发疯”般地奔走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对其进行全景式的记录。除了城市不断变动的天际线、身影匆匆的淘金客、不断涌现的商业形态，他还将镜头对准酒吧里忘情舞动的年轻身体，妆容出挑、着装前卫的摩登女郎，大芬油画村与西方经典对话的赤膊画工??正是这些丰饶绮丽的文化生活，连同蓬勃的市场经济一起，让深圳成为吸引天南海北追梦者的强大磁场



01.2006年2月，大芬油画村，画工和他们的复制的油画作品。

图、文| 摄影师 余海波

约定南下深圳的那天晚上，珞珈山整夜不停下雨，百年校园沐浴在春雨之中。我和同学兰志平、熊安平在枫园五舍房间里喝酒，酒是从楼下小店买的“红高粮”，1.6元一瓶。我们的话题就是去深圳寻找一个梦想。窗外枫叶不时作响，我们赤着背把酒当歌。

1989年3月26日凌晨，满怀旅途疲惫的我持着边境证在南头关检查站下车，准备进入深圳。检查站的验证长队有六七十米长，全是大包小包的，好像是一次重要远征，每个人脸上神情严肃。那天夜空上没有星星，十几米高的关口路灯在灰霾的折射下笼罩着人流，把人的面目照得灰黄灰绿，气氛冷峻而又紧张。特检大厅入口是用钢管焊接起来的围栏，死死包围着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神，涌动的行李在人流上空晃来晃去，时不时有人尖叫或粗喊。



02.1995年，深圳罗湖佳宁娜广场，建筑工人聚在一起看电视。



03.1989年，深圳埔尾村，录像厅门前摆着台球桌。

走出南头关，一阵凉风吹过，我感到一种清爽和快慰，到深圳了。27岁的我将从此成为背井离乡闯深圳的新移民。

在深圳，和多数排队入关者一样，我经历了中国最早期市场经济的多种诱惑与迷茫，经受了精神的失重与存在的困境，也常常会感受到经历各种新鲜刺激的快乐与纠结。也许只有上帝才可以窥视到这座最早开放的中国城市所呈现的疯狂云图。那些在打开闸口后冲动的灵魂，那些由各种幻觉、欲望聚涌的旋涡，如同气象卫星上的云图狂奔不安。人们扮演着各自角色出场撕杀，吼声在林立高楼和山海之间回响；他们时刻瞄准城市的猎物，随时扑向可以让自己控制和占有的领地。

和他们一样，我也在奔跑着，寻找淘金的门道与生存的领地。我背着相机穿越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面对各色人群的面目与行踪。我瞄准各式各样的移民故事，从早到晚发疯般拍摄。其中既有每天为报纸发稿的任务，也有在感悟生命中为自己完成的课题。我把朝夕连接在一起使用，在一种超现实的幻觉中度过每一天。我和各种人群打交道，也结交了许多朋友，大家有幸参与了这座新移民城市的建设，有缘汇聚在这里生活，我的摄影就是我的生活。它带给我对灵魂的洞察和发现，是一种用时间命题的生存片断的叠加，一种关于生命的有限与社会的无限过程中的纠结。



04.1993年，深圳上步市场，售卖香港明星海报的摊位。



05.1995年3月，深圳宝安工业区，打工妹在工厂宿舍内休息。



06.1992年，深圳福田区岗厦的一处出租屋图书馆。



07.1998年，深圳福田，出租屋内弹钢琴的女孩。

2000年前后，我被深圳的夜晚迷住了。这样一个由年轻人组成的夜晚，有着不可评估的巨大能量。夜幕四合，青年男女们云集在自己喜欢的场所里，在音乐旋起的冲击波中，表达着自己的冲动与宣泄。啤酒、射灯、重音乐、尖叫??缠绕着柔软的深呼吸，就像恐惧后的战栗，让人们忘记这个世界的存在。深圳人的平均年龄和城市历史相当，人们在快速高效的工作中奔波一天，夜晚涌进酒吧，寻找一份发泄和张扬的空间。在酒意微醺的迷乱眼神中，在重金属的强大节拍下蹦跳、飞翔，肆无忌惮地张扬。

在这样的氛围中，我认识了李伟民，一位从古都洛阳长大、骨子里充满对传统反叛的艺术青年。他1988年义无反顾地来到深圳，做过工艺美术、动画美工、平面设计、广告策划、“向日葵”的摇滚歌手，始终处在都市的边缘，孤独地行驶着自己的生命之舟。为了生存，他曾搬家37次，地域跨越全市五大区。他已经适应了动荡的惯性，不在乎生活的形式，在乎的是拥有自由的精神空间。通过李伟民，我认识了许多另类人群，行走在没有面具的深圳之夜，品味另一番真实。从1994年到2000年，是深圳人泡酒吧最火爆的时期。李伟民的乐队主唱沈丕基也开了一间“青春酒吧”，在上步路。

就像登山、飙车、蹦极、冲浪等生命极限状态中的有氧运动，眼前的人们沉醉在激情状态运动中，实现着生命的深层抚慰。我和这些朋友频繁交往，也在交往中不停地拍照，左手拿着酒瓶，右手擎着相机不停地跳舞，把一些疯狂时刻抽取并凝固起来，转变成为一件能够保存下来的视觉生态；把一种曾经的生命坦露与真诚，留存给城市记忆。当第二天翻阅照片时会有突如其来的惊恐，不敢相信夜晚的魔力与幻觉的感召如此美妙。这是一种另外的真实，它可以让你自然地进入临界状态，更真实面对生命的深呼吸。只是幻觉的领域在一步步夸大、旋转，如同悬在天顶上巨大的飞碟，一往情深地旋转下去，漫无天际。

我来深圳的那一年，大芬油画村在深圳郊外诞生。一位名叫黄江的香港人最早在这里开办油画班，接来大量订单分包给他的学生们。于是，一批又一批复制的梵高、米开朗基罗、达芬

奇从大芬村销往全球。20年后，大芬油画村名扬四海，画工数万，年销油画过亿元。一次最大规模的复制名画是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深圳馆，一幅长43米高7米的巨制《蒙娜丽莎》，由507人用999块画布共同完成。

农民出身的画师赵小勇来自湖南，1996年他和妻子家人开始在大芬村复制名画，用9年的时间画了10万幅梵高作品。尽管他从来没看过梵高的原作，没去过梵高的故乡，更没读过任何美术学校，他已非常了解和熟悉梵高，甚至无需草稿就可以在画布上直接画出梵高的作品。大芬村的独特现象在艺术史中从无先例，这现象本身就是一种深圳的原创，是跨越时光隧道的超现实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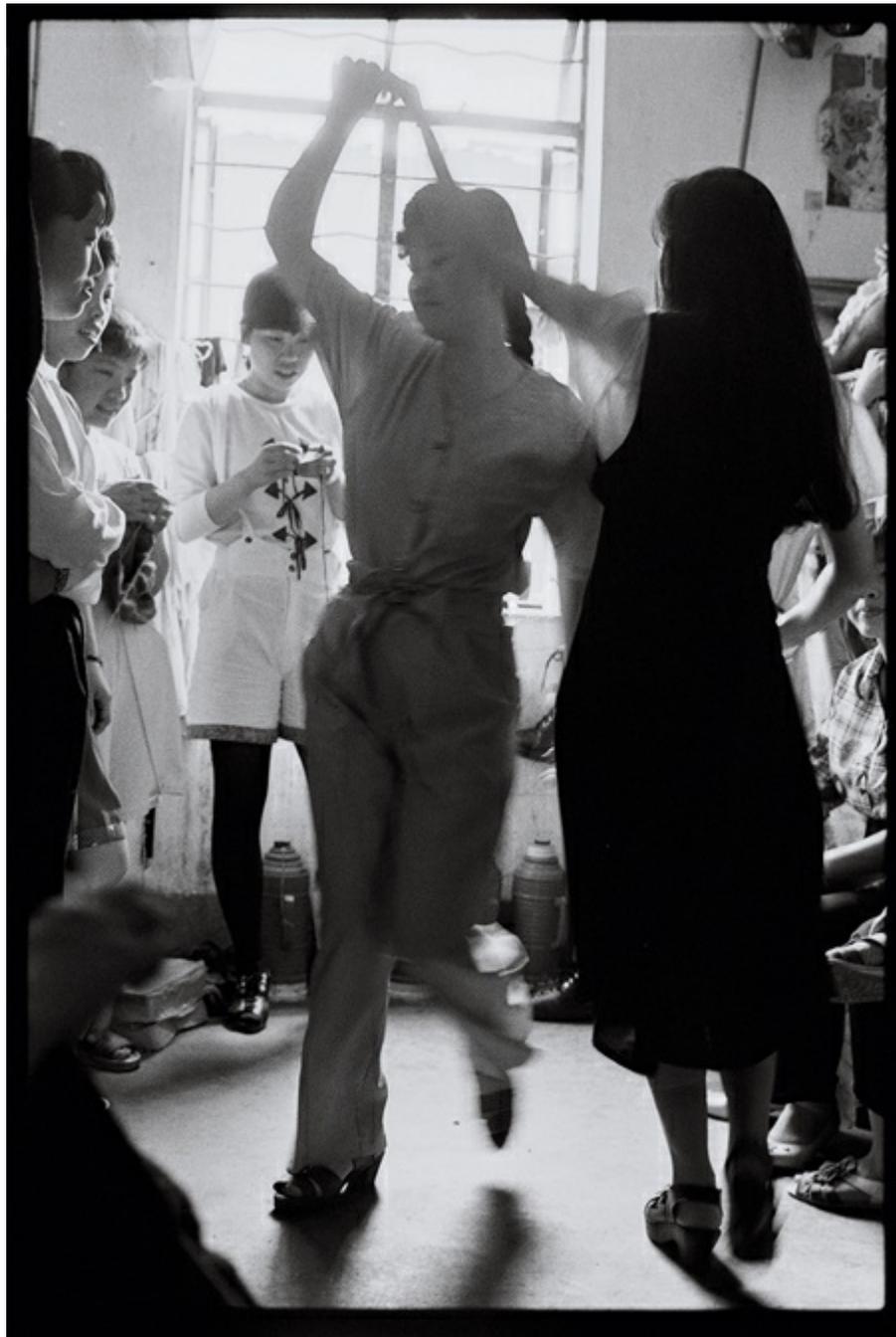
同为农民画家的吴瑞球是黄江的学生，1971年出生在广东陆丰，成年后随哥哥来到深圳卖水果、做小生意，赚钱学画。当他在大芬村发现复制名画也可赚钱时，喜出望外。随后开创了大芬村画工厂流水线作画模式。1998年，吴瑞球在广交会外围摆地摊，接到了美国沃尔玛的40万张油画订单，造就了他事业的基础，遂创办了集艺源油画有限公司。



08.2003年，身着报纸制成的服装的女模特。



09.2011年9月，深圳新生代时装设计师展示自己的时装作品。



10.1994年，深圳宝安黄田工厂区，女工在宿舍跳交谊舞。



11.1999年，化妆舞会上的年轻人。

大芬油画村的画工们张扬着当代社会赤裸的人性。他们每天在梵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的注视下生活，画油画、吃饭、养育儿女，让经典艺术品与东方消费气息连接、错位、交替。

深圳这座城市，像巨大的磁场，吸引八方寻梦者；又如同一列满载风雨兼程北上南下旅客的疾速火车，带走了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通向理想彼岸隧道。装载着生命的梦想、呐喊与希望。从这里到那里，穿越、跋涉、启程、抵达。

自深圳特区创立开始，闯深圳的移民从未间断过。新的身份、新的职业、新的住所、新的生活??时空演变着从内向外的变化。奔跑的流水线车间，云浮光艳的夜总会，流浪汉栖身的桥头堡，山脚下的铁皮出租屋??人们在追赶欲望、金钱或维系生存与消费的横流中行走，疾驶的马路上每天都飘来青春故事与血色浪漫。

我便是穿梭在这座城市里没有踪迹的幽灵，不声不响地造访着驻足在此的快乐、忧伤、幸福、挣扎、期盼、失落??我行走中的即时影像和它们重叠起来，让无常多变的生存状态和魑魅魍魉似的灵魂，在黑白底片上留下记忆轨迹和生命抚慰。□

随笔 | 逃离哈佛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在生活面前，名誉的确可以成为身外之物，年龄也只是人为的界限。为了获得真实的幸福和存在的价值感，在什么时候转轨，转向什么方向，都有无限的可能性

文|赵姗姗

哈佛大学人类学在读博士

在很多中国学生和家长的想象中，哈佛大学或许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存在。一旦拿到它的录取通知书，当然要欣然接受，开启一段精英式的学术之旅。因为，就博士项目而言，它所能提供的，不仅是与学术大牛合作的机会、延伸至全球的人脉网络，还有完善的校园服务、极高的声誉，以及比其他研究生院高出大约三分之一的奖学金和过于充足的研究经费。

但是，能毫不犹豫做出这样选择的人，往往并非身临其境。或许他们并不知道，拿到一个理工科的博士学位需要五年，一个社科或文科的博士学位则需要七年，甚至更长。这其中还夹杂着许多变数，比如，与导师性格不合、导师跳槽撇下学生不管、导师生病去世、研究项目被迫中断或改题、个人政见不符合主流被孤立等。这些问题都会给博士生带来学术和生活的停滞以及心理的焦灼。即使这些不幸没有一件发生，单单五年或七年时间本身也常常令人难以承受，人会越发清晰地感觉到被困在时间里的无力感。

就拿我自己来说，现在想来，当初申请博士项目的初衷实在过于简单天真。二十三四岁的时候，觉得30岁遥遥无期，中间许多年不知道要怎么熬，希望外界有个制订好的“五年计划”，让我的生活可以线性前进，至少在数年内不需要多虑每天需要做什么以及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因为我知道，只要按照院系规定的进度走，“五年计划”结束之后，会有个还不错的学位等着我。

如果说焦虑就是志向和现实的落差造成的未来不可期，那么，粗看起来，哈佛的博士旅程应该是一段免除焦虑的旅程。但其实不然，就像与我同在哈佛人类学系的美国小哥盖伦常常感叹，“还有哪里能像我们系这样，30岁一无是处也不被人骂，导师还劝你放轻松，写不出东西就去和狗狗玩一会儿。除了这里，哪份工作会付钱让你无所事事？”一把年纪，还无所事事白拿钱，盖伦的话里透着藏不住的焦虑。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天台和公共空间。



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天台和公共空间。

我身边的每一个博士生，包括我自己，恐怕都无法逃过这种焦虑。在博士项目中的人，会越来越清晰地感觉到，时间是构成人的存在体验和自我认知的重要维度。不同文化的时间感可能有天壤之别，不同年龄段的时间感也会有差异。在哈佛的研究生院里，一边是闲暇和自由的过度给予，一边是重重学术考核的严格限制，被这样松与严的节奏交替绑架，难免让人身感异样。

凯亚：淡定享受生活

并非每个人都会屈服于这种异样感。

凯亚是和我同年进入人类学系的荷兰男生，瘦瘦高高，有荷兰年轻男子典型的秃顶征兆。他常常调侃自己从不梳头，因为害怕头发在博士毕业前全部掉光。在我看来，凯亚是全年级最淡定、最会享受生活的人。晴天的时候，他会跨上自行车，一路骑行数十公里到康科德和瓦尔登湖，生怕浪费一点春光。雨天的时候，他会拉上我一起躲在学校附近的咖啡馆，喝热巧，聊八卦。每天早上，他都会不紧不慢地吃早饭，边吃边读《纽约客》，然后吹着口哨出现在校园里。系里的Happy Hour，他也从不缺席，还在二层的公共区域，就着红酒、奶酪、法棍，和同学们谈天说地。即使坐在楼下的图书馆，都能不时听到他爽朗的笑声。

我之所以说凯亚最淡定，是因为他几乎每门课程都是“未完成”（incomplete）的状态。不知道是对自己要求太高还是有写作困难症，每到期末，凯亚总是写不出课程论文。即使到了博士第三年末，大多数同学已经修完所有课程、准备论文开题时，凯亚还有五门课程“未完成”。

我们在一起聊天时，他总会和我讨论论文写作技巧。“为什么我的论文总是写了改，改了写，最后始乱终弃，只好作罢？”我告诉他，我写论文都是先列好提纲，然后一口气写完，把提纲准备得精细一点，写作过程就简单多了。显然，这个答案完全不符合他的思维方式，“一个完整的提纲从来都不会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哈哈，只能现想现写。”不得不承认，凯亚随性的风格从思维到行动融贯一体，他的生活轨迹好像并不被系里的课程学业规定所束缚。

凯亚的生活意义和成就感似乎更多来自帮助他人、奉献社区，而非在学术写作或院系活动中崭露头角。和哈佛一墙之隔，有所公立中学，凯亚对这里的学生非常熟悉。一次，我们在附近的咖啡馆聊天，他说自己正在辅导这些学生写申请大学的文书，“辅导他们确实有些费力，那些学生大多来自并不富裕的少数族裔家庭，学习表现也不尽如人意，起初他们的写作根本没有章法可循。”“那你享受这个过程吗？”我问。凯亚忙不迭地表示肯定：“当然，辅导他们很有成就感。他们对我的意见都有很积极的反馈，进步肉眼可见。”凯亚在谈论自己这些付出时极有满足感，和谈论论文时的一筹莫展形成了鲜明对比。他问我有没有参加过社区的公共服务，我惭愧地说没有。他极力推荐我去参加，“总在读书、上课、写论文，不觉得无聊吗？不要对身边的社区熟视无睹。如果等到毕业，还不认识日常和你生活在一起的人，不是太可惜了吗？”原来，他把社区里的学生都当作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人，所以认为大家应该彼此熟识，彼此联结。欧洲人的这种社区观念和社区依恋，很明显有别于美国人通过消费联结的原子化社会。

在博士第三学年即将结束的时候，凯亚宣布自己要休学一年。问他为什么，他说感觉很久没有好好生活过了，想去英国和男友一起生活一段时间，以确定他们适不适合结婚。听到他说“感觉很久没有好好生活过”，我忍不住吐槽，“整个系里没有一个人每天比你更享受生活了好吗！”不过，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令自己舒适的节奏和方式，凯亚选择暂时离开，说明这里的生活气息对他来说的确不够浓厚。

凯亚和男友从本科在剑桥读书时就结为伴侣，如今已经七年。“你能相信吗？我们在一起已经七年了，但从来没有同居过。我们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对同居这件事还是很严肃的。”凯亚一本正经地说。他和男友可以说是模范伴侣，每天视频通话。一年前，男友还特地为了他办了停职，申请到哈佛肯尼迪公共政策学院的一个短期项目，两人时常成双成对地在系里出入。只是后来男友觉得读书不再适合自己，便提前半年回到英国复职。这次轮到凯亚迁就男友。看他提到团聚时满眼放光的期待表情，就知道，对他来说，多少门“未完成”的课程都不敌日常生活的充盈和亲密关系本身重要。

白夜：离开故纸堆

白夜是一个新加坡女孩，30岁之前基本上一直都在读书。读完两个硕士项目后，她又被哈佛的博士项目录取。这意味着，她的读书研究生涯又延长了六七年。她告诉我，在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瞬间，她还是挺高兴的，但很快陷入不安，“我真的要再读六年吗？写硕士论文就差点要了我的命。”

我们在宿舍的楼道里相遇时，她向我表达了她的疑虑。“我约了导师去聊聊这件事……教授说他在录取讨论会上拼命帮我争取，才争取到这个名额，他自己想收的学生都没有招进来。他好像现在还为此不高兴。如果告诉我我要放弃这个名额，他会不会‘杀’了我？可是，一想到还有六年，我就……我从来都没有工作过……我还是去和我的新导师谈谈吧。”白夜站在过道里，边说边纠结地搓着手。

最终，她还是进入了博士项目，但写论文依旧令她痛苦，“我写东西的时候需要一直喝红茶，脑子才能运转。现在，东西没写出来，红茶倒是越喝越多了，夜里12点还精神得不行，我红茶成瘾了。”

白夜博士项目的第二年，我正在北京做田野调研。深秋，一日，她突然联系我，说要向我讨教田野经验。我们约在一家咖啡店见面，在角落里的小桌子旁坐下，点了两杯拿铁。她似乎有些欣喜地告诉我，她春季学期就已经休学了。“我今年一直都在跟着一个纪录片组实习。哈佛这种地方真的不适合我，对产出的要求太高了。这才刚刚第二年，我连准备博士资格考试的热情都没有了，想都不想。”

抱怨之后，她开始和我分享她的精彩旅程。上半年，她跟随一个拍摄传统中草药和医学实

践的纪录片组，去到云南西双版纳的布朗族村寨。那里的原始森林有丰富的古茶树资源，他们拍摄当地的村民如何采茶、制茶、用茶入药治病。随后，他们又进入海拔4000多米的藏区那曲，跟随当地采药人寻找至今无法人工养殖的冬虫夏草，听当地人讲述冬虫夏草如何经历被商业化的命运，以及他们如何在商业化的背景下，依旧把它视为挽救亲人的无价之宝。

她说，虽然一路山高路远，高原反应也让她一度绝望，但是，在路上见到的群山、银河、小孩子，带给她层出不穷的新奇感。比起孤军奋战查资料、写论文，她更享受和同伴并肩作战的团体感，“我就是个喜欢大家在一起吃吃喝喝、嘻嘻哈哈的人。我因为给他们买了太多零食，一路上玩得过于欢乐，还被领导批评了，哈哈！”听她讲述，我感觉对她来说，这段经历与其说是工作，不如说是一场迟到了很久的成年礼。她说不知道自己以后还会不会回到哈佛把博士学位读完，但她现在每天为了制作纪录片而忙碌工作的真实感和充实感，正是她需要的。

其实，白夜并没有放弃学业，只是灵活地选择了离开故纸堆，用一种令自己更舒适的研究方法来推进调研。她告诉我，当了半年纪录片实习生后，她又成功申请到海外调研经费，准备把纪录片组当作调研对象，把自己的论文项目从电影史转移到当代流行纪录片的生产。众所周知，白夜申请到的这个项目经费多，名额少，难度大。只要申请到，就可以衣食无忧地过上一年。她说，“多亏导师告诉我如何投其所好，从评审委员会感兴趣的角度来打磨研究项目申请书。不然，我们这种人文题材的项目根本拿不到经费。”

虽然哈佛的学术要求令一些学生难以忍受，但这样灵活的学制和充足的资金，也正得益于学校以学生自身发展为导向的教育理念。文科和社科的学生和导师可以有很强的智识联系和情感联系。当博士生说自己想离开半年或一年的时候，很多导师都会选择理解和支持。因为身在其中的人都知道，哈佛在很多时候并不是最有益于身心发展的地方。

佐藤：转身回日本

在为国际学生举办的融入校园项目中，我认识了佐藤，一个来自北海道的日本男生。他来哈佛学习计算机和电子工程，毫无意外地选择了日本“国宝”机器人在医疗场景中的应用作为研究项目。他出身学术世家，爸爸也是哈佛毕业生。走过老校园时，他把他爸爸当年住过的红砖宿舍楼指给我看。因为想学中文，又喜欢吃西红柿炒鸡蛋和麻婆豆腐，他经常和中国学生游乐在一起，我们因此熟识。

大概也在博士第三年，刚开学，一天傍晚，我们沿着查尔斯河散步，看流水，看皮划艇训练，看一家一家的加拿大鹅摇摇摆摆地在岸边走来走去。这个时节，查尔斯河的秋意令人十分舒爽。走累了，我们就爬上靠近本科生宿舍的石头桥，在桥栏上坐着聊天。佐藤说，“这学期我一门课都没选，基本就是半休学状态。”我问，“你的项目这么酷，难道就不做了吗？”在我这种社科生眼中，佐藤的研究项目既有趣，又高精尖，还有应用前景，完全想不出不喜欢的理由。他嘴角一撇，笑了一下，仿佛我只是重复了很多人对他休学这件事肤浅的追问。

佐藤很聪明，再加上家教加持，本科毕业后22岁就直接考进博士项目。但是，他在接受录取通知书之前，可能并没有考虑到博士项目的时间周期是否真的适合自己。他望着远方另一座桥上的点点灯光，不紧不慢地说，“我是很喜欢自己的研究项目，但我没想到，博士项目研究周期真的太长了，我觉得一点成就感都没有。”担心自己的回答太过消极，他又补上一句，“不过，我这学期在做助教，比起研究，我更喜欢教课。我每说一句话，学生都有反馈，把他们一点点教会，这种即时的成就感真是救了我。”

那个学期，佐藤被分配去教本科生的数学课。虽然有成就感，但他还是忍不住吐槽，“我真没想到，美国学生的数学可以这么差，很简单的东西要教好几遍。他们可都是哈佛的学生呀，还不如日本的高中生……”在美国学界，从本科开始，一个人、一个小组或是一个实验室通常要独立承担一个项目，项目的进展方式和做题考试的进展方式相去甚远。东亚的学生往往习惯了以做题考试拿成绩为模式的循环，以获得重复性的短期认可来确证自己的表现和能力。然而，一旦进入以问题和项目为导向的美国学界，没有短期评价和回报，很多学生往往没有耐心和自我激励机制通过积累来获得长远进展。

对于20岁到30岁这十年的期待，也是让哈佛金字招牌黯然失色的重要原因。“20岁不应该这样度过，除了论文、实验、小白鼠，我还有一整个世界没有去探索。”我在哈佛听到了太多这样的抱怨。撂下这样的话后，很多同学的确豪爽地退学了。有的去乐队做了乐手，有的去参

加选美，有的开了酒吧。不管当年的申请有多艰辛，录取有多兴奋，生活本身的不可期都让人无法继续选择被这个学院体制规训、消磨脑力和青春活力。

一年后，佐藤说服了父母，正式退学，回到日本，在一家科技公司任职。他离开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们，但我们仍在Instagram上保持联系。从晒出的一张张透出清新和活力照片来看，他应该更享受回国的生活：在札幌市政厅前，他穿着黑色礼服，将身穿白色婚纱的妻子高举过头顶；很多个周末，他和妻子穿上专业的装备去户外登山，去球场看球赛，去歌舞伎座看传统表演。一年春节，他突然问我和室友要地址，一张很有日式风格的贺卡不久后寄到我们的邮箱：黄色烫金的封面上，印着浅草雷门前、樱花枝桠下，穿着蓝色和服的女人和灰色工服的人力车夫。打开贺卡，他用中文写着“希望博士项目善待你们”，读起来颇有点幸灾乐祸，不怀好意。

不得不承认，哈佛研究生院的学术生活本身就很精彩，但和这些比起来，我在这里看到的多种多样的人生选择其实更精彩。这些选择让我看到，在生活面前，名誉的确可以成为身外之物，年龄也只是人为的界限，为了获得真实的幸福和存在的价值感，在什么时候转轨，转向什么方向，都有无限的可能性。毕竟，读博只是众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它的确会在很大程度上规训一个人的生活节奏、生活范围和职业选择。即使是哈佛，种种诱惑也不足以让这种生活方式对所有人产生足够的吸引力。有些人可能觉得放弃学位、中途退学很可惜，但也有些人会觉得，放弃生活，从与亲人、爱人、自然的亲密关系中退场，其实更可惜。□

文中嵌入视频为：[中国大陆学生首次在哈佛毕业典礼致辞](#)

相关视频说明：2016年5月26日上午10时，哈佛大学生物系博士毕业生何江作为优秀研究生代表发表演讲，是哈佛大学历史上第一位享此殊荣的中国大陆学生。

版面编辑：吴秋晗

专栏 | 熊孩子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最重要的或许是把孩子当作一个个独立自主的个体，从小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既培养他们的自理能力，也卸去家长的巨大心理负担



东亚文化传统虽然注重礼教，但对孩子其实极为宽容。图/视觉中国

文|维舟

作家、书评人

地铁上看到一个小男孩，四五岁的样子，正是精力旺盛的年纪，极其活泼好动，一会儿做出各种鬼脸和怪样，一会儿又想看动画片，不达目的就哭闹着不罢休。他妈妈看上去是一位很干净、有教养的少妇，起先悄声让他安静会儿，继而试图抱住他叮咛，但毫无效果，最后她崩溃了，侧过头去啜泣起来。

车厢里一阵尴尬的沉默，在他们母子到站下车后，坐我身边的朋友仿佛松了口气，低声说：“这更坚定了我不要孩子的决心。”

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我发现，这其实是一种值得关注的全新社会心态。之前很多人说到不想生孩子，总是将之归结为一个经济成本问题——“生不起”，但现在却开始有不少人认为自己本身就不喜欢孩子。

近几年，“熊孩子”一词的流行就多多少少说明了一些问题。只不过，“熊孩子”很少用在自家孩子身上，往往是在声讨“别人家的孩子”，进而谴责别人家的家长没有管教好。它还点破了一种社会情绪：小孩子并不总是可爱的，他们妨碍他人，引人反感，也不能仅仅用“孩子还小”轻描淡写带过。

小说《项塔兰》中的一段话道出了很多“厌童症”人士的心声：“小孩那么……无知。除非他们不是那么无知。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不得到手绝不罢休，叫人讨厌。我认识的那些糟糕得要命的人，全和长大的大小孩差不多！真够恐怖的，让我想吐。”换言之，人们反感的其实是一种不遵守默认社会礼仪规范的做派，只不过它往往更多出现在还未被规训、也不懂文明举止的孩子身上，但如果成年了也不改，那就是近年来广为声讨的“巨婴”了。

当然，遇到这样的情形，人们普遍第一反应就是归咎其家长，所谓“养不教，父之过”；但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本身就会成为引发“厌童症”的一个因素。因为这意味着家长要对孩子的言行举止承担起无限责任，虽然未成年人闯祸总得由法定监护人来承担法律责任，但家里有孩子的都知道，就算双亲都知书达礼，家教也没问题，却也难保一定不会生出个“熊孩子”。此

时，对家长而言，压力是巨大的，就像那位地铁上的年轻妈妈，在怎么都无法制止孩子时，自己会困难堪而情绪崩溃。

比如参观美术馆，在这种安静的场合，小孩子若是尖叫哭闹，对家长而言，简直是可以难堪到“社死”的经历。有心理研究发现，越是平日职场表现优秀的女性，遇到这样的场面越容易陷入抑郁，因为她们会自问：“我怎么连这都搞不定？”问题恰恰就在这里：孩子和其他事务不一样，不是你凭借自己的能力理性就能应对的，如果能接受你跟他/她好好讲道理，那就不是“孩子”，是“小大人”了。

可能因为在公众场合更注重礼貌、整洁，日本社会表现出来的“厌童症”也尤为显著。2007年上映的日剧《神探伽利略》中，福山雅治饰演的物理天才汤川学一贯理性而镇定，唯独遇到孩子时浑身不自在，因为孩子是他无法用理性来应对的存在。像这样一个反传统的形象竟然能广受欢迎，本身也折射出日本社会心态的变化。事实上，日本公众近年来对不守礼的“熊孩子”越来越不宽容，可想而知，这又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日本的少子化。

和以往相比，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东亚文化传统虽然注重礼教，但对孩子其实极为宽容。《红楼梦》中，所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反过来说，也就意味着，在“成人”之前的孩童，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自在”而不受社会规范制约，因为社会都默认孩子不必像成人那样严格遵守礼法。就此而言，当下“巨婴”的出现，与其说归结为传统文化的弊病，不如说是这种纵容一直延续下来，在本应“成人”的时期没有经历充分的“过渡礼仪”。

不夸张地说，这个问题如果不设法解决，对社会的潜在影响相当深远。但它究竟可以怎么破？首先可以做的，就是为孩子特别辟出公共空间——谁都不喜欢在美术馆安静欣赏画作时遇到孩子哭闹，但可以专门有一个儿童艺术馆，孩子们在那里既可以释放天性，也不至于打扰到他人。当然，如果家长遇到一些困扰，也需要咨询心理机构的建议。毕竟，应对孩子也需要技巧，并不是谁都能无师自通。

但最重要的，或许是把孩子当作一个个独立自主的个体，让他们从小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既培养他们的自理能力，也免去那种为孩子承担的无限责任，卸去家长的巨大心理负担。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也需要一个过程，但这本身就是教育的应有之义。□

版面编辑：吴秋晗

专栏 | 学习放盐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补习过一番盐为何物后，我发现盐并不关乎贵贱，它其实一直在考验人类是否掌握了一门深奥的学问，那就是适量



盐并不关乎贵贱，它其实一直在考验人类是否掌握了一门深奥的学问，那就是适量。放盐这件事，多了少了都不行，只有一个正好。图/视觉中国

文|王竞

作家、中西文化项目顾问

一上大学，我就碰到不少新入学女生都有的麻烦：被高年级男生追。未名湖遛弯时，我跟一名大四的男生吵了一架，他笑我们中文系的人“酸”。分手时他想挽回局面，对我说：咱俩能吵架是好事，吵架是生活中的盐。他是化学系的，我一时没弄明白他想表达的是哲理还是化学原理。两人不了了之后，他对盐发表的高论留在了我的脑子里。

今年春节，我读了一部讲四川自贡盐商的小说《慎余堂》，作者李静睿就是自贡人，她用34万字反思和想象了自己的家乡。准确地说，她只写了一个很短的历史剖面：从溥仪退位到搬出紫禁城的12个民国年份里，盐商家族怎样求生图变，救己救国。我们的日子早被社交媒体支配得只有碎片，忽然坐下来写34万字和读34万字，都算是轰轰烈烈的事；况且李静睿还是收敛着写的，她在虚构故事的同时，虚构了一种有古意的民国白话文，若不这么简约着，估计全书的字数就得冲向38万了。有些词我没读懂，比如盐卤、火圈等，起先以为是她发明的古语，后来发现是自己全然不懂制盐。

没有比盐更普通的东西了，以至我从来没费神想过，每天吃的盐是从哪里来的。放下《慎余堂》，我补课看了一部德国关于盐的纪录片，才知道盐是2.5亿年前生成的矿物质，在地下形成固态的岩石或液态的盐水，也叫盐卤。自贡在历史上富藏盐卤，如《慎余堂》的描写，那时的制盐方法就是挖山打井，凿井见卤，井上产卤，灶房煮盐，让盐卤澄清杂物，凝固成品，有色黑质粗的盐巴、雪白的花盐和最上乘的鱼籽盐。围绕当年这个支柱产业，还应运而生了盐警和盐税。德国纪录片里，古老的日耳曼人也是支起浅底锅，砍掉山上的树木烧起火来，把地下的卤水倒进去熬制成盐，飘在最表层的结晶叫盐花，直到今天都是商店里最贵的盐品。

我们多少都耳闻过，百余年前的盐商之富，堪比今天的比尔·盖茨，因为盐在那时格外珍贵。德国的史书里，把盐称作白金。哪个地方产盐，哪个地方就富有，从自贡到德国都是一个道理。一个例外是托马斯·曼的老家吕贝克，这座小城不产盐，但它也曾富甲天下，成为托马斯·曼的诺奖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的背景。这是因为在汉莎同盟时代，吕贝克是盐从波罗的海出口到欧洲各国的门户，当年建的大盐仓至今还是小城一景。

盐从金贵跌到廉价，也就一夜之间的事，命运堪比《红楼梦》或格林童话的逆行，公主成了灰姑娘。工业化后，盐的开采和生产成本降低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再加上盐不仅便宜，还管够，它在地球上的存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至少德国纪录片是这样告诉观众的。在盐这个问题上，地球人大可不必杞人忧天。

盐变得让人如此心安，再不会惹出《慎余堂》里人头落地的惨事，甚至跟浪漫沾起边来。如果菜做咸了，德国人会打趣说：你是不是爱上谁了？我一直以为，言下之意是爱令智昏，连盐都放不准了。最近才知道，德国人的这句成语原来有科研垫底，不来梅港的科学技术转让中心证明，恋爱中人的激素水位上升，对咸味的敏感度下降。

我把家搬到汉堡后，左邻右舍登门相见，给我带的见面礼是两样再普通不过的东西——盐和面包。我想起英文单词salary（工资）的拉丁语词根就是盐字，觉得邻居们的实在劲儿由来已久，盐在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深意犹存。我读过一篇德国艺术史学家对达芬奇的分析，说他画的《最后的晚餐》之所以高明，全在对告密者犹大的处理上。在达芬奇之前，画匠们画犹大要么免掉他头上的光环，以示恶人跟圣人的区别，要么把他画得丑陋猥琐，坏人相无疑。而达芬奇把犹大画得跟众门徒别无二致，只是让他的手打翻了餐桌上的盐瓶子。可见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盐就不仅仅是一剂调味品了，它代表着生命价值的本质。

网上有人批评国内盐品单调，瞧欧美超市里的盐多丰富，有蒜香盐、辣椒盐、香草盐多种口味，有玫瑰、黑炭、蓝莓各种颜色，还分烹饪盐及边吃边撒的佐餐盐……我不反对丰富，但别忘了中餐不是西餐，试想一盆热香的红烧肉端上来，你还往里撒盐，大厨的脸往哪儿搁呢？

补习过一番盐为何物后，我发现盐并不关乎贵贱，它其实一直在考验人类是否掌握了一门深奥的学问，那就是适量。放盐这件事，多了少了都不行，只有一个正好。就像《慎余堂》里的人物，在军阀、共和、革命各种选项里，大哥在救己救国的比重上倾斜到个人自由这一头，也许有些寡淡；疯狂无度的是二哥，脑里一旦注入某种理念，就变得无辜者及家人皆可绝杀，极尽暴力与毁灭之能事；历经大痛而终于懂得适量法则的是三妹，她选择的救国之路，是在维护人性尊严下的竭尽全力。□

版面编辑：吴秋晗

荐书 | 各有答案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关于国家如何变成如今的形式，重要的是蜕变历程，考虑到各个国家不同历史，答案就变得尤其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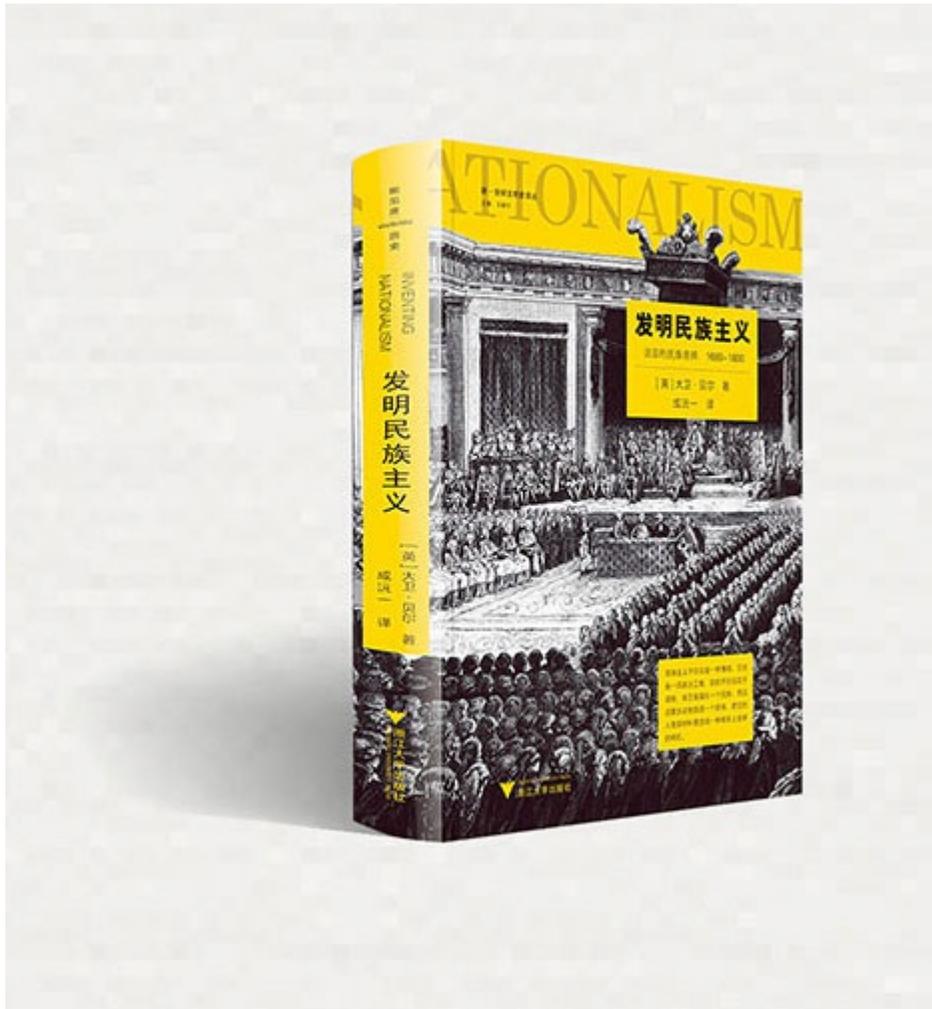
文沈大园

出版人

我从小就听哥白尼的故事，他是个了不起的波兰人，提出划时代的“日心说”，我还常记错，以为他被教会烧死了。哥白尼是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的印象一直刻在脑子里，所以当看到有人说他是德国人时，我吓了一跳。这个结论依据的是，哥白尼出生的城市，如今属于德国，并且他以德语为母语，著作用拉丁文写成，根本没留下什么波兰语作品，所以他是德国人，不是波兰人。第一条论据不值一驳，康德待了一辈子的哥尼斯堡，现在成了俄国的加里宁格勒，李白出生的碎叶城，如今属于吉尔吉斯斯坦，但没有谁会把康德说成是俄国哲学家，或说李白是吉尔吉斯斯坦诗人。

我们都知道，用现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去套之前的人，属于“关公战秦琼”。但语言问题确实让人有一丝动摇。我们对康德和李白的归属毫无疑问，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用的语言。以语言划定民族身份如今是那么根深蒂固，以至于让人一时忘记这也不是自古而然的事。哥白尼比康德早生了两个半世纪，那时拉丁文仍然在欧洲智识阶层占据统治地位，德语和波兰语都不过是乡野口语，不足以作为身份认同。若论个人心意，哥白尼的主要身份是天主教神父，他一生忠于罗马教廷和波兰国王。

“以今非古”总是夺人眼球，但其中并无太多值得探究的地方。譬如，一个人在一些问题上转变了立场，我们一般不会追问以前的那个他还是不是他——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这并不代表问题问得深刻。它不好回答，只是因为问题问错了。我们关心的应该是转变为何发生、如何发生，以及会不会有下一次。关于民族国家的形成也是如此，重要的是蜕变如何发生，考虑到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答案就变得尤其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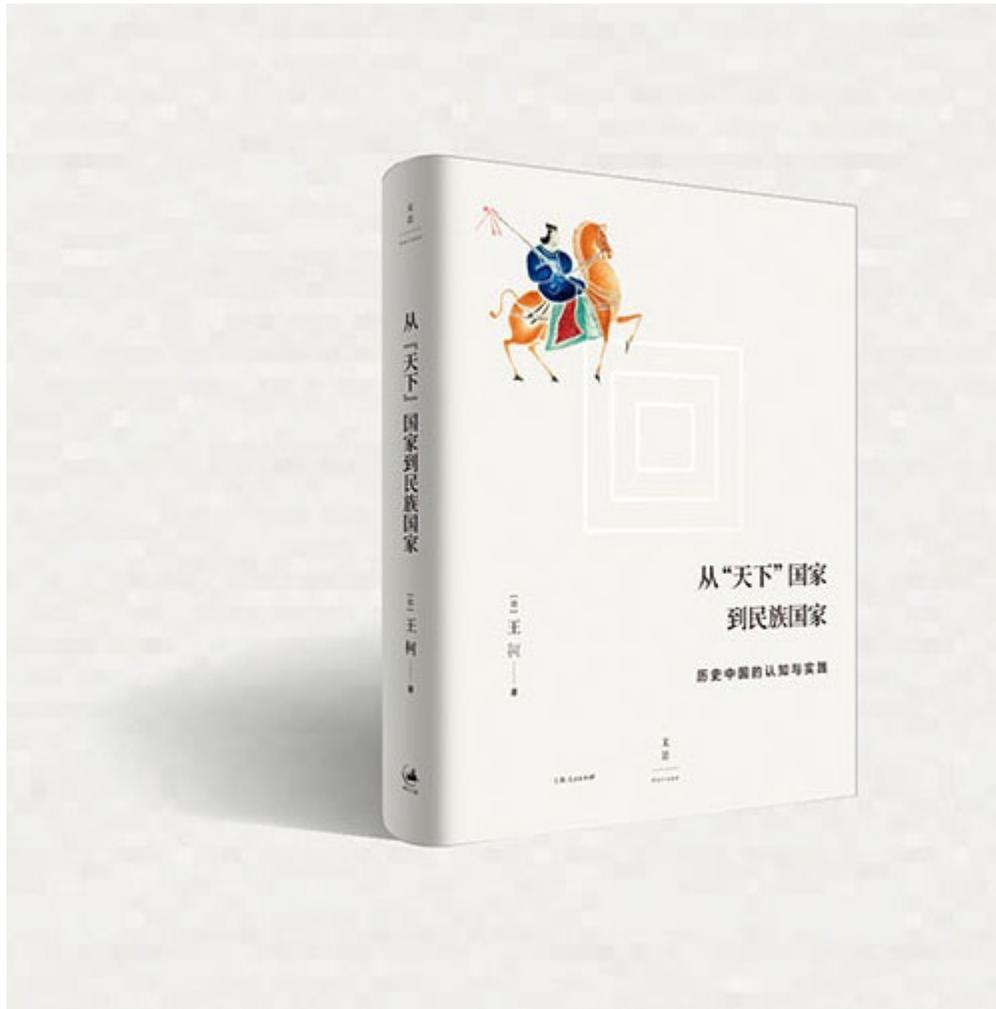


《发明民族主义：法国的民族崇拜（1680—1800）》

大卫·A·贝尔 著 成沉一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年3月

许多人都在课本上学过都德的《最后一课》。普法战争之后，法国被迫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德语取代法语，成为学校的教学语言。我一直记得小说末尾的名句，主人公在心里说，“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用德语唱歌吧？”可如果时间再往回倒退两百年，故事是反过来的，法王路易十四强占了阿尔萨斯地区，而这里的居民努力捍卫着继续使用德语的权利。历史上，这片土地数次易主，但只有普法战争，有人写了《最后一课》，因为此时民族主义已经诞生。

在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法国占有特殊地位，可以说是首创者，就算有人坚持多重起源，也不得不承认法国提供了几乎最重要的一种范式。大卫·A·贝尔认为，民族和祖国概念的兴起，根本上是欧洲人在意识到神和世界分离之后，寻求在尘世重建秩序的替代品。宗教秩序的崩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大革命是问题长久累积后的爆发，也是不得不直面问题的时刻。大革命把民族从一项自然事物变成一个政治实体，一切权威由它而来，并且以它的名义去推翻那个据称是神定的旧政治体系。但在革命时，他们也知道他们口中的那个法兰西民族尚未诞生。要知道，在革命前，说法语的人才不过三成，人们只知道自己是布列塔尼人或阿尔萨斯人。为此，要推行“国民教育工程”，要统一语言，要重建历史记忆，要培养公民责任。他们甚至不惜使用宗教的方式，让教师像牧师一样去传布这种新宗教。这就产生一种悖论：法国大革命以一个尚不存在的东西为依据，它好像是向未来借了一笔贷款，需要在革命成功之后通过培育民族主义来慢慢偿还。



《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

王柯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3月

在中国古人眼里，世界叫“天下”。这“天下”，不仅包括作为主体的“华夏”，也包括周边的“四夷”，并且“夏”和“夷”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理论上，只要秉承德治，胡人政权也可以作为正统入主中原。所以，族群之间的冲突并不表现为分离运动，而常常是在为谁“天下”的主导而竞争。

用现代的眼光看，这是一种开放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是一份颇为独特的历史遗产。但是，学者王柯也认为，这种传统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型，与西方近代民族国家思想之间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后者的到来，给近代中国带来了许多至今无法彻底解决的棘手问题。王柯对于近代史、边疆与民族问题等研究颇深，所以，比起来，这本书更值得细读的是后半部分，从清朝作为一个多元型帝国如何应对近代冲击，再到其后的各个政权如何在现代政治框架里处理多民族问题。

我有一些更乐观的看法，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秩序本身也有诸多问题，这并非是一个终极选项。既然终点未定，中国至今没有在“天下思想”和民族国家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并不意味着是一种落后，反而这份独特的历史遗产或许会为将来的国际秩序做出某种贡献。



《民族的重建：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1569—1999》

蒂莫西·斯奈德 著 潘梦琦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1月

并不是每一个多民族国家都能像中国那样穿过历史的硝烟并保持统一。事实上，他们大多都走向了分裂，比如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甚至苏联。但他们的崩解都发生在民族国家的理念成熟之后，而这本书追溯的历史则比这个理念更古老。现在，波兰、乌克兰、立陶宛、白俄罗斯是四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四百多年前，他们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波兰立陶宛联邦。在联邦里，来自波兰、立陶宛和东斯拉夫的贵族由共同的政治和公民权利连接，他们用拉丁语或波兰语称自己是“来自波兰民族的”，至于文字、语言、宗教的差异，并无什么问题，那时任何一个政治实体都不能保证人民是同质的，差异才是自然的。他们同样拥有对国家的强烈认同，只不过与近代民族国家不同。奇怪的不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波兰立陶宛联邦，而是现代民族观念如何在这样一个国家生根发芽，又沿着怎样的缝隙裂成了四个独立国家。

作者从波兰和立陶宛1569年的联合为起点，讲述一个早期民族如何变成四个现代民族的故事，终点则是1999年波兰加入北约。这意味着波兰成功与历史、与邻居完成和解，新秩序建立。



《单一民族神话的起源：日本人自画像的系谱》

小熊英二 著 文婧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年3月

这本书梳理了日本思想界关于本民族起源、形成、特征的各种观点，时间限于明治时代到“二战”后，也可以说是近代民族国家思想传播到日本后，日本如何结合自身需求应对历史。

比较有趣的是，思想的变化明显受到现实政治的左右。“二战”前，日本偏重于认为自己是“混合民族”，本国国民来源于亚洲各地的移民。这和日本彼时正在努力整合侵略所得的朝鲜半岛与台湾岛有很大关系。如果把日本定位成一个单一民族国家，那么让被侵占地区的人建立对这个国家的认同就很难。为了给这些人定位，养子文化也被挪用过来，养子虽然不是亲生的，但是只要抛弃本姓，真心为融入新的家庭，养子也能成为家族的支柱甚至继承人。在“二战”之后，日本退缩回本土，单一民族论就占了上风，日本又变成了“自古”就居住海岛的单一民族。相信自身民族历史的独特和稳定，确实帮助日本渡过了战败后的艰难岁月，虽然那只是神话，而从神话里借来的力量，终须某种偿还。□

版面编辑：吴秋晗

逝者 | 保持怀疑保持沉默

来源于 [《财新周刊》](#) 2021年第09期 出版日期 2021年03月08日

菲利普·雅各泰（1925—2021）诗人



菲利普·雅各泰（1925—2021）诗人

文|云也退

作家

“七星文库”是法语文学里先贤祠一般的存在，被这个文库选中出版其全集的作家都可谓文学巨匠大师。他们大多在逝世后入选，但也有少数人生前就拥有了自己的七星文库版全集，菲利普·雅各泰（Philippe Jaccottet）就是其中之一。

雅各泰1925年生于瑞士。2014年，他在近九旬高龄时得到这份殊荣。此前，只有196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圣-琼·佩斯和超现实主义诗人勒内·夏尔生前即成为“七星诗人”。除诗歌外，雅各泰的散文和翻译作品也很有名。出于一种诚实的认识，他大半生不肯抛头露面。他说过，越多人阅读和评论他的作品，他就越会被简化成某个符号，且不得不带上这种符号所预设的特征。“这就像在一面谄媚的镜子里看自己一样，它威胁着你与这个世界的直接的关系。”

雅各泰很看重“直接”。他的创作原则之一就是要确保“即时性”——即时地“描绘”“反映”或是“干预”——他宁可把这个动词悬置为无。他的解释是，诗人也要琢磨自己到底在干什么，体会其积极的语言行为的脆弱性和不可能性。这些思想在麻木的人听来是玄虚的，在敏锐有识的人看来则不亚于简单常识。

雅各泰极为认同尼采的格言——“你不可能既是作家又是文化英雄”。因此，他自觉隐居，从不以活跃的面貌示人。在他“登上诗坛”的1957年，他就对“登上诗坛”这个概念做了极为透彻的反省，不想被视为一个“跟很多诗界名人都有来往”的“诗坛新锐”。他牢牢地把自己固定在德隆山一个叫格里尼安的小村庄里，和他的画家妻子一起，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德隆山位于普罗旺斯，是一个能让他安心削减言论、保持沉默的地方。2001年，在他难得接受的一次采访中，他说文学的力量因为爱说爱写的人太多而受到遏制，“评论的泛滥就如同图像的泛滥，让我害怕，让我更加渴望沉默。”

获奖是文人成名的不二之途。谁能拒绝奖励落到自己头上？但是，当雅各泰1956年获得洛桑大学颁发的一个奖项时，他就明确说出：当我敏感地意识到，我惟一要说的话都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和可笑的脆弱性的时候，我怎能不犹豫不决？心理咨询师往往是重度心理疾病患者，以语言为艺术的从业者也应该是世界上最深度的怀疑者，怀疑文字和言语表达能否传达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雅各泰一生保持这种怀疑，这怀疑导致的沉默是他送给乡土的祝福。

普罗旺斯不乏法语文学界的名流“入住”。他们的作品无一例外都从薰衣草和橄榄树的丘陵风景中汲取过灵气。雅各泰从1953年定居于此，常年不知疲倦地在这里爬山、散步，触摸纯净的天空和被染成淡紫色的阳光。但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雅各泰除了写诗，还必须做翻译。他平生最大的翻译成就，是把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翻译成法语，前后花费三十年时间；此外，他还翻译过荷尔德林、里尔克、翁加雷蒂、曼德尔施塔姆的诗作和荷马史诗。

“在散步中，我能通过我脆弱而直接的体验得到快乐。”雅各泰拒绝一切绝对的、完满的措辞，把自己尽量留在当下，尽可能接近眼前。他这样的姿态，容易被人讽刺为耽于空洞浮华，而不“承担”任何现实的东西；但在他的诗句中，绝对能看出生存于世的陌异感所引起的惊惧和厌恶。他曾说：里尔克并没有和他的贵族邻居们混在一起，可是他写出的作品却比其他那些更“投入”的诗人更真实，对年轻读者更有吸引力。

他的诗艺和妻子的画艺同步精进。他曾说自己一直对一件事感到惊讶，那就是“让我们疲惫不堪的时间，也知道如何帮助我们”——无论谋生还是爱好，抚养孩子还是享受天伦，没有一件事是让他们不得不忍受的。他的进步仿佛是“在睡眠中取得的，仿佛白天本身和夜晚——几乎如同眼睛和手一样——起了作用。”

对他产生巨大影响的一位思想家是法国的西蒙娜·韦伊。韦伊说过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最重要的不该是寻求，而是期待。正因此，雅各泰认为自己最有价值的作品是那些出色唤起人的神秘感的诗文和笔记。他也因此与东方的道家文化有了联系，“需要让自己浸润在一种被动倾听、同时欢迎外界的氛围之中……我和诗歌的关系……可以比作手持一把桨，从而能控制方向的随波逐流。”

并非出于讨巧，他把的一部诗集取名为《无知者》，他的无知感是真心实意的。任何一个诚实面对自身的人，都能够分享这种体会。2021年2月24日，雅各泰在法国逝世，享年95岁。

版面编辑：吴秋晗